

目 录

序	(1)
这不是印度独家的特产	(1)
为民族品格‘招魂’	(2)
“文坛登龙术”休矣	(3)
磨砖不能成镜 念经岂能成佛	(4)
要立法,也要立德	(7)
呼唤‘兴国调查’之风	(9)
关键在认真	(10)
保卫国有资产	(12)
坚决打击卖淫嫖娼	(13)
莫骗人	(14)
对时尚的起码要求	(15)
惊心应思改进	(16)
落实难也	(17)
自爱、爱人,自尊、尊人	(18)
道德与面子	(21)
反问一句即得答案	(23)
照新沂市的榜样去办	(25)
富了怎样生活	(26)
北京真地动手干了	(27)
富裕不等于文明	(28)
文坛登龙术也	(29)
要有社会主义精神	(30)

贿赂与馈赠‘有别’也难别	(31)
要日日刹‘八风’	(33)
要正评人民艺术家	(34)
堵堵漏洞,救救教师	(35)
高尔夫,缓建些吧	(36)
雷锋来吧	(37)
要读好书	(38)
赞李玉安同志	(40)
可以摸得清,把得住	(42)
妇女要自求解放	(43)
天下太平	(44)
还应该深一步想	(45)
也算祛疑解惑斥谣	(47)
一个善良的劝诫	(49)
咱们喊个‘跟我上’吧	(51)
请戈培尔退位	(53)
我的困惑	(54)
遏止‘文化沙漠’的扩展	(56)
奖,应是严肃工程	(59)
不是‘这个’,是‘这多’	(61)
人民要人民的艺术	(63)
给打假加些内容	(64)
振兴读书风	(66)
要堵漏洞	(67)
一副对联的滋味	(68)
向哪里放枪好些	(70)
可怜天下父母心	(72)

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平均利润再分配问题	(7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	(77)
这是骂人么	(78)
这个‘醒’提得好	(80)
萝卜当不得人参	(81)
共唱国际歌	(83)
铁杆硬汉子	(85)
谁在制造贫穷	(86)
应该搞一个农田建设与开发的科学工程	(88)
扼制为愚昧创造包装的力量	(90)
要加强中国史的教学	(91)
衍生证券害人多	(93)
向王铁成致敬	(95)
应立法保护耕地	(97)
歌舞厅应干些什么	(98)
应当再思	(99)
自有生长‘庸品’的土壤	(101)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	(103)
爱护和平 警惕战争	(105)
评业绩要严肃	(107)
需要抓个‘行’字	(109)
人,创造技术,指挥技术	(111)
“共妻”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商品交易	(112)
这该咋办	(114)
文小道理大	(115)
“爱”,姓什么	(117)
不要把自己变为商品	(122)

香功缘何曾经香起来	(124)
做得很对	(127)
有正气才有正风	(128)
勿以小善而不为	(130)
请念旧诗一首	(132)
请看令人痛苦(哭)的故事	(133)
要总结经验	(134)
不要拉着历史倒退	(136)
好个“因素往往在‘戏’外”	(138)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吧	(139)
我为‘上山下乡’叫声好	(141)
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变	(143)
这条新闻很新鲜	(145)
论‘考察’之前的考察	(146)
人民艺术家,珍重	(147)
“艺术”不要毒害儿童	(149)
看!林黛玉大打出手	(150)
谁能对‘热’病辨症施治	(151)
请看这则广告	(152)
应以‘黑潮’为鉴	(153)
自觉、自重、自尊、向上	(154)
注解黄氏周期率	(155)
抓纲吧	(157)
陈尔程说出了中国人的志气	(159)
台胞喊出了:正义的呼声!真理的呼声!威武的 呼声!不愿做奴隶的呼声	(161)
如何拍历史剧	(162)

这是一个重要措施	(165)
记住 我们是中国人	(166)
这篇文章实在好	(167)
原则从来不长脚	(168)
文艺工作中的“破”与“立”	(169)
这还是可以借鉴的	(170)
且补充两点	(171)
向郑州市学习	(172)
咱们都要读鲁迅的诗文	(173)
莫轻信保健品的广告	(174)
往何处提高自己	(175)
仓鼠不一定怕毒尾蜚	(176)
写点得罪人的感想	(177)
话说‘跑官’热	(179)
教授们的话值得重视	(180)
是黑棉袄值钱还是西服值钱	(181)
论“无批评时代”	(182)
坐轿与抬轿	(183)
值得赞扬的一铲	(185)
这篇社论太重要	(186)
小偷激起的念头	(187)
这不是一条新闻	(188)
请看“西瓜变成葫芦”	(189)
人人可以为尧舜	(190)
高雅风情是可塑造的	(193)
这样办公好	(194)
是应该想一想了	(195)

为何争演潘金莲	(197)
自己不要出卖自己	(198)
难得的好文章	(199)
大家都来扪心自问	(201)
江总书记要我们学哲学	(202)
这也是阶级斗争	(204)
只有苦学才能弘扬炎黄文化	(205)
对苍蝇可以放枪么	(207)
取洋名与怪名的目的是一样的	(209)
自己照照镜子吧	(210)
从“ 幼儿院士 ”想起的	(212)
胡绳同志敲响了警钟	(214)
雷锋活在人民心中	(217)
补充一段话	(219)
向阮直敬礼	(221)
读书吧,育己助人	(223)
论善恶	(225)
对贪污腐败分子应该“ 连根儿拔 ”.....	(227)
行贿亦有“ 道 ”.....	(229)
琼斯先生说实话	(231)
莫教“ 厚黑 ”惑乱人心	(232)
制止暴力轰炸吧	(233)
你说这该咋办	(235)
人民在拭目以待	(237)
加强内力,方能扫荡污垢	(239)
你敢照一照么	(240)
希望“ 贪者常戚戚 ”.....	(242)

保护环境,治理环境	(243)
净化荧屏	(245)
旧话新音	(247)
是谁‘掉价’和受罪	(248)
向家永教授致敬	(249)
推广庆香港回归报道的好经验	(250)
无止境的欲望导致犯罪	(251)
照镜子的方法	(253)
没法查的无底洞	(256)
加强广告管理	(258)
这篇文章实在好	(259)
政绩不是股本	(260)
心硬手才硬	(261)
请想一想	(262)
坚决保护民族工业	(263)
警惕‘团结’的变质	(265)
警惕‘腐而不败’	(266)
怎样使‘都市边缘人’安心	(267)
都应讲‘师德’	(268)
抓好党建是社会主义企业的重中之重	(270)
“死驴”是可以复活的	(272)
曹雪芹答翰端先生书	(274)
编一部《导演大辞典》,如何	(275)
“三策”归一策	(276)
保护包公是必要的	(277)
一篇醒世文	(279)
正心重于正嘴	(280)

造福万代的壮举	(281)
与张教授持一个观点	(282)
我也要去看望毛主席	(284)
不能丢弃的武器	(286)
创造‘声闻于天’的条件	(289)
“垃圾”要天天扫	(290)
读《“小偷尿裤”与“贪官惊魂”》有感	(291)
古已有之的“新鲜事”	(293)
心无挂碍天地宽	(295)
保住清白好奉献	(297)
法国香水的奥秘	(298)
立德治内伤	(299)
圆梦(缀《聊斋》)	(300)
捍卫科学的勇士	(302)
拍板叫阵谁敢来	(304)
短文廓清天下事	(305)
整顿城市的语言文化	(307)

序

写这些文字时，都是把剪下来的报道文章，加上我的品评，相互为用的。打算起个名字叫“存照集”，取其“立此存照”之意。因为这样全文引用别人文字，不合出版法，便把引文割掉，乃改了办法：引用其中关键几句。这样，便称不起“立字存照”了，“存照集”也名不副实了。

又想改名为“燃犀集”，取“燃犀识怪”之意。一则因为所收文字并非都是“识怪”文字，二则有些“识怪”的文字，也应取中庸之道，不必刻责伤人，“燃犀集”的名称，也不妥了。

很明显，这堆文字里包存褒与贬的双重内容，从褒的方面看，可以“瑰宝集”名之，从贬的方面看，可以“虫豸集”名之，二者编在一起，就二不像了。不已，名之曰“未名集”，或可勉强。

这些年来，喜欢看报，尤喜看报尾之小文章。小文章多论小事，出言者因不涉大局敢于直书真事及真意，正如小孩说话之天真，不必戴“实事求是”之帽，坦言实事，并据己见求其是处，虽所求未必尽当，其以实事为据，则是可靠的。比之“便侧佞谀”者强多了。

也还有个“小中见大”的可取之处。付以“安享晚年”任务的老人，虽在闹市之中，院不闭门，也只是常观“罗雀”而已。阳光之下，小院之中，抱小猫歇荫，听鸟语代琴声，观花开花落，温世态炎凉，一盏清茶入口，一只木凳坐倦，报纸为餐，大事不了，小事可揣，兴来时，信笔抒发，也许有说对了

的，说错了的。总是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之意。也许把文章价值估高了。

又是一年春草绿，又是一年梅花红。过一年，添一岁，是真的，但不等智慧与奉献按正比例增长。这不是以谦虚饰骄傲，而是自我解剖以观人。许多同龄人，中年人，青年人都大有长进，对社会主义忠贞不渝，不因个人得失而怯步，这是十分可喜的。也有另一种情况：当年为人民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的，也有人被黄金浪潮打入了鬼域。一国两制有好的，一国之内多种经济有条件的并存是必要的，于今发展到“一家两制”了。面对着子不承负父业，友一阔就变，也难禁无动于衷。心潮起伏，便画出了小小的心曲。此中有味，或有认同，或有歧议，不想了。因为这是正常的。

老了，也有童心。年节来了，幼年时，老人们给出的春节禁忌和祝愿，都还记得清楚，最使我难忘的是我老爷过年时抓得最紧的一桩事：把一捆芝麻秸包上一层黄裱纸和纸钱，放在大门口，名曰“拦马杠”；意思是：不许家里的驮着金银财宝的金马驹跑走。他老人家告诉我：“金马驹，大发财，斗大的元宝滚进来。”如今，黄金广掌人荣辱，不知谁家这样做否。从归元寺的香火如云，关公大神的香火不绝，可知招财进宝有多种方法与方式，不必都搞“拦马杠”。

我家搞什么呢？我最喜欢放鞭炮。这几年，市内禁放鞭炮，实在不舒服。除夕，只好与老伴闲话无话之话。这也是“未名之曲”。曲中有物，不可名状。正月初一，大家见面：“恭喜，恭喜。”虽不带发财，意蕴中也有它，势使然也。

索然无味，索然无名。不是？无名，未名，也是名。小书叫“未名集”还是恰当的。

1999.1.22.

这不是印度独家的特产

1993年3月28日，《参考消息》上刊出“印度官场积弊：送股成风”，《印度斯坦时报》说：“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部长和文官一直在捞钱。为什么公司要向他们送股票呢？因为这是得到他们关照，让上送的文件和申请走得快一点的最佳途径。”因为股票可能使官员和商人“同坐在金矿上”。其实，这种做法，不是印度独有的特产，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这种事，国民党统治中国时，也有这种事。这是金钱走门串户，使户主为特殊政治需要服务的一种形式。贿赂公行，并不一定都是直接送钱，而是有许多形式的，送股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地飞进中国的苍蝇。社会主义者不可不注意。

为民族品格“招魂”

1993年7月16日《长江日报》载有《呼唤人格》一文，专程来武汉讨论夏雨田曲艺作品的马季先生说：“艺术上的高峰，人人都有希望达到，但最后的高低，则是人格的较量。”文章中说：“人格的失落，除了屈服于政治压力之外，来自于种种诱惑：权利，金钱，美女，名望……”这个论断，对我们很有教益，这是非常难得的呼唤。这是为雷锋品格招魂，为民族品格招魂。社会主义极需要用这种呼唤代替为“星”，“家”，“姐”乃至“神奇的××”的庸俗呼唤。人都要求自由，失掉了人格便没有自由，必然萎缩。人的高尚人格支撑着人挺胸拔背，为高尚的理想奋斗，不甘心当衣裳架子，不甘心被黄金杀死自己，这种人才能发出最大的有益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愿有更多的人参加“呼唤人格”的行列。

“文坛登龙术”休矣

1993年7月23日《湖北日报》载有《不要做这样的“救火英雄”》一文，说是一位通讯员眼看年终了，还差两篇见报稿，为了避开重罚，失奖，便编造了一篇谎言稿，刊出了；接着，该通讯员用另一人的名字，写了一篇，揭发前稿的失实，刊出后，他又写了第三篇，做了“真诚的检讨”。于是他在年终得了重奖，很得意地说：“这叫自己放火自己救嘛！”

这位通讯员所用的伎俩是从30年代出版过的“文坛登龙术”上学来的。除了“自编、自吹、自谤”，哄抬空气，以求成名逐利者外，还有许多办法，我不能介绍了。时至今日，这“术”却有了新发展。我不能说“要什么写什么，写什么有什么”是所有运笔者的行径，但这种行径已出现了不少，则是事实。给某厂，某企业家写文章，做广播广告，可能得物，可以得最高的稿酬，可以扬名。道家两千年前就说有长生术，秦始皇，汉武帝都没有弄到手。如今，一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到处都是长生不老药。只此一端，也就得说是一大突破了。但是，这一切跟“四项基本原则”、“总路线”、“事实求是”、“二为”原则，雷锋精神，社会主义良心，怎么挂钩？

磨砖不能成镜 念经岂能成佛

1993年6月16日，美联社马德里发出消息：教皇指责西欧“道德堕落”，敦促教会同政府腐败行为作斗争。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认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贪污受贿丑闻玷污了西欧的道德品质，他说：“我知道道德价值出现了危机，从而影响了行政管理部门。”我相信：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指责西欧“道德堕落”的话是真的，其用意是想纠正“道德价值出现了的危机”，以驱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腐败，恢复“上帝赐予我们的美德”（应说是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尔重注）。我也相信色情交易的“理论”站不住脚。

6月20日晚听了一段讨论娼妓与嫖娼的广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发言人主张禁绝娼妓与嫖娼，以维护社会主义的人的价值与道德风尚，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听了很高兴，因为这是社会主义道德最起码的要求。但有少数人的发言却振振有词：一曰“有人出钱、有人愿卖、乃是个人自由”；一曰“一旦禁娼，会影响吸引外资”；一曰“此业是致富之道”；一曰“可以建红灯区，便于管理，还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说这种话的人不多，却真使人惊魂瞠目。果然是“盗亦有道”、“贪污者必以廉者为不是”。

前几年，“返祖说”曾哄嚷一时，“性解放论”也一度喧嚣尘上。这些人大概不会不知道人是从猴子变来的。直到现在，猴子还是风餐露宿，采野果为生。那些“返祖论者”决不想回到这种生活去。他们的“返祖论”里包含的主要内容是：像猴

子那样随意交媾。我们的祖先曾经过群婚阶段，随着人逐渐地脱离了动物界，才兴起了对偶婚姻。为了优生，丢掉了乱交生活。在我国还形成了“近亲不婚”的习俗。这本来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进步。文明阶段的人类没有不反对娼妓与嫖娼的。

在阶级社会里的剥削阶级都是有权有钱的人物，他们在经济上剥削人的血汗，在肉体上把被迫者当玩物，这就是娼妓产生和嫖娼盛行的原因。在阶级剥削的社会里纵然有人反对，也是无济于事的。揭开锦帐来看，剥削阶级的府里，连石狮子也沾满了污水。

改革开放中，我们大量地吸取了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文化和科学技术，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之必需，要放手去吸取。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峰，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也必然挤进来。我们要发财致富，发什么财？致什么富？在什么思想指导下去发财致富？人民生活提高了，脱离了贫困，过上小康式富有的生活，这种生活应该怎么个过法？要有个正确答案。

“为富不仁”正确地画出了剥削阶级以损人利己为指导思想的个人致富之道。坑、蒙、拐、骗，尔虞我诈、以假乱真、欺行霸市，只要获利，不问良心。雷锋、张思德等辈则是以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指导，致国家之富、集体之富，在此前提下富及个人。社会主义需要的是大公无私，先公后私的致富之道。这完全区别于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的致富之道是不同于资本主义致富之道的。

花天酒地、金屋藏娇、纸醉金迷、暴殄天物，是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狂嫖乱赌、挥金斗富，石崇以“杀妓侑酒”为乐，以童仆穿“火衣”为乐，是中国历史上有过的。社会主

义者知道：要使 11 亿人过上小康生活需要付出很大努力；要使 11 亿人过上中等富裕生活，要付出几十年的努力；要使我国站到世界发达国家之行列，要付出上百年或更多的时间的努力。纵然达到了那个水平，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为人类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民族传统是不能丢的。这是过好的社会主义生活的个性。

娼妓，出卖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嫖娼，也是出卖自己的肉体与灵魂；伤风败俗，致人以斗阔为贵，以损人利己为乐，这是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审美观完全对立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人身、人格、人权、灵魂早化为商品了，社会主义也要商品经济，但不要把人身、人格、人权、灵魂也化为商品。这本来是自明的道理。大风起，飞沙走石，不但迷了许多人的眼睛，也腐蚀社会主义大厦呀！坚决清除娼妓、打击嫖娼，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工作之一。不要手软！不可手软！我们曾经根绝过这些，曾得到世人的赞誉。为什么现在屡禁不止？屡打不完？为什么？

禅宗怀让师给出过这样的答案：“磨砖不能成镜，念经岂能成佛！”

要立法，也要立德

1993年7月12日，《湖北日报》载有《“回扣”这东西》一文说：“决不相信为回扣‘正名’是一种观念更新。如今不给回扣做不成生意，……只能表明时下的商风不正，而不能证明回扣是搞活经济的必要手段。现在危害社会的许多浊流，都是回扣在推波助澜。”可谓立论严正，力挽邪曲，果然十分勇敢，十分难得。我这里补充一件亲身经历的事，请众位思考；再说上两句，也请众位思考。

一件事：我有个同乡个体户请我吃了宴席，酒足饭饱，我问他：“你不要怕露富，请你说句实话，今年赚了多少钱？”他说：“160多万。”我说：“你们夫妇俩混得不错嘛。”他说：“实际上我只能捞到一半。”我说：“那一半呢？”他说：“那一半用去请吃请喝，送礼送红包，还有赞助……唉！”他叹了一口气：“你知道，没‘润滑油’，我这个车子转不动呀！”我当然明白：“我这一顿饭也不能白吃。”我问他：“你请我吃这一顿，我可帮不了你什么忙。”他笑了，说：“我不要你马上帮忙，等我什么时候倒了霉，有你们老同志给我说句公道话，也就行了。”这短短的一席话里，该有多少已作了的文章和正在作的文章？

有几句话：“回扣”、“红包”、“送股票”、“赞助”、“信息”、“支票”、“信用卡”、“金钱礼品”、“馈赠”、“代付嫖款”、“佣金”、“中标”等，在商品流通过程中，都可以互相转化。如果有人当掮客，为甲、乙二方搭桥，搞成了一笔生意，可以

冠冕堂皇地不要“佣金”，却可以用别的形式得到更多的酬劳。资本主义国家的头目们相互揭底，其实那是旧官场的常规，把锦帐揭开，没有一个干净身子。我有一个老师在旧社会当了一任县长，他很坦率地说：“把一捆一捆的白洋送到手上，你能不要？做官，要清也清不了，不贪也做不到。”社会主义不但要惩治腐败，严防腐败也是重要的；要立社会主义之法，更要立社会主义之德。不然，“法会滋彰，盗贼多有”的局面是难免的。

呼唤“兴国调查”之风

1993年7月27日《湖北日报》载有《兴国调研法》，说：毛泽东的“兴国调研法”并未过时，“但由于少数调研者作风并不实在，反而给……农户……企业带来了隐忧。……单说吃饭招待问题，就令基层的领导‘伤脑筋’”。“群众厌恶‘走马观花’干部和‘吃喝揩油’干部。”

工作，需要调查研究，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调查研究，而不是以“走马观花”、“吃喝揩油”为目的调查研究。

太该呼唤了！此风之去也，久矣，不千呼万唤，难得复归。不复归，便不得实情，“实事求是”的箴言便落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怎能贯彻得好？

关键在认真

1993年7月23日《武汉晚报》载文《造林与成效》，叙说了我国森林覆盖面只有12.5%，居世界排名百位之后，形势严峻。说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就植树造林本身存在的问题而言，恐怕和质量意识薄弱（有的甚至是空白）有关系。……植树时轰轰烈烈，植树后冷冷清清的，年年植树，年年造‘零’……”

这篇文章建议增强“质量意识”，反对“形式主义”，要求把“下达的植树棵数记名分配给个人”，负责“包栽、包活、包幼树成长”。这个意见好，但不如后边的建议“认真”好。我曾看过湖南道县林场、湖北官塘桥林场、陕西白河县的令人振奋的美好的造林报告，亲自去看了，完全没有那回事。我对林业部门说挖苦话：“如果按你们的报表所说，连房顶上都长起树了。”挖苦人家是不对的，而且责任首先不在林业部门身上。比如说“覆盖”二字吧，怎么解？在这片地上按规定距离栽上了树，是不是算“覆盖”？还是小树成活了算“覆盖”，还是“枝枝相交通，叶叶相覆盖”才算“覆盖”？从未说有个定义。但是 you 从北京坐上飞机向西飞，一出京郊，经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延至阿富汗、伊朗，可以看到一幅绵延不断的黄画。到了土耳其的博斯博鲁斯海峡上空，你才看见了地上有一片一片暗绿色的森林，一直延伸到欧洲全境。从南京往东飞，一到日本上空，你可以看到山山暗绿，与黄赭无神的中国山完全两样，这就是实际。北京背后的燕山脉，至少报

道了两次以上：“绿化了”。要不用“自欺欺人”四字，是无法解释的。马陵道上孙臆大败庞涓，那时马陵道上古木森森，孙臆才有设伏的条件，今天的马陵道（在大名之南）哪里有森林？海南岛岛东林场，岛西林场，共 40 余万亩，80 年代前期都斩光了。陶铸生前苦心经营的 26 万亩雷州林场，于今剩余多少？其实不必分人记棵数，真正把大块的造林，脚踏实地地去检查一下，不要凭空用计算器计算：栽树多少棵，每年每棵自然生长率有多少，因此每年可增材多少，减去消耗木材数，得出“育大于采”的得数。在这 10 年内，我住地对面那块地方，植树起码四次了，植过松树、樟树，于今只剩了几棵“可怜松”。中国人什么大事都能干得好，关键在于“认真”，不是芸芸众生不“认真”，需要的是众生的“牧者”认真。

保卫国有资产

1993年8月4日《湖北日报》载文《警惕有人吞噬国有资产》，说是“有人借承包、租赁等名义大‘吃’国有资产的现象，很令人忧虑”。还举出用“假合资”、偷税、漏税、抗税等各种办法，吞食国家资产，每年国税流失千亿元以上，每年有约1600亿元的物资、资金、外汇的价差流入个人或小团体的手中。是呀，每年宴请费1000亿元左右，流失国税又1000亿元左右，是一笔很大的财政损失，按11亿人口计，每个公民要负担180余元。这不能不令人痛心，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这2000亿元很可能腐蚀了上千万人（每人以20000元计）。这就是把上千万人的人格、国格给送进了淤泥坑里，使共产党褪色，使党与人民拉大了距离，逐渐走向亡党、亡国的道路，古往今来，殷鉴不远，可不惧哉！

只有在坚贞的共产党领导下，国有资产才能名副其实的是为民造福的资产。在国民党手里的国有资产不都是为四大家族及其臣属服务的么？只要共产党变了质，不必宣布私有化，国有资产自然地就会私有化的。已经看到的事实，就是可靠的证明。雷锋们哪，保卫国有资产吧！

坚决打击卖淫嫖娼

1993年8月2日《人民日报》载文《加强执法力度，打击卖淫嫖娼》，说是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和《法制日报》社联合召开了打击卖淫嫖娼座谈会，指出“卖淫嫖娼活动，是影响我们民族兴旺的大事”。不能错误地认为“以色情活动来发展旅游，还企图试办‘红灯区’……”这个座谈会很重要，大家说：“制止这种现象（指卖淫嫖娼恶行及色情活动）的蔓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对此，某些人，包括某些领导干部缺乏认识。”说得对，可惜的是：“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没有个明朗的态度，更看不出怎样“加强执法力度”。打开天窗说亮话：国际与国内的“皮条公司”已经在不小的范围内组成了。香港的“公司”里有一批“小姐”的联络方法，香港的或外国的嫖客选定了“小姐”，预先通知“小姐”准时接“表兄”下飞机（或火车），领到家里，连吃带住，玩上个把礼拜，出港币万元左右，看来耗资不少，实际比住旅馆便宜得多。其他招徕嫖客的形式也很多，难道派出所和各旅馆企业的经济警察都不知道？解放初，我们能消灭卖淫嫖娼，为什么现在办不到？“卖淫嫖娼活动，是影响我们民族兴旺的大事”，对此，恐怕还是“缺乏认识”吧？

莫 骗 人

1993年7月19日《长江日报》载有《换个说法》一文，引述了《庄子·齐物语》里的“狙公赋芋”的故事：养猴人跟猴子说，给你们芋头吃，早晨给仨，晚上给四个，猴子听了很不高兴。养猴人于是换了个说法：给你们芋头吃，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仨，猴子们乐了。学着这个样子，“听说各级政府，都要转换职能，一夜之间…某局便换牌‘公司’，某长换称‘经理’，……‘摊派’二字……叫‘为生产服务’……”文章慨叹说：“换个说法，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呀！”

换个说法，就换个做法，就叫做“以不变应万变”。不变者，营私也；可变者，欺党，欺民，以自肥也，挖社会主义之墙脚也。看来：慷慨陈词，绚丽口号与实际行动之分离，不可等闲视之。

对时尚的起码要求

1993年7月20日《长江日报》载《也要有非商品化》一文，认为“在推动商品化的同时，也得提倡某些必要的非商品性。”如“住院开刀，本已交了‘手术费’……还要交‘手续费’，乘火车，已买有车票……却要收‘茶水费’，盖公章，要收‘业务费’……”“为了向前看，就得向钱看。把一切都商品化，包括权力、人格、良心。”如果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乃是对工作岗位上人的最低要求；吃和尚饭，撞钟还另外要钱，是无理无德的，这是灵魂化为商品的表现。搞商品经济的范围不论多宽，爱国为民的灵魂是不能商品化的。一个被抓住的妓女为自己辩护说：“我的身体，我有自由，对方愿意买，我愿卖，自由交易，我犯了什么法？”如果这是合理的逻辑，那么，汪精卫、秦桧都可平反了。

惊心应思改进

1993年6月19日，香港中通社北京电，说“灰色消费，触目惊心，亟须制止。”指出某县人口不到25万，却拥有大小汽车近400辆，仅小车一项开支每年就达800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1/3以上。该县一个股级干部的儿子在省城中专读书，每学期要专车去接，一趟花费300元。“灰色消费的形式远不止于此，‘公款送礼’、‘公费上学’、‘公款私存’、‘公费旅游’……”还指出每年用公款约1.8亿元买烟吸。此可以说是令人触目惊心者，如何制止？从何制止？如不制止，腐败之风怎能杜绝？我见过丹麦首相、比利时的总理下班后，私人活动是自己开自己的汽车，只有办公时才坐公家汽车。我见过日本首相就任后住进官邸，离任后立即搬出。中国的封建时代和国民党统治时代，流传着这样的话：“官不修衙，客不修店”，也不在官衙里建私人住宅。这些虽各有其特殊原因，也不无可资借鉴的积极因素。对么？

落实难也

1993年7月23日《长江日报》载文《好政策难到农家》，说是一位记者走访农户，考查农民负担情况，问农民：“中央及省市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知道不？”“县政府印了个黄本本，上有减轻负担20条措施，你们见过没有？”农民都摇头。

这样的采访才能取得第一手的真情况。但这样做太吃亏，先要费力走路，又弄不到吃喝，还可能伤了什么人的胃口，影响了前程。所以，聪明记者、巡视员、调查组、访问团，总以招摇过市的形式去探测。群众也聪明，一切照基层领导指示说话：“政策落实了，白条子兑现了。”其实是没兑现或是“昨天晚上兑现的。”

尊敬的记者，你这大发现，价值万金。搞社会主义的人都会向你致敬。不过，再加一句，可能更好：离开公路，走20公里，到山窝里去，更有妙趣。

自爱、爱人，自尊、尊人

1993年8月31日《人民日报》载有《‘鸡腿小姐’之类》一文，先说了一个故事：有个醉汉大叫“谁叫我一声爹，我赏100元！”有个人便连叫了三声“爹”，醉汉便给了300元。接着又说：有一次，某筹办“选美”单位，征求赞助，某大款赞助10万，条件是要把他推荐的小姐选为“最佳”，果然小姐当选，大款加冕。记者追问“最佳”小姐喜欢什么？她说“俺喜欢吃鸡腿儿”！于是哄堂大笑。文末评曰：“钱之为物，固不可缺，但格不能丢，国格不能丢，原则不能丢，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丢。”

据说：多少年，选美“遭到封建势力的猛烈抨击”之后，“终于冲出险滩峡谷，汇成声威浩荡、气势磅礴的洪峰，”又据说“中国还不知选美为何物”。可见“选美”之来，给中国增加了一大块了不起的“新文明”。其实，这是误解。在中国，不仅皇帝选美，官僚、军阀、大亨无不选美，才子选佳人更是历代皆有。唐代有名美人如薛涛，近代美人如电影皇后胡蝶，褚民谊为之赶马车的美人鱼，都不是皇帝选的。至于那数不清的“交际花”之类，更不用说了。中国在这方面并不落后，至于西洋文明中的“裸体舞”，明里虽还未在中国“冲出峡谷险滩”，在历史上出现了的陈灵公连庆大会，南朝宋刘娥的裸妇群舞，男女淫狎等，也颇不比西洋夜总会的玩艺逊色；何况我国还有选“美男”的经验呢。在今时，谁知道高级舞厅里的“包厢”按摩密室，陪宿女郎，演的什么样“妖精打架”？总

之，中国在这方面并未筑有“马其诺”防线，也不可能筑有“马其诺”防线。不是封建势力阻挡了这种“文明”的发展，而是封建思想“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时时促发着这种“文明”。

刘备说的“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把女人贬到可以任意取舍的供人玩弄的地位。到了近代，人们不这样说了，改称“小姐”、“女郎”等雅号，于是按摩女郎、陪读女郎、陪酒女郎、陪宿女郎等出现了。宾馆、饭店、酒家、游乐场所，选用女性工作人员，第一条件是“仪表美”，可见“选美”之风已经社会化了。不能说在这些行当里的女子都自甘堕落，或甘当“玩物”，但钱色交易，权色交易的封建思想与实践则确实存在，而且在蔓延。

美，是人类的要求，生活的需要，文明的内涵。什么是美？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美？是需要思量的。宋玉提的标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齿如含贝”，也只是躯壳之美。王朝闻同志说，美是外形与内涵的统一，才是正确之论。毫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内涵，以“一笑换千金”，“出场费万元”为荣，自甘受人侮辱的躯壳为“美”，对么？在旧社会的“选美”，是官僚、军阀、大亨、无冕王等辈挥霍银子“取乐”，“找刺激”，今日“选美”的锦帐之后，藏的是什么？无人揭示。“百元叫爹”、“鸡腿小姐”的故事，可以初鉴其奥秘。北京大学的女同学拒绝参加选美，她们说：“我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侮辱。”不对么？自求解放的妇女同胞们，在近代中国史上，妇女中真正光照四野的美人是秋瑾、宋庆龄、邓颖超、赵一荻、刘胡兰等等，绝不是那些用脂粉涂抹了躯壳和“走红”的衣裳架子。

致力妇女解放，要妇女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发挥半边天作用的妇女团体、妇女杂志和报纸，应当在这方面给予最大的培育和启迪的力量，似不该在“奈（爱）何（河）”里，在涂脂抹粉里，在介绍高跟鞋里，把妇女引向自甘自卑的境地。

这篇小文里的“四不丢”应该是男女共同奉行的原则。信守这个原则，指导言行，才有男女平等，才有妇女解放。人必自爱，才会爱人，并得到真诚之爱；人必自尊，才会尊人，并得到社会的尊重。

道德与面子

1993年7月27日《湖北日报》载文《道德与面子》说：“眼下，无论是求职、调动，还是出差、购物以及上学、就医，到处都充斥着极不道德的‘非礼’行为……又有多少人从良知和内心感到贪污腐败行为的可耻丢人现眼呢？”“面子都可以丢”了。

齐白石写过一首小诗：“宰相归田，兜里没钱，宁可为盗，不肯伤廉。”此乃愤极之作。连孔夫子为求官都去走南子的后门，一般人卖身（如李延年、邓通、韩嫣、薛涛者流）卖人格（如冯道、秦桧者流）求乐者，就不必说了。但这不是中国的国粹，也不是外国文化的精华。

曾经是很讲面子的中国人，今天似乎并不怎么看重面子了。

过去，大凡搞不正之风，以权谋私的人，多少觉得有些见不得人，怕阳光，多少还是顾及点面子。现在好了，什么“有口皆碑”的殊荣，什么“千夫所指”的耻辱，那都似乎成了久远的过去。眼下，差不多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品尝了腐败和不正之风之类的非道德主义苦果。无论是求职、调动，还是出差、购物以及上学、就医，到处都充斥着极不道德的“非礼”行为。但是，到底又有多少人从良知和内心感到贪污腐败行为的可耻，感到请客送礼搞不正之风是有失体面，丢人现眼呢？充其量，顶多只是像臭豆腐一样，当别人吃的时候闻起来很臭，一旦自己吃起来则是很香的。

也许，会有人说，现在价值观发生了变化，面子思想也要“解放”了；有权有势有面子，无权无势哪来的面子？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发展市场经济决不是连道德都不要，连面子都可以丢的。否则，整个社会生活就会走向一种浑然无序、无规则、无耻感的非道德主义状态之中，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将何以健康发展呢？惟愿爱面子的中国人，千万别连面子都不要了。

反问一句即得答案

1993年10月22日《长江日报》之文曰《反腐应进豪华包房》，说是《南方日报》为配合反腐败运动，派出6名记者，巡访10天，到处看到豪华包房内，出入者尽是白天喊反腐败的“公仆”们。他们大吃大喝：一个龟蛇鱼翅7000元，两只金钱龟2000元，一道“龙虎凤汤”7000元，他们与“三陪”小姐欢歌漫舞，不知魂之所之。

有一种不成文的理论：“在经济往来时，宴请可以机动些。”“没有‘三陪小姐’，有碍旅游业发展，有碍吸引外资。”于是有的报纸对此展开了讨论。

其实用个反问做答案就可以了：“如果由你自己出钱，你敢吃一顿一万元或数万元的饭？”“如果叫你的妻子、女儿、姐妹做‘三陪’小姐，你愿意不？”

《南方日报》短文里的小标题：“包房乾坤大”，是很值得玩味的。这里本来吃的是“花酒”，吃完了花酒还做什么？作者笔下留情，没有说，但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广州公安局的档案里可以查见一斑。

用公款点歌，用公款打高尔夫球，用公款添置高档服装，用公款出国“考察”，用公款装潢居所，用公款送礼，用公款酬宾，用公款报“卫生纸”……用这一切表示“潇洒”之风，正在滋蔓。

仅武汉市就有300余家舞厅、卡拉OK；“美食城”不知有多少。每晚多少“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这边

厢纸醉金迷，那边厢里的农民年收入不过 500 元。公仆们哪，不念“老三篇”，也该念一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万元一席，“潇洒”了 20 位农民兄弟一年的生活费呀！

公仆们不应这样干，有钱的阔大爷们如果还有民族良心的话，也应有所斟酌吧？

这种行径，“使国家财力流失，社会风气败坏。”中央大力反腐败，如果能从“潇洒”的千亿中夺出二百亿，那么，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扶贫的资金问题，就可以缓解了；社会风气也可以好转一步，还可以救出若干行将上断头台的人。

法盲是存在的，因为谁也不可能背诵那么多的法律条文；思想盲也是存在的，因为谁都知道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挥霍公款、搞三陪、赌博、抢劫、盗窃等是不法或不德之行为。看来商鞅的理论是对的：“导之以德，齐之以法。”因为“令虽明，不能独行”，“若其怀邪，智益为害”。国民党立了那么多法令不管用，就因为它不能“令民与上同意”。

保证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不真正过硬地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到处滋蔓的不良现象，不处之以果决手段，众口相感，民心离异，将何以堪！

照新沂市的榜样去办

1993年7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且看新沂市委如何处理乱收费》，介绍新沂市委听取了调查汇报，采取了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注意分析了收费项目中的“其他”项，对其中合理部分保留，不合理部分坚决取消，列出清单，公之于众。效果不错。

新沂市委持“接受批评，有错必纠，吸取教训，改进工作”的态度，立即行动，纠正“其他”乱收费，实在是搞社会主义的榜样。实际上向城乡人民以“其他”名义要钱的并不止新沂一地有，有的地方不但有“其他”，而且有“冒名”收费，收款名曰：“特产税”，不搞特产的也收税，便是一例。别的还有什么名目？只要坚持党性，不问自知，大家应以新沂市委为榜样行动起来，制止乱收费。

富了怎样生活

1993年7月27日《人民日报》载文说《富裕，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认为“富裕”并不单指“有了钱”，而是包括衣食住行水平的提高，也包括教育、卫生、文化诸多方面的发达。指出“生活质量问题，不仅仅是吃饭，还应包括良好的教育，健康的身心和较高水平的文化等”。这个论断是对的。

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

有的人善于利用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有的坏人则利用它制造杀人武器、腐败文化、害人伤德。党的总路线要我们两手抓，是要两手同时抓，以精神文明促物质文明，以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更大的发展条件。有了钱，便醉生梦死、花天酒地，于人类何益？

北京真地动手干了

1993年7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公安机关查封14家从事色情服务的酒吧和咖啡屋，拘留了47名从事不法活动的老板和服务人员。看来，只要认真清理，这些从事低级下流、腐朽淫秽活动的场所和力量，是可以弄干净的，问题在于：下不下得狠心动手去干。

好哇！北京动起真格的来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必须严禁卖淫嫖娼，因为这些是伤风败俗有害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毒素；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定能够消灭卖淫嫖娼，因为广大人民群众支持这个做法。北京干得好，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以及其他城市怎么办？是照北京的做法办？还是任“陪宿女郎”自由向旅馆房间打电话问：“需要我陪您么？”

富裕不等于文明

1993 年 6 月 29 日《人民日报》报道：10 年来，广东南海县经济大发展，跨进了全国 10 大财政县，列入百强县之第 4 位，1992 年该县农民人均收入 2482 元，人均储蓄 8357 元。该县领导的体会是：搞好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政治水平和领导水平。他们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不等于文明。

南海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迈大步，搞改革，兴致富之道。（二）富了之后，还要本着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生活：反腐败、反拜金主义、反极端个人主义！

文坛登龙术也

1993年7月27日《人民日报》载《文卖标题》一文，说是“文稿销路如何，与标题很有些关系”，认为有些文章光在标题上下功夫：光怪陆离，怪影怪形，以求读者光顾，不在内涵上下功夫，如“战栗的夜”、“血泊中的三十六具女尸”、“××女皇最喜欢的两个男人”……总在突出黄色刺激或黑色刺激。文章认为：严肃的作者不应如此。

其实：这也是文坛登龙术之一，属于此类者甚多，即荀况所谓：“乱道之兴，文章匿而采”者，枚乘作“七发”，接踵而来者：“七激”、“七依”、“七辩”、“七厉”、“七启”、“七释”、“七说”、“七讽”，莫不“穷环奇之服馐，极蛊媚之声色”（《文心雕龙》）。“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梁·裴子野·雕虫论》）。现在，不但标题立异，而且艳色丰盈。真是“谀词云构，夸丽风骇”，却无益于总路线。

要有社会主义精神

1993年7月29日《湖北日报》载文《也要讲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对独立性》，论述了强调一切工作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时，不可漠视思想政治工作，应保持其相对独立性；认为金钱不是万能的，人多得实惠，思想觉悟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提高，才能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这就是要靠思想政治工作。

这篇文章，归根还是讲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它贯穿于工作的所有方面；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支柱，是建设不成的，不但个体经营可以直接滑向资本主义，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可以变成私人营利的工具，那能骗到百万、千万的事，就是明显的例子。国民党统治时，中、中、交、农四大银行，矿山、铁路等等，不都是公有的么？然而都是四大家族的剥削工具。思想政治工作并不是说话的工作，是要按宪法和党章办事的工作，是坚决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行动的工作，欲正人先正己，像关心自己那样去帮助别人，带出一支勇于为社会主义献身、敢与一切腐败势力和现象斗争的队伍，才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钱、美女的召唤，钱权交易的泛滥，人格、国格都可以卖钱……没有雷锋的精神是抗不住的。要做真正的人么？这是要每个人思考的，这是政治工作的根本追求。

贿赂与馈赠“有别”也难别

1993年12月3日《法制日报》载文《贿赂与馈赠有别》，说“正常馈赠是行为人基于亲友情义将财物无偿送与他人，而贿赂是行贿人利用他人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解决某一问题，而将财物给予他人，前者一般是公开进行，而贿赂则总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这篇短文在不要把“馈赠”与“贿赂”混淆起来，以免把受“馈赠”者作为罪犯处理，用意是好的。但，这条界线从来也没有人划清过，今后也不可能有人划得清。自古至今，以“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的事，是数不胜数的，像钱邴用酒瓶装瓜子向赵普行贿的事，旧日官场上随处可见。今天，以“馈赠”为名，拉关系，为自己前程铺路，很“时髦”：送吃的，送用的，送“方便之门”，以及送装有现金或信用卡的点心，等等，还少么？只要把某些人的薪水和他家里的装潢、摆设、用度，做个比较，这些事是不问自明的。你要问“怎么这么多东西？”他会回答：“朋友们送的。”确实是“朋友们”送的。每个贪污犯都会把捞到的钱的相当一部分“馈送”各方，打通关节，寻找“保护伞”，不然，一个小小人物，怎么能调动亿万贷款。一位个体户（我的同乡）曾对我说过点实话：他一年可以捞到160万左右，要拿出其中的一半，向各方“馈送”，“不然的话，我怎么能用低价把国货弄到手？”他的话道出了在世路或仁路上的许多陶朱公子孙奉行的哲学：“世路（或仁路）难行金作马”，“放长线钓大鱼”，“满天处处云，块块能致雨”，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腐败势力织成的网罗，比蜘蛛网大得多，周密得多。他们并不时时事事以急功求近利，他们知道“滴水可穿石”。钱放出去，是可以加倍收回来的。

要日日刹“八风”

1993年12月18日《工人日报》载文《岁暮年初狠刹“八风”》，所指“八风”为：浮夸风、索要风、滥发钱物风、滥检查风、滥评先进风、送礼风、大吃大喝风、工作松懈风。

《工人日报》建议在岁暮年初要狠刹八风。这个建议是反腐倡廉敦风易俗的好意见。这“八风”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存在，它浪费了国家财产，浪费了黄金时间，浪费了工作精力，也摧残了人间正风，归根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对于这“八风”，不仅岁暮年初要狠刹，长年都要狠刹不止。这是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总路线所必需的。

要正评人民艺术家

1994年1月12日《人民日报》载文《“炒炒”我们的明星》，说正当上海以严肃认真态度，为弘扬民族艺术文化评选“首届上海十佳优秀青年演员”时，正是“港台明星”、“外国名星”在国内的社会上炒得炙手可热的时候；文章慨叹地说：“炒炒我们的‘星’，不要再去‘炒’那些外国老板花几万元就可以‘包’去的金丝雀。”

上海市文化艺术拓展公司的壮举和呼声何等及时！何等凛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大力加强，中央一再强调，并不断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但一时还不能把局面扭转 to 令人满意的地步，因为有一部分人总是见利忘义，用不健康的所谓“艺术”引导一些人（包括青年）去“炒”所谓“星”，走不健康的道路。在这些人的眼里，好像中国没有能促进人民健康向上的艺术明星。

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毛泽东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宣部选出的百部电影、两次梅兰芳金奖大赛，都展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民艺术家，人民热爱这些艺术家的艺术。但这些艺术家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常常没有演出的机会。浪费了他们的艺术生命，也使人民失掉享受人民艺术的机会。愿大家都学习上海市文化艺术拓展公司的经验，下决心弘扬民族文化，振兴高雅艺术，坚决抵制中外“艺术”垃圾。

堵堵漏洞，救救教师

1993 年 12 月 21 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全国教师工资拖欠近六亿”，要求各省市认真落实国家教委的指示：“在 1994 年 1 月 1 日《教师法》正式实施之前，在全国解决教师工资拖欠问题。”

国家教委要求在 1 月 1 日前解决教师工资拖欠问题，迄今并未达到目的。据说每年宴会要用掉 1000 多亿，税款偷漏约 1000 亿，与外商合资企业固定资产核定要流失上千亿……我们从这些地方紧一紧，紧不出几亿元给那些清贫教师们解解生活之急？

《参考消息》上曾公布：全国已启用的高尔夫球场有 10 多个，正在兴建的有 50 多个，正在筹建的有 50 多个，打一场高尔夫球要 1000 多元（加上服务费、饮料、点心，实际不止此数）。还未达到小康的人民，能去享受这种娱乐？如果把这里的投资移出一点来，为教师解困，为教育事业加把力，不可以么？

高尔夫，缓建些吧

1994年1月29日的《参考消息》，载有周薇薇先生短文《效颦何必高尔夫》，介绍了一位美国作家反对建高尔夫球场，说是那么大一块地方，挖几个小洞，供几个有钱人享受，太可惜了；为了保护草地，每年喷洒大量农药，污染环境，危害百姓。

周先生希望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不要东施效颦，不要学美国，因为美国地广人稀，我国人多地少，土地太珍贵。

是耶？非耶？听之，思之，宜予度之。1950年，我国人口不足5亿有耕地15亿余亩；1993年，我国人口已过11亿，耕地面积未加多。而高尔夫球场已投入使用者10余个，在建者50余个，筹建者又50余个，将何以堪？

另外，“美国文化有极大侵略性，对其他文化造成极大威胁”的话，恐怕也不是空谷来风。

从实际出发，健康地搞好改革开放，周先生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雷 锋 来 吧

1994 年 1 月 15 日《人民日报》载文《为“志愿者”喝彩》，介绍了北京、上海、天津及其他城市的 10 万大中学生服务队，于 1994 年开年时，用“热心服务社会，知识奉献人民”的精神，给神州大地铺上了光彩；在这“黄金宴掌人荣辱”大潮冲击下，10 万志愿者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无私奉献精神”，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弘扬这种精神。

欢迎你，雷锋来；亿万众，把手拍。中华土，桂花开，香四野，倚天栽；奋铁臂，把山开，扫垃圾，除尘埃，光世界，明镜台，驱妖雾，靖邪灾。筑新础，造蓬莱，桃源有，眼前排；科技旺，增产快，商品多，市场迈，民生阜，道不衰，共富裕，共畅怀，老有养，壮有才，幼有育，残有赍。普天乐，乐无涯；所赖者，雷锋侪，甘奉献，心乐哉，创新史，志崇哉。坐标定，莫徘徊，步步稳，永不殆；伴亿万，不分开。人民的乞求是：雷锋啊，你不要蜻蜓点水就飞开。

要读好书

1994年1月10日《人民日报》载王乾荣先生文章《重提“青年必读书”》，说是一位作家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位女青年在车上埋头苦读，叹曰：“有多少像她这样的小姑娘，知道世界上有一位昆德拉呢？”王先生说有人曾对73所中学文学社团3000名社员做了调查；50%的人未读过中外文学名著……仅限于读通俗传奇或武侠打斗小说之类。美国国家人文科学促进委员会为改变学生“在人文科学学习上的下降趋势”专门订制了中学生必读书目。

我看到过一所监狱，成群的男女犯人，几乎都是十七八岁到20岁的青年。他们长相、衣着，看上去都称得起“潇洒”。我看过劳改队，情况和关着的犯人差不多，从远处看去你会以为他们是放学的学生队伍。

有人说他们年轻无知，是“法盲”，随便走上犯罪之路，我认为这不很对。杀人、抢劫、偷盗、强奸、拐卖、贪污等，自古及今有谁不知道这是犯罪？可他们是犯了，有些犯了再犯，原因何在？

说他们不读书？不对。对于凶杀、淫靡、盗贼、妓女之类的书、报、刊和电视，他们中许多人如醉如狂地去读，去看。对于人间真、善、美的精神食粮却茫然无所知，无情趣。

他们犯罪，罪不可赦。然而，引之入彀，始作俑者，是谁？

“青年必读书”，这话我很赞成。但必须加上一个字：“青

年必读好书”。还得加上各文化部门要对青年“导之以德，齐之以法”。要多出好书、好电影、好电视、好音乐、好录像带、好广告；要让去世了的和活在世上的张思德、白求恩、雷锋们一年 365 天占领阵地，把那些庸俗低级腐败的垃圾，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上清除出去，创造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晋王导待罪，周伯仁为之上书辩诬，后周伯仁被囚；王导不救，乃遇害。后来，王导得见周伯仁救己之表，才知道周伯仁是为他死的，叹曰：“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们也许可以由此引出一些反省，然后用实际行动，来个“两手都要硬”。

赞李玉安同志

1994年3月25日《老年文汇报》刊出《“活烈士”李玉安在汉二三事》一文，介绍了巍巍同志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文中所载在松骨峰阻击战中，中国志愿军一群壮烈牺牲了的战斗英雄，墓碑的名字有李玉安，到了90年代李玉安所在部队才发现了他还活着，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接他来武汉。这位默默地在黑龙江海伦县粮管所当了40年保管员的英雄，到武汉后，只住招待所，拒绝用酒，拒收任何礼物……

泰山不能比其高，白玉不能比其美，金石不能比其坚，清泉不能比其洁。用这几句话赞美李玉安同志，毫不过分。许多追求“真、善、美”的人，一生也不一定懂“真、善、美”是什么内涵和外貌，以为用脂粉可以涂出“真、善、美”，用绸缎可以裹出“真、善、美”，用金银可以镀出“真、善、美”。他们辛辛苦苦，绞尽脑汁，丢掉人格，大侃“真、善、美”，甘心做脂粉、绸缎、金银的奴隶。

“我就住招待所了”，“不把酒拿走我就走”，把送给他的一点钱、衣服和香烟全退了……这是李玉安在武汉留下的几个镜头。

这些事极其平淡，人人可以办到，但有几愿这样办？这些事毫无叱咤风云的英雄气象，却有着震撼乾坤的气概。

许多人确实多次被李玉安、雷锋、黄继光、董存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正气感动过。感动之后，有的人跟着英雄们迈出坚定的步子；有的也跟着走了两步，知难而退了；有的人只慨

叹了一口气，感动劲“消失了”，随世俗的浊流漂走了。

战场上的硝烟和子弹，敌人的屠刀，曾使革命队伍中的弱者有的当了逃兵，有的当了可耻的叛徒。大浪淘沙之后，留下了李玉安这样的金子。

今天，没有战争，没有白色恐怖，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从1949年10月1日那天起，历史便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生活好了，该怎样保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确保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和坚不可摧？建国以来，腐败势力不停地从各个方面侵害着党的肌体和社会主义的大业，于今为烈。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

这不是改革开放之过，是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出现的许多前人未遇到过的问题，要求我们坚持革命的优良传统，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分辨是非，择其是者而从之，见其非者而祛之。

在这里，最需要李玉安的精神。

这种精神确实可以变成物质：它可以从宴会桌上夺回千亿，从资产流失中夺回千亿，从铺张浪费中夺回千亿，从偷税漏税中夺回千亿，从伪劣假商品中夺回千亿，从驱除盗窃犯罪中夺回千亿，这是个概数，却是个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物质数。

学雷锋，树新风，让我们以李玉安为标兵吧。在实践中学他，而不要用口号代替实践。

可以摸得清，把得住

1994年1月27日《湖北日报》报道：近13年来，统计资料表明，国有资产平均每天流失约亿元的“家当”，进入了个人或小团体的腰包。文章介绍了各专家分析的流失原因：对国有资产漏评或低评，产权模糊，随意处理，管理不善，低价处理，“移花接木”，化公为私，等等。

林、王、赵、詹四位的分析都有道理，合乎实际；不足之处在于只道出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种种渠道，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流失”就是损公肥私或经过局部、小团体，最后还是便宜了个人，这里没有“摸不清”的事，“摸不清”是现象，不去摸，把国家财产弄成一笔糊涂帐，才便于混水摸鱼。几位同志的文章虽讲了“流失”的许多花样，却没有说到当前正在流行的一种花样，即中央要求的经济实体必须与机关团体脱钩，而明脱暗不脱的，还很多很多，因为那些经济实体都是靠公家的财力和关系撑起来的，一旦把支撑柱子抽掉，它怎么生存。再说，机关、团体失掉了从这些实体抽利，如何改善内部生活条件？所以，机关、团体与“脱钩”的实体，藕断丝连，互补互利还是“必要的”；于是国有资产还得继续“流失”。

“流失”二字很新颖，听起来也还温文带有雅气，其实，还是用“盗窃”合适些吧。正本清源，要遏止这种危险，还是要从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上着手。真正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就会把国有资产当自己的生命看待；有这种精神，没有摸不清的国有资产，也没有把握不住的国有资产。

妇女要自求解放

1994年4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妇女报严正批驳“色情服务有理”论》，指出色情服务给妇女带来极大痛苦，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容忍，毒化了社会风气，侵蚀社会肌体，把人们引向腐化堕落；主张坚决制止色情服务、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

《中国妇女报》严正批驳“色情服务有理”论的系列文章值得赞扬，因为我们被那种谬论折磨得太久了。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必须扫除这种丑恶现象；为了妇女解放，更应扫除这种丑恶现象。这是浅显易解的道理。

然而，令人不解、令人厌恶的是：有的妇女领导机关出版的报刊，竟然为这类丑恶行径鸣锣开道。它们当然没有直白地提倡卖淫与嫖娼，而是提倡选美，炒星，大侃卖弄色情的“潇洒”，不厌其烦地宣扬“交际花”的花花故事，连篇累牍地颂扬性爱的“崇高”等等。

严正的评论，是扫除丑恶现象的开端，要真正达到目的，还必须行动。某些大饭店的房间里，很容易接到语音柔媚的电话：“你要我陪伴么？”一到黄昏，若干大饭店门前或车站等场合，很容易找到“伴女”；在舞厅和卡拉OK场所都有专供男女“卡拉”的包间；至于“三陪”女郎更是随处可见的。妇联当然扫不掉这些，妇联应该发挥半边天的作用，督促党政军民合力奋起“千钧棒”，痛打“白骨精”。

天下太平

1994年3月27日《人民日报》载文曰《谨防豆浆里翻船》。这个题目够新颖的。文章介绍的是某杂志上的一篇通讯《在一杯豆浆里翻船的男人》，说是某市体委的一位颇具才干的副主任，喜欢喝豆浆，一位女人便天天给他送豆浆，用豆浆把他灌迷糊了，引上贼船，成为经济犯罪分子。文章要我们读欧阳修写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的警句“智勇多困于所溺”，以后唐庄宗李存_饒之失败“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戒。

在各种“豆浆”里翻船的事已经见到许多了，有的人确是不知不觉地落入人家圈套的，然而这些顺着腐败风走路的人，却不是不知不觉地落入圈套，而是甘愿上钩的。住到大饭店里，总有“小姐”给你打电话：“要陪伴么？”在许多舞厅和卡拉OK等场所的包厢里，有小姐愿意陪你“卡拉”；特殊的按摩场所有“小姐”给你按摩；有“朋友”自愿送上股票、金银饰物或“辛苦费”。这些“奥妙”是人人明白的，有的社会主义刚气的人顶住了；甘愿堕落的人，自动走上“翻船”之路，据说是为了寻求“刺激”和“人生之目的”。

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增强内因才是最有效的抗菌素。“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口号，不要成为口头禅或文章的装饰，应真正成为实践目标，则天下太平。

还应该深一步想

1994年4月15日《长江日报》介绍了“东方时空”节目组在汉追踪报道：《肖想莉现在怎样？》，说是年纪幼小的肖想莉悉心照顾盲人父母的动人事迹传开后，得到了机关、部队、学校、企业各方的赞誉和鼓励，捐赠款物和来信；在她的狭小的阁楼里，摆满了寄来的食物、书籍、文具、衣服、用具等，小想莉现在想上大学了。

“东方之子”的主持人白岩松先生觉到了一丝隐忧：“现在，已有10多所学校请她去作报告，太多了！”

从照片上，我看见了这位可敬、可爱、质朴、纯静的孩子肖想莉，她有着幼弱的身形，秉赋的高尚、坚强的意志，悉心供养了盲人养父母，勤苦耐劳，的确令人不得不崇敬。矜孤恤寡，惜老怜贫，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缙绅舍身救父之类的事，史书载有很多。在肖想莉的身上，再现了这高贵的品德，党的报纸、刊物、影视、广播为她唱颂歌，引来社会上有正义感的人们支持，从而兴起祛邪扶正的壮举，弘扬轨物范风的声势，是完全必要的。

我提议再深想一步。

像肖想莉这类的事迹，已经报道过的不止一次或几次了。受到这种照顾的人得到了安慰。可是，12亿人民中还有上亿的人没有达到温饱境地；已经得到温饱或小康的地区中，还有在温饱线下或受虐待的人。若干个人的义行，只能是济困解难的补充，不能成为全面解决问题的条件。对老、少、边、贫地

区，党和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大有希望解决问题。已经脱贫地区的困难户和人应如何解决？这里有个立法问题，党和政府已经立了若干法并在逐步完善。还有个社会保险问题：一批离退休干部或工人的合法收入，不能保障生活和医疗支出，破产了的企业或出卖给私人的企业中的职工生活安排问题，在个体企业中的职工、在合资或独资企业中职工的劳动保护与保险问题，合同工和流动打工仔的劳动保护问题、农民中的退休养老问题，大都需要解决。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力物力有限，不能高标准地解决这些问题，但要分别情况去解决。物质上的保险，低一些，人民可以原谅。像有些打工仔或合同工，连最低劳动保护也没有，连个洗澡、喝净水的条件也没有；有的工厂卖给了个人，每个职工发一笔钱了事；三资企业和个体企业中，有的任意加班加点，有的大量使用童工，有的严重侮辱职工人格……这类事是应当解决的。

社会上存在的应该由政府给以系统照顾的人，比那些贤明分子已经照顾到的人，多得多。这是应该想到和设法解决的。

也算祛疑解惑斥谣

1994年4月12日《人民日报》载雨石先生文《“气功师的预测”及其他》。说雨石先生听说气功师能为火箭发射占卜吉凶，便带着疑问去请教了航天专家，专家用反问的话回答了问题：“如果真是这样，要我们27万航天职工干什么？”有此一句，也就不须再多说什么了。

我听到气功能为火箭发射占卜吉凶的传闻比雨石先生可能更“逼真”：一位有地位的老同志告诉我，咱们第一次为外国发射卫星未成功，一位气功大师预先就判定了；第二次将发射时，大师又判定可以成功；之后，中央奖了这位大师20万元，因为是一位老同志说的，又联上了中央发奖，我不敢不信。

以手心识字的特异功能，曾在我面前失灵。名声赫赫的气功大师带功讲演我听过，带功录音带我用过，对我没有起作用。一位同志请一位大气功师（名字我不写）看病。这位同志对江湖伎俩有些研究，不论大师怎么问，他始终不吭气，大师抹着他胸部的左侧下了个不疼不痒的断语：“你的心脏需要注意。”大师却不知道这位同志的心脏是长在右边，给人留下个笑料。又一位大师跟我说：他一发功竟使上百亩麦子增产了百分之三十，事有凑巧，翻阅他的著作，正看到他一次发功，把人的黑痣去掉了。我请他给我去痣，他说：“这个场所不适于发功。”

我面对着一摞一摞的气功著作，眼前还摆着陕西灵鸽附体的“真实”记录：“灵鸽！您好？”“您好，观众们好！”“您都

会干什么？”“我会诊病、唱歌、认字……什么都知道。”（这都是白纸黑字精印着的）我虽然不相信，却不敢出面反驳，怕的是以“诬陷罪”把我送到法庭上去。

我有一位朋友也是气功师。我对他说，你的功要攻动了，我就信。他攻不动，说了一句可信又不可信的话：“你不信，就不灵。”这话我懂：小庙上，大树上，常常挂着“诚则灵”的启示嘛。

问题也就来了。一次大师带功讲演的听众，常达万人；票值总和动辄几十万元。为什么这样多的人信？这是值得分析的。

一部分人确实去求健身之道的；气功作为一种运动形式，适当运用，有益于通经活络增进健康，这是已经证明了的；哪怕最简单的功法“吸吸、呼”，也是有益的。

在商品经济大潮中，黄金浪卷，迷住了一部分人的眼睛，追求个人享受，物欲愈高，内心愈虚，迷信便成了填补心灵的一剂药方，信神、信鬼、信气功万能。

人有迷信，又有人促人迷信，那就是我们的书刊电视广播，煞有介事地大肆宣扬，成为商品经济中逐利之一道。其实，那些大师的表演，远不如魔术师的本事，魔术师可以使人横卧悬空，可以踏火行走，大师们也许将来会学到这种技术，至于那刀枪不入，缩骨伎俩，早天桥表演多年了。可惜的是：我们不少宣传媒介，竟然为之推波助澜，实在可惜。

一个善良的劝诫

1994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刊出《给装修都提个醒》。提议装修不要过热，不要过于奢侈；要知道我国还有8000万人得不到温饱，还有千千万万边远地区儿童贫困失学，望省下点钱支援贫困地区，捐助“希望工程”。这个意见应说是对的。

“如果从巨额装修费里挤出一点，支援贫困地区，捐助‘希望工程’，我看比豪华装修更有意义得多。”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善良要求；却是一个难以实现的要求，何以故？试探言之。

现在的情况是：有职有权的人比无职或无权的人搞装修的多；无职无权而有财源的人比无职无权无财源人搞装修的多；富起来的个人比平民百姓搞装修的多。富人搞装修是法律不能限制的，有职有权的人搞装修往往是不求可得，也不能说是犯法的。归根到底对社会来说是一个树立社会主义新风问题，对于党员来说是一个树立党性问题，对于干部来说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品质问题。如今腐败风滋蔓不止，装修风越来越盛，装修风早已贯穿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了：千元的衣或鞋，万元一桌的宴席，大量的豪华汽车，高贵的相机、钟表、戒指、大哥大，不是随处可见么？如果不是以权谋私，单凭这点薪水，怎能过得这样豪华。

眼下，有一批干部、教师的拖欠工资和按国务院规定补充退、离休干部和工人的应得工薪，还未解决，他们真是嗷嗷待哺呀。为什么不先解决这些，缓搞衣、食、住、行、用的装

修？真令人不解。

然而，腐败风不止，善良的劝戒，是无济于事的。

咱们喊个“跟我上”吧

1994年2月14日《人民日报》载文《成败系于人心》，介绍了山东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繁荣，一个重要原因是：把改革的着眼点更多的落在人的身上；认为改革成败与经济盛衰的关键所在是人，不是物，“成也人心，败也人心。”

我们一直加强科学管理，这是对的，重要的是，但许多讲“管理学”的书上没有把提高人的积极性做为实现科学管理的首要因素。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有了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懂的东西，他会努力去学，懂了的东西，他会忠实地去行。武钢建设第一座高炉时，需要32个九级焊工，找遍了武汉市才找到9个高级焊工，有不少不够级的焊工要求参加，选足了32人，经过短期训练，他们发挥了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神，一次就高质量地焊完了高炉炉壳。这是当时的专家们没有想到的。反过来，我们再看一件不如意的事：1983年全国工业流动资金周转期为90日左右，到1991年却是130日。多了40天，该压了多少资金？使成本又提高了多少？在这一方面，不是设备比以前落后，不是技术比以前降低，而是人的积极性削弱了！

人的积极性怎么削弱的？

因素很多，几句话说不清。总起来一句话就是：没有有效地调动起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反，那些背离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行为，搅乱了人们的精神；许多党员不是本着入党誓言去做人，不少干部忙着以权谋私，多听到“给我上”的催战呼

声，少看到“跟我上”的实践。群众的心冷了许多，讽刺的歌谣和谩骂到处皆有，难道这不是削弱生产力？

请戈培尔退位

1994年4月25日《人民日报》载万富先生著《论文的贬值》，他说“时下，论文十分时髦。……产量倍增，质量却严重下降。”“这是论文的悲哀，应当引起重视。”

我认为：追时髦是现象，为了取得“学历”是本质。

提升干部要学历，评选教授要著作。没有相当的学历，构不成“四化”干部，没有一两本著作，当不成教授。

有许多人的确下力学习了，得到了真实学历；有人做起了艰苦的研究工作，出了有价值的著作；这是可喜的，应当嘉勉的。

但同时，也出现了买书号凑著作，凑论文，追学历的现象。更不好的现象是：有些机关对干部进行学历考试，监考的老师逐一地帮考生把答卷做好，于是成群的干部便有了“相当于大专学校”的学历。

还有一种稿酬最高的“论文”，那就是不顾实际地吹嘘××企业或企业家、产品、药物、气功等著作或论文。实际上是为推销伪、劣、假商品的广告。一旦写自我简历时，这些还是要列入的。

这类“论文”如果真的在人们心目中贬值，倒是好事。戈培尔的“定理”：“谎言重复多遍便成真理”，还在起作用；起着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的作用。反腐倡廉的斗争中，这也应该列为腐败风的一项，加以扫除。

我的困惑

1994年3月27日《人民日报》载文《为了孩子，要改造成年人的世界》。文章说因为我们已从“铅字文化”时代走进了“音像文化”时代，大量电子声像成了广泛而经常的媒体，其中裸体、挑逗、暴力等内容很多，虽然不都是为儿童创作的，却直接影响着儿童；70年代末，儿童电视剧与成年人电视剧的比例是1：3，到1987年下降到1：99；但是供成年人看的，儿童也要看，不能不给儿童以坏的影响。日本禁止电视台于晚上十一时前播放“杂七杂八”的内容，香港政府对电视上不许出现的对白和镜头有详细的规定，这都是为了孩子。

“如何为孩子改造成成年人的世界？”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孩子世界里的脏物是成年人造成的。成年人给孩子送上什么样精神的和物质的粮食，决定着孩子是否能健康成长。这是对的。

我是成年人，也有我的困惑之处：我的小小樊篱实在挡不住四面八方袭来的惊涛骇浪。我真心实意希望孙子学好，可是我无处给他买到百元以下的成套衣服和廉价的鞋子；我挡不住他接触乌七八糟的书、刊、报；在电视和广播的黄金时间里，离奇古怪的广告、武打、淫秽镜头，把我的一点家庭教育打得七零八落。党中央决定播放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很好，可惜的是，无益于孩子身心的电子游戏机、音乐、录音、录像，来势更烈。这是尽人皆知的。虽然“清洁”了一下，可是“清洁”不绝。原因何在？

“时间就是金钱”、“空间就是金钱”的“定理”，能使时间寸秒变寸金，使空间“分厘变寸金”。只要有人出钱，就有卖美人头，卖美人腿，装神弄鬼，丑态百出。广告里的产品都是优质的，药品都是灵的，“星星”又笑又跳，又露相，以壮广告的威力。

“一手硬”应该用在治党上。因为腐朽种种，都是党员掌权为首引导出来的，或制作出来的。5000万党员要是清洁的，社会屏幕上不会不清洁；纵然有垃圾出现，也会随时清除的。

遏止‘文化沙漠’的扩展

1994年4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世界面临挑战，市场充满竞争，警惕“文化沙漠”蔓延》，告诉我们：1993年全国2500多家图书馆中有341家没有购进一本书，有千家全年购书不到百本；有40%的青年家里不藏图书，却有人花30万元买一条哈巴狗，花十几万元吃一桌酒席；有91个县没有文化馆，有3503个乡镇和三年没有演出队进村的地方，约占全国总村数的87.5%”。在这些地方，“上山一把刀，下山一担挑，天黑就睡觉，半夜听狗叫”就是农民生活的写照。“文化沙漠”触目惊心。

“文化沙漠”在蔓延，是铁的事实。我还可以补充些材料：80年代初，湖北省图书馆阅览室的座位总不够坐，许多人坐在台阶上阅读；我到国立北京图书馆、南京档案馆等处去查阅资料，必须预约时间，预订座位。那时在青年中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话不够全面，却表示了：为求得岗位，必须学本事。现在变了，图书馆的阅览室空了，书店不挤了，卡拉OK（带包厢）、舞场（带包厢）、娱乐场、星级饭店、三陪沙龙、高档百货商场、模特服装表演会、股市……热了。得说句公道话，后者也是文化，而且是蓬勃发展着的文化。

所以，循名责实，似不应说“文化沙漠”在蔓延，应该说健康高尚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沙漠化”，夹杂着大量淫靡腐朽引人向下的文化取得了大发展的机会。

我绝不是说，我前边列举的那些场所都是坏东西，而是说：在没有严格指导下，什么场所都会发霉或长蒺藜。资本主义国家的音乐厅、高雅舞厅，所谓绅士们的娱乐场所，并不晦暗如地狱，嘈杂如鬼叫的，他们不要求音响超出正常的分贝。只有希特勒未发迹时常去的下层酒吧，才是男女杂乱，号呼纷扰的。资本主义的文化有其进步的方面，这是我们应该吸收的，而腐朽的东西，必须排斥！什么是腐朽的？可以理智地去分辨。

文化，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综合体，选择的标准，归根到底取决于世界观，审美观，价值观。老年、中年、青年都要在这方面打下一个合乎社会主义需要的基础，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健康的社会主义风气和文化。

为什么舍得大把花钱干这干那，就是不肯买书？因为许多人根本不想看书，他们认为“读书是浪费青春”。“人不看书书看人”，指的是把书当附庸风雅的装饰；于今进了一步，变成了“人不看书，书不见人”。人到那里去了？到卡拉 OK、舞厅、饭店、股市……去了。

有人常说：“时代变了，生活节奏快了，需要刺激，才能振奋。”生活节奏有了快的一面：赶吃、赶喝、赶钱、赶拍马、赶投机、赶营私舞弊等。这已是屡见不鲜的。生活节奏也有慢的一面：办一件事，礼不送到不办，客不请到不办，图章盖不全不办，于己无利难办……这不也是屡见不鲜的么？

节奏慢不好，节奏快也不一定好，归根是节奏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板眼，就不好。忙的是“三白工程队”（白吃、白喝、白拿），闲的是坐班聊天喝茶。说正确点：叫腐败风；说文明点，叫精神空虚。其实，活人不会精神空虚，连神经病者也不空虚，只在于：是为人民而勤思苦想，还是为谋私和享乐着

想。

真沙漠，可以用绿化工程遏止；“文化沙漠”则必须从真心诚意做起。不树立雷锋、焦裕禄之心，雷锋，焦裕禄只能成为文章或讲演的装饰，“文化沙漠”的蔓延，是难以制止的。

试看一瓶路易十三法国酒，价值万元，一饮数瓶，怡然自若。对于这种人，能指望他去治好“文化沙漠”么？

奖，应是严肃工程

1994年4月30日《人民日报》载文《产品能如此评优么》，介绍了社会搞评优、学会搞评优、新闻单位搞评优、社会团体搞评优……“甚至随便几个人凑在一起也搞一个全国评优活动。眼下企业产品头上的‘桂冠’多得让人看不过来……”说是有的评优组织者出重金，几个评优人员便适应评优组织者的要求，评出“优质”换几万元的收入。总之，评优中的“猫腻”是不稀见的。

评优之泛滥与得奖是双生子。有乱评便有乱奖，于是挂上奖字的桂冠满天飞，随手可以抓一顶戴上。名片上，简历上，企业发展史上，都添了不少“金”花。实际是自欺欺人的卑劣伎俩，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固有的骗人手段。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社会主义的商品规定了个性，那就是：全心全意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用伪、劣、假商品欺骗人民牟取暴利，是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手段，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人，不应有这个恶症。

这个恶症，不仅损害了人民的眼前利益，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变质。小平同志说得很对：“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抓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成为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9 页）

我们能对这些坏的社会现象掉以轻心么？

不是“这个”，是“这多”

1994年5月5日《人民日报》刊出李德民先生著文《堵住这个‘无底洞’》，说是有些人用“张冠李戴”的办法，花公款办私事，买名酒名烟用“汽车修理费”名义报销，买电风扇、电饭锅用“预热器”名义报销，等等。为着这种需要，假发票、假税单便应运而生，有一年税务机关查出假发票案1076万起，假发票6.8亿张。这真是一个损公肥私的大“无底洞”。

“开发票”已成了损公肥私的“无底洞”。这个警钟敲得好。

还应该帮着敲一棒。

现在许多人已经不止在“发票”上玩魔术了。在黑市上已有大把大把的图章齐整、手续完备的“发票”、“税票”在卖。买到这些，可以任你自由填写，去报销，去顶税款。甲方与乙方合作，签订承包合同，以少报多，所得好处“比例分成”。已到付款日期，故意拖延不付，或一月或半年不等，其间款额应得利息，中饱私囊。期货交易中，接受了预付定金，写好合同，到时买主提货，杳无踪影。明天股票涨价，今天偷用公款购入股票，明天抛出，资金归位，得利归己。制造种种借口，内外勾结，把贷款送入私人腰包。一项业务在手，多方争办，不声不响，拖延时间，各路财神，自然竞趋送“宝”。内外勾结，倒买倒卖房地产，已经使一些人发了财。至于内外勾结，造假信用卡，骗取国家资金；带着国家资金进大赌场去求财等等，也是屡见不鲜的了。

商品市场经济是生产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给人类特大发展的文明。其中衍化出来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百业市场、信息市场、科技市场等等，对于现代化生产都有着促进作用，我们应该全部继承这些积极成果，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上面所举的那些“无底洞”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久有的痼疾，必须除掉它，才有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随着新形势，新问题的到来，法必须立，并要逐步完善起来。

同时，德也要立，即抓主旋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日本的教育，从小学就有“道德”教育一课。在旧社会，我们从小学起，就有“修身”一课。儒家传统的论点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法，是维系社会之必需。古今中外，未能德败而法不败的。雷锋、焦裕禄之德，是德与行的统一。佛家要成佛，讲的也是“信、愿、行”的统一。于今，不少人的讲话稿是秘书写的，由他去念，内容是好的，念完了也就完了。把焦裕禄、雷锋等社会主义英雄的品德，做为文章的装饰，是无济于事的。正因为有一批人（内中不少共产党员）有如此行径，所以中央的法令、政策常落不到实处。书曰：“君子果行以育德”，商鞅曰：“导之以德，齐之以法。”中华民族古老传统文化，有许多迄今还是有教益的。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升腾，确实可以化为巨量的物质。

办法是有的，关键在于下决心，即知即行，不彻不止。

人民要人民的艺术

1994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一位观众伟红的来信，说他看了描述居民住在阴、冷、暗、漏的住房里的苦痛的“旮旯胡同”剧，心有同感，希望早日得到好的住房。这是合理的要求。

从伟红同志的信里，可以看出人民确实如饥似渴地希望看到“能给人鼓舞、给人启迪的高质量高格调的文艺作品”。何以故？人民要求艺术写他们的情趣、思想、要求、呼声。人民要求日益富裕的物质与文化生活。这种生活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克己奉公，勤于奉献。爱情是有的，是同志之爱，是对党对人民之爱，是对人类解放事业之爱，对崇高人格尊严之爱，不是把“拥抱、接吻、床上滚”作为爱的至高无上的标准的。其实，古往今来，以黄金买笑之“爱”，男的则是“朝朝迎新妇，夜夜做新郎”的，女的则是“白天养巴儿，夜里玩疯狗”，女的卖身，男的也卖身。资本主义的垃圾文化中，把“同性恋”捧为瑰宝，我们的《霸王别姬》的创作者对此内容奉为“创新”。说实在的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仅在前汉，就有文帝宠幸邓通，武帝宠幸李延年，哀帝宠幸董贤。

同时，信中也显示了另一个问题：这些年来，增建了大量住房，人民平均住房面积，的确增加了不少，这是事实。但这不是均等的事实。有的人家人均住房达百平米，有的人家确如伟红一样住着破旧小平房，阴、冷、暗、漏、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破旧小平房消灭光，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现实，特别是倚权而无限兴建高档别墅的。

给打假加些内容

1994年4月13日德国《世界报》载文《别信这些广告》，说小梅看到某美容霜生产厂家的广告上说：用了这种美容霜“第二天就会有副新面孔，无任何副作用”，她使用了一次，脸上长出了脓疱；她说：“不要相信广告，它骗人。”这家报纸认为：这不但应追究厂家责任，还应追究广告代理商及新闻媒体的责任。

这两则消息是国外报纸上报道的。虽然他们也沿用了世俗的笔法，用“某”字掩饰了具体对象，但还是道出了实际存在而难以见诸报刊和电视的事实。

我不搞美容，一次剃完头被硬擦了××膏，结果脸皮肿了一个礼拜。我穿过在全国颇享盛名的××牌运动服，上衣两个兜都是漏的。我也穿过卖价200元的××牌的运动鞋，不到10天底子就开了口。我这里有几大家气功师的著作，××气功大师的书上说：一发功可以使百亩小麦增产30%。至于评奖之多、之杂、之滥，更是罄竹难书的。只要你有“公关本事”，不得此奖，可得彼奖；不得金奖，可得银奖；在这一伙人面前评不上，在另一伙哥儿们面前可以评上。总之，“评奖”的多种“奥妙”，尽人皆知而心照不宣。有的有骨气的艺术家拒绝领“奖”，不沾这“钱染的风采”。这是难得的。

古人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入乡随俗”的惯性，使人们见怪不怪，不知不觉地麻木了。然而麻木久了，四肢五脏失灵，也可能致人于

死。

看来，大力倡导“真实、易懂、健康、无害”的广告和“真实、公正、健康、促进”的评比，是十分必要的。

振兴读书风

199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载张魁星先生著文《救救书店》。他说：1993年全国有684家书店“失踪”了，吉林省的四个市农村图书网点的调查，有27%不再经营图书；现存的书店则多兼营玩具、工艺品、美食、服装、百货等。于是他疾呼“救救书店”。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是车厢，两个基本点是两个车轮。两个轮子都健全，车子才能安全行走，使社会主义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地发展下去，中央一再号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这个道理。精神文明建设是多方面的，而读书学文化则是一个重要方面。“人不学，不知义”是中国的古老格言。书店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桥梁之一，只应发展，不应拆除。要大兴读书之风。如今青少年中许多人被摇滚舞、靡靡音、三陪活动、武打等等所谓“刺激”给拉走了。图书馆冷落了，书店也冷落了。人们很容易责备青少年不争气，其实错了。有孟母三择邻，才培育了“亚圣”，“三白大队”（白吃、白喝、白拿）的子弟，怎么能不成为“八旗子弟”？我们要正己身以正子孙。减奢侈，多买书；少游荡，多读书。

要 堵 漏 洞

1994 年 7 月 31 日《新闻报》报道：1993 年用公款购买小汽耗资 1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7%，相当于我国建国以来汽车工业总投资的一倍，可以建设几个长春第一汽车厂。

罗田县平湖乡花了 20 多万元盖出 1 所 3000 多平米的中学校舍，1 平米不过用 500 元左右。这在乡下是可以办到的。买 1 辆华贵的轿车需要 50 万到 60 万，这就是说，1 辆轿车之资可盖两所中学；而 1 辆宾斯 600 轿车的车价，就可以盖五六所中学。去年一年买车花 145 亿元，如果这个数字属实，拿出一半来，就可以大大满足“希望工程”的需要了。

也许有人说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因为许多统计数字都只能是个概数。比如花大力气统计来的人口数，不可能一个不差；再比如把建国 45 年植树造林的报告数字加在一起，中国还会有没绿化到的地方么？尽管 145 亿是概数，我认为也应该重视。湖北谷城县的书记、县长接连换新车；某市委书记半年内换了 3 次新车；某村支书拥有两辆“宾斯”汽车，至于那些大小经理中不知有多少人坐上了高级汽车，这些车款是没有统计的，如果统计起来，怕是比 145 亿或许还要多些。

为什么生产指数增长得快，财政收入增长得慢？为什么财政报表上增长得快，却又大面积地发不出工资？为什么说要增加教育拨款，然而，像华中理工大学所得经费只抵得实际开支的四分之一？唯一的答案恐怕是：国家的钱口袋出了漏洞。

一副对联的滋味

1994年8月6日《长江日报》载华星先生文《“食弊”、“护弊”、“去弊”》，用清人魏源的话“弊之难去，其对在仰食于弊之人乎！”说作弊的就请人“食弊”，食人之“弊”，就要为人效劳，便产生了“护弊”，为走私者站岗放哨，为食于者当保护伞，为偷工减料者评“优良”，……等“弊”都来了。看来，“去弊”之道，在于除“食弊”之人，除“食弊”之人在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依法治国。

这篇文章写得好，说出了“弊”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的社会问题。

“严打”的声浪不能说不高，而大案要案上升的百分点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增高。原因正在于“有‘护弊人’”，以及“‘护弊人’手中千奇百怪的‘保护伞’。”

说“保护伞”是有法不能行，有法不能立的原因。所以，人们喜欢看《赤桑镇》这样的戏。今天，我们的子弟中有没有腰缠百万、千万或亿万的包勉？郭子仪的儿子打了公主，他赶忙把儿子捆起来送上金銮殿，那是因为他要抢前一步，争取不要落个满门抄斩。我们的子弟盗窃了社会主义资财，违法乱纪，又有谁绑子上“殿”？

前些时，《人民日报》上有篇文章谈批评某人某事不该用“某”字，其实，“有些”、“有的”、“那些”、“个别的”，这些词都与“某”是同义的，这样用词的确不好，至少沾了“护弊”的边，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于今，“天知、地知、你知、

我知 ” 心照不宣的事已不是一件两件吧？

中央要求反腐倡廉，“自律自查”；国务院要求“清理豪华汽车”……怎么样了？“天下事，了犹未了，更何妨不了了之；世处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这是罗浮山上清观的一副对联。

要“某”及其同族消亡，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吧。

向哪里放枪好些

1994年8月7日《人民日报》载文《“拜三拜”与“骂三代”》，说是人们为了求人办事，常常给当权者送厚礼，背后，又大骂受礼者，俗谓之“拜三拜，骂三代”。“拜”是给狼口喂肉，“骂”不过是“自我麻痹”，无损于“拜”。真正反腐倡廉的功夫不在于“骂”，而在于除“拜”。

为人处世，有所谓“外圆内方”之道。河南临颖南街村支书还在奉行此道，支书王洪彬说：“针对外界的情况，我们也搞请客送礼，既给人家回扣，也拿人家的回扣，这是迫不得已的行为。但是有一条，不管是谁拿到的回扣，一律要上缴。”南街村生产大量方便面和食品，不请客送礼，采购员不来，迫不得已，迫出个“外圆”办法。南街村也要向外边买许多东西，人家为竞争也给“回扣”，不收不行，便规定了“一律上缴”以维“内方”的办法，回扣每年达五十余万元。

提倡从不“拜”开始，作为反腐倡廉有效的一“枪”，这个想法是好的。

但是，这恐怕是对丢了“社会主义”内涵的商品经济行为的病根之深度还了解不够。谁都知道全国每年要耗去上千亿元的宴会费，送礼送回扣耗去多少？没人说，这些连同广告费一起摊入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去了。这些事并不都是无知的小民们干的，棉花掺假的事，有的县委竟行文做了“指示”，请客送礼给辛苦钱的人中，党员并不是少数。

我们应该立法，更应该决心立人。立人之道，在于整党。

“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睡大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18 页）

可怜天下父母心

1994年7月16日《长江日报》刊出一个妈妈的《一封泪水写成的家信》。信中诉说了儿子上小学时学习好、样样达标，上了初中，玩游戏机，沾染了不良嗜好，虽然父母尽力监护，还是走上了犯罪之路……

不到一个月的光景，猪肉一斤由7元涨到8元，又涨到了9元。随便买件衣服，动辄百元。孩子要吃好点的，穿好点的，玩好点的，父母只好“带菜在厂里吃，几年没买过新衣裳。”这不打紧，只要孩子学好成人，父母还是欣慰的。孩子住进看守所，父母当然痛心之极。

能责备这对父母对孩子没有认真家教么？我看不能，那么孩子是怎么走入看守所的？

孩子去打台球，不少台球桌是赌场，孩子去玩游戏机，其内容也多是宣扬色情、凶杀、武打，或者就是赌博；社会上有“老哥儿们”，也有“小哥儿们”。哥儿们讲“义气”、“豪爽”，抽烟、喝酒、赌狠一齐来。钱，不够用了。

生财之道：偷盗、诈骗、抢劫，制造推销“假发票”、“假税票”、淫秽音带和录像带、裸体画册，以及各种黄色读物，于是孩子们上钩了。钩是大人们下的。

孟母为了教育孟子学好，三次择邻而居。如今，向哪里迁呢？

水污染、空气污染、音响污染、整个环境污染了。更可怕的是精神污染，不消除这些污染，要健康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是不可能的，塑造新一代的健康人也是难的。

我们有能力解决好这个问题么？有！“从我做起！”从每个干部、党员做起，就能够政令通行。政令通行，则天下太平。

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平均利润再分配问题

1994年7月18日《内部参考》刊了一篇短文《社会保障制度要配套》，说“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否则社会容易动乱。”这是很值得注意研究的大事。

这篇短文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国家还未解决好。国家还不富，是物质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穷家过日子，一个窝头不够吃，每人分一小块，匀着吃。国家穷，应该有起码的社会保障制度；富的人家，富得流油，一些工人、农民、干部、老师等却过着贫苦的生活，有人甚至失掉了生活保障，这总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的。

企业弄得资不抵债，要破产，或者卖给了中外有钱人，然后择优录用，“劣者”被淘汰，丢了饭碗；有的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也失掉了生活保障。“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竞争的规律。难道说：这些工人、干部都属于“劣”字号？是他们把企业搞坏了的？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里的名言，过去却译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达尔文是针对自然界生物的发展过程说的。帝国主义侵略了殖民地，才把中国人、印度人、印地安人、以及大量第三世界的人民，说成“天生劣等民族”，应该给西洋优等民族当奴隶。帝国主义的哲学把这叫作“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我们对外贸易和政治交往上，对内处理人民问题上，能以此为原则么？

小平同志主张：“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

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个人先富裕起来，也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就是说：可以有先富后富之别，不是说有先富与挨饿之别，更不能解释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国营企业不少需要投资改造，有人说：“国家也担负不了。”这就意味着还有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属于“劣汰”之列。如果我们把这些企业陆续地都“汰”了，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还怎么存在？

四川花了 1500 万元于 1992 年建成了一座可日宰猪 5000 头的肉类联合加工厂，迄今一头猪未宰，已负债 2000 万元。不是它不生产，是因为大批屠宰点把猪分散杀了。这类工厂弄到资不抵债，都应由干部、职工负责么？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平均利润再分配的问题。资本主义前期拼命搞掠夺性剥削，以加速资本积累，职工过着非人的生活。经过工人长期斗争，资产阶级从平均利润中拨出一部分，才有了失业救济金，以及养老、退休、医疗等保险金（各国不同，像瑞典、新西兰等国是最高的）。资产阶级为了培育下一代的剥削对象，也就作了让步。社会主义平均利润的再分配问题，还要好好研究。“破产”之后的职工生活由厂方一家负责，无论如何是解决不了的。

“公平竞争”的口号容易说，实际上是办不到的。谁能使种粮食的收益比得过粮食加工工业的收益？谁能使种棉花的收益比纺纱、织布、印染、成衣的收益高？谁能使采矿的收益比炼铁、炼钢、轧钢的收益高？现代化的生产早已证明了：前部生产的利润总比后部生产低。工业利润高，工资福利就高，农

业利润低，工资福利就低。这种把社会化生产割裂的看法，连资本主义都相对地抛弃了。为了稳定农业生产，他们有优惠贷款，保护价格，农业补贴，二战后发展了“农工贸”一体的组合办法：即农民向工厂交原料，收原料价钱，工厂加工后所得利润返还农民一部分（有的高达百分之五十），垄断财团所属企业的工资福利，也不是有极大的差别，就是所属的亏损工厂的工资福利，也有必要的保障，他们对亏损企业，并不轻于“破产”，他们懂得这一部分亏点，正是为着另一部分多赚钱。福特汽车厂、雷诺汽车厂都亏过，而且不是亏一年；三井、三菱的冶炼工业都有过亏损时期，为着维护造船、飞机工业，他们也不轻易破产（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大萧条年代外，有许多工厂资本家是以“破产”为投机获利手段的）。

平均利润再分配问题是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中牵涉到国民经济全面组织协调管理并保障互相矛盾又相辅相成的大问题，需要仔细研究。既要接受资本主义创造的可为我用的经验，又要根据社会主义的特殊条件创造适合于社会主义的经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

1994年9月6日《人民日报》刊文《岂能容发票变“魔方”》列举了：（1）大头小尾——偷税的绝招，（2）随意虚开——腐败的诱饵，（3）公开报失——骗人的幌子，（4）伪造倒卖——肆虐的浊流。说这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这是有道理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其特点是：它为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保质保量地满足人民的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为目的。“发票变魔方”，“假发票、假公章泛滥成灾”等肥己害人的行径，都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害国害民的。

对于这些现象，要认真依法查处。不能把“解放思想”与“胡作非为”混为一谈，不能把“胆子要大点”与“步子要稳”、“实事求是”割开；不能把“损公肥私”与“为社会主义做奉献”当成一回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习见的“坑蒙拐骗”、“尔虞我诈”、“损人利己”，是每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必须坚决抗拒的。

这是骂人么

1994年8月27日《参考消息》报道：《俄国无冕之王出卖灵魂》，说新闻工作者和媒体公司拿了人家的钱，就给人家做广告，堂而皇之地为人家发表吹捧文章，花3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篇赞誉你或诋毁他人的文章，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此种歪风我们这里有不？

我看这不是骂人。当然，这不是对全体记者适用的话。我们有许多记者深入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的前线，扎实地宣扬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劳动英雄，为社会主义出力和献身的英雄，为他们高唱赞歌，弘扬了新时代人民的高风亮节，从而教育鼓舞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四化，走共同富裕大道的斗志；同时，他们还以大无畏的精神抓出各色出卖灵魂的人们的损害社会主义大业的伤业败德之事，敢于祛邪扶正。这些记者，是人民的喉舌，理应受到人民的尊敬，受到历史的尊敬。

制造“黑色幽默”的分子，并不止俄国有，我们也有，其特点是“一古脑儿地将自己卖给了……新出现的商人、银行家和政客。”也许还要加上一点：也出卖给妓女、骗子、恶棍、赌徒之流。这种甘心给别人“擦皮鞋”，给婊子“糊牌坊”的，当然是个别。可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败坏社会风气，却也是值得严肃对待的。如果无名无利的事就不去干，那么还有谁去代表人民去写既无名无利又担当风险的报道呢？

我们的记者是忠于社会主义的记者，不是“无冕之王”。这是一条很简单的道理，做起来也确有很大很大的难度，唯其

难度高，其史值才愈高。若有人要问：史值多少钱一斤？我的确答不上来。

这个“醒”提得好

1994年9月2日《人民日报》载文《不能放下批评的武器》，批评了“好人主义”之不可取，指出了“自保户”，“怕批评惹祸吃亏”，怕“用起来伤人”等之不可取，提倡有原则的批评。这是健全民主生活的必需，是重要的提示。

“一个党组织形成了积极开展批评之风，各种歪风邪气都会减少，团结的局面就会巩固，建功立业的基础就会牢固。”此话很对。

此文所揭示的不能开展批评的种种原因也是对的。不足之处，在于只捉住了事情的现象，还应该揭示出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党内腐败之风滋蔓的结果。腐败风在相当范围内“生根开花”，不少党员身心结满疮疤，不少党组织之内也结厚了疮疤，“你好我也好”；我若不仁，你必不义，一屏锦帐揭开，大家都要原形毕露，何苦呢？然而，这些人又不甘心被人说成是“放下批评武器者”，便堂而皇之地对大众号召：“我欢迎批评，请大家向我开炮。”都如此“堂而皇之”地来一番，“批评武器”也就可以入库了。

人民曾为“整风”、“反腐倡廉”高兴了几次，也败兴了几次，愿各级领导者，正视人民的呼声，扬起批评的武器！

萝卜当不得人参

1994年11月14日香港《大众报》刊出鄢烈山先生的文章《感谢查良镛先生》。他评论了武侠小说的历史价值，他说：“从历史知识的角度讲，武侠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足轻重”。“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讲，……总改变不了他的‘以武犯禁’的反社会本质……这绝对不是一种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文化’”。他慨叹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居然聘金庸先生为名誉教授，并说他的武侠小说“带来了一场文学革命”，认为此举欠“庄严”。我有同感。

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北京武林大师赵鑫洲曾教过我武术，但我不是嫡传高足，才去世不久的万籁声则是他的入室弟子。赵先生曾讲侠义武德，他也当过镖局的打手。年轻时，我看过的武侠小说不少，也曾认为侠义可风。受了党的教育之后，才懂得了：驱除社会的黑暗腐朽，只能靠阶级、政党和人民，所谓侠客者流，不过是为个人恩怨献身的鹰犬而已。义和团比一般“侠客”高一层，因为他们有一腔爱国心，误以为念了“天黄黄，地黄黄，轩辕老祖降天来”的咒语，便有真神附体，可以刀枪不入。这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政党领导，误入迷途。

至于如今电视、电影和报刊上所见的“武侠”，比之“小八义”、“大八义”、“双镖记”、“三侠剑”之类的作品，又倒着头高了一筹：他们不但善于头朝下走路，而且善于与神女邪游，连最低限的祛邪扶正之义也扫光了。

福尔摩斯探案集，不但有启人心智的游戏作用，而且它和《基督山恩仇记》、《孤星血泪》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一样，都起过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促人们冒险开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求市场，这对于一个新历史阶段的到来，起了催生的作用，当然也带来了负面作用——这就是现代武侠小说之继承又增加了更深重的腐朽传媒作用。

北京大学聘请金庸先生为名誉教授，乍看起来，不可理解；仔细一想，也不难理解。北京大学从来都是两种思想交战的阵地。现在，一批人在继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奋发前修，很自然也会有人以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之论，是正确的论断。

但是，把萝卜当人参可就是要误事。这点，是应该提一提的。

共唱国际歌

1989年8月4日《参考消息》报道：日本静冈市市民团体制作了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篇名《侵略篇之三——不曾允许说的战争——南京》。这是静冈市中学社会科教师森正孝先生执导的，他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的典型事件”，是“历史的黑暗面”所埋葬的事实，“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观看这部电影，并重新认识日本的侵略史”。

尊敬的森正孝先生及可敬的日本人民，从“九·一八”事变那天起，你们便高举着国际主义旗帜为反侵略与我们共同战斗了，许多日本人像小林多喜二（日共党员、作家）那样为正义牺牲了，像伊田助男（日共党员、日本关东军间岛辎重队司机，他用汽车送抗日游击队十万发子弹后，自杀）那样把鲜血与中国战士的血流在一起了。制造侵略的病源菌还远没有根除，让我们为争取人类永久和平，反对侵略继续并肩战斗吧！

无耻的“人”认为：“早亡了国早就现代化了，请看香港。”这种“人”是甘愿给侵略者舐屎擦靴子的动物，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只能是柏扬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指的“酱缸里的蛆”。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光荣的，屹立不屈的；中华大地上也确有蛆虫，有细菌。灭菌除蛆保健，是我们的任务。

人类终于在一天天进步，而且越来越快；世界各国的人民，正如静冈市的人民那样，看清了：反对侵略，争取和平，乃是各国人民联合斗争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一百年前就指出了这点。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International 歌要大唱特唱。

1994 年 12 月 30 日

铁杆硬汉子

这篇记窦店村支书仇振亮的文章（1994年7月3日《人民日报》载《党风正带来民风好》），具体地画出了具有社会主义品质的硬汉是怎样地走在市场经济路上的：“请的不是我个人，是书记，是权力，吃了人家的，拿了人家的，你还行得端，坐得正么？”他有这种硬骨头，硬气派，便带出了一群过硬的党员，在致富的路上不栽跟头。

晋州市周家庄老书记雷金河也坚持这个作风，俭正持家。“人家××书记一条腰带五万元，你看我这条，五分钱。”他系的是一条旧白布条子。

唐山市开平区半壁店年产值十多个亿，支书韩振国也坚持正风，“队员不住进好房子，我不去住。”村里一批好房子盖起了，他先人后己。

这三个地方都富起来了：人人住进了瓷砖镶面的楼房，过上了超小康的生活。

这三位书记有一句共同的格言：“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是别人先富我后富；我先富了，说话就不灵了。”

这三个村里没有赌博，没有盗贼，没有犯罪分子。

“打铁先要本身硬”，这句话可以抵过一百万句“综合治理”的空谈。

1994年12月30日

谁在制造贫穷

1995年2月17日《参考消息》报道：“世界上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的穷人……已增加到5亿人。有13亿人营养不足，缺乏洁净的饮用水，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措施和学校教育。”实际上，这是缩小了的数字。“问题最严重的大多数非洲国家，在过去几年中，都将它们可怜巴巴的一点资金主要都用于购买武器和还债。”这段话是实在的。不止非洲如此，大量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如此。拥有高技术和资本的发达国家，使用着改变了形式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奉行炮舰政策时对第三世界的疯狂掠夺的本质。它们用独占的高技术制造的产品，以一根针换一头牛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出售，它们以一文钱买一头猪的方式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并以毁灭性方式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发达国家都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市场，并尽可能多地巩固控制已经到手的市场，便大量地向它可以御用的势力兜售武器，促之为它打天下，连续不断地制造了地区之间的战争和层出不穷的国内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改变了形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却在无尽无休地在40几个地方进行，而且还要增加。这些战争既从饱受战火之苦的国民口里夺走了食品及一切赖以生存的物资，也从发达国家国民的口中夺走了营养和多年来已经争得的福利条件。

垄断资产阶级从腰包里掏出几个小钱，组建的慈善机关，除了点缀风光之外，根本不可能改变日益加剧的贫民生活的恶劣条件。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就是制造世界灾难的根源，这道理，并未过时。

人民，要和平，要幸福，要自由，要平等，要富裕。上帝不会给，只能靠自己去争取。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还要唱。

1995年2月18日

应该搞一个农田建设与 开发的科学与工程

中央一再指示，《人民日报》连续发社论，促大家重视农业建设，以保障 12 亿人的吃饭，给安定团结打下一个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这的确是十分重要的。

农业部刘部长说，农业、播种面积有 16 亿多亩。这个数字包含着一个可喜的方面：证明了农业靠科技投入和改善管理，很大地提高了单产，保障了 12 亿人的口粮和饮料用粮，但它也包含着一个可畏的方面，那就是播种面积指的是复种指数的面积，实际耕地面积比这个数少得多。刘部长没有说我国现在实存耕地面积。

社论里说：“全国已有相当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 1 亩。”又说：“按照目前这种速度递减下去，50 年以后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将降到 0.6 亩，100 年以后还能有多少耕地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虽未说出具体数字，也指出了：耕地迅速减少的严酷现实。

解放初，土地改革之后，全国耕地面积是 15 亿多亩，复种指数的面积常在 18 或 19 亿亩线上徘徊，那时单产低，人们靠大面积取得必要的粮棉油。这些年来，科技投入日增，单产普遍提高，我们靠 16 亿亩播种面积，取得必要的粮棉油。但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快速减少，终是一个极大威胁。

如何制止耕地面积的减少，并积极设法开拓新的耕地面积，已是刻不容缓的事。

工厂、矿山、道路、住宅等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些耕地，但这也不能决定耕地必须递减不止。第一，我们可以节约基建用地。第二，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开发新耕地。第三，只要农田基本建设投入增加，缺水或无水的地方，引水进去，便可以变为好耕地；水多的荒滩，适当排水也可以变成为耕地。第四，大力消除环境污染，还可以恢复许多耕地。第五，天山、祁连山有丰富的水源，山下有大面积的可以开发的土地，如果能够科学地引用这些水源（不可过多地引用，那会破坏生态环境，引多少量才适当，是需要做出科学考证的），可以造出许多林则徐曾创造的、吐鲁番的若干万亩耕地。第六，长江、黄河的水，如果做出大的科学调用，也可造出许多耕地。

总之，保护和开发耕地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工程。调集力量，做出科学规划，指导农田建设，已是刻不容缓了。

1995年3月17日

扼制为愚昧创造包装的力量

前不久,《人民日报》曾有文章详细地揭穿了神棍巫婆装神弄鬼的伎俩的秘密,大有清心祛邪之功。1995年2月24日载《愚昧的新包装》一文,从四个方面揭示了新包装的愚昧、繁衍和可恶,并指出:清除愚昧要“付出不懈的努力,既任重道远,又是当务之急。”

近20年来,曾流行过甩手热、注射鸡血热、红茶菌热、龟鳖测癌与治癌热、静坐热,进而发展成为气功潮、特异功能潮,医治百病的“精”、“液”、“剂”,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不胜枚举。烧香拜佛,修庙筑坟,占卦算命,阴阳风水,相面抽签,一切旧有的迷信都来了。这的确是教育不昌盛,科学不普及,国民文化素质不高的表现。不过,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应该探讨。

第一,阴历正月初一,汉阳归元寺,人山人海,香烟漫天,磕头满地,布施无数。其中有许多是有文化的干部和党员。

第二,报刊花上万字篇幅,有宣传不打针不吃药可治百病的,有宣传×老太太能治癌的,有宣传和尚尼姑火化出舍利子的(我两次见过金棺银椁包藏的高僧舍利子,其实都是红绿猫儿眼),有宣传特异功能奇景的,有宣传×液为医学上的高新技术的……我相信这些报刊的编辑都是有高等文化的。

扫除愚昧的新包装的同时,请有高等文化人主持的报刊不要去做为愚昧制造包装的事,请党员、干部不要参加愚昧制造包装的活动,也是当务之急。

要加强中国史的教学

1995年3月2日《人民日报》载文《不知孔子字仲尼……》，说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初三班全班学生中，只一人知孔子名丘，无一人知道孔子字仲尼，只有6人看过一场完整的京剧，无一人知道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

孩子不知孔子字仲尼，是可叹的，也是可怕的。中国人不懂中国历史，谈爱国，谈从实际出发，都是没有根据的。

曾经有一段时期，大学里没有历史课，迄今，文学院有历史系的也不多。郭沫若等老一辈对古文字和中国史有基础的人，陆续去世了。据说，现在对甲骨文，钟鼎文有些研究的人，全国也只有百把人。翻开有标点的《汉书》，把《项羽本纪》里的“学书不成，去，学剑”，给点成了“学书不成，去学剑”，把《高祖本纪》里的“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点成“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一部赫赫有名的《中华大辞典》对于字的注解，只有“音”与“义”，竟没有字形。至于那些所谓“浅析”、“浅谈”、“诠释”、“旁通”、“注解”之类的胡编乱造，报刊上的白字，更是常有的。汉字简化的前几批，还有所据，后来越出越奇，多所臆造。

这些现象严峻地提出一个问题：应该如何教中国人了解中国史？

日本在二战前与二战后，始终不放松讲日本史，正史讲天皇万世一系，讲大和魂，童话讲桃太郎等。日本的后代对于大和民族的尊严都有深刻铭记。

有些人不以不学无术，信口雌黄为耻。借宗教信仰自由，胡乱推广迷信。借修整旅游点为名，借妓女、情尼、或无稽之谈乱设景点。以编历史剧为名，有的任意歪曲历史（如武则天），有的把艺术传说当正史来写（如董小宛），有的根本不知道史实任意渲染（如写杨贵妃的人并不知道她是玄宗所爱武惠妃的女儿）。这许多滥言充斥市场，孩子们不学史，致力于追“星”，他们对许多“星”的名与史，知之甚多，对中国史则知之甚少。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不知道唐朝出了个杨贵妃，我的孙子初中毕业，不知道岳飞是什么人。这比不知孔子字仲尼，恐怕还严重得多。

不注重学史，是轻视德育的表现。以平均分数高低，以升学率高低为评判教学质量的标准，也是不以史为鉴的一种表现。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又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试看今之贪污盗窃、淫糜腐败者，不都是挟害国害人之才，缺为国为民之德者？

衍生证券害人多

1995年3月2日《人民日报》刊《金融投机猛于虎》，论述了买卖股票的期权，期货的期权、股票指数的期权等都是金融投机行为；认为新加坡巴林银行的破产，就是对这种“衍生证券”缺乏严格管理造成的。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为了防止产生像巴林银行破产这样严重的后果，投资公司和各国证券的管理、监督部门将会进一步完善‘游戏规则’，严格对衍生证券这种业务的管理，加强对金融市场运作的监督。这可能是巴林银行破产案留下的唯一有益的遗产。”

这个告诫是十分重要的，但在资本主义世界行不通。

其实，衍生证券的年岁不止20多岁，契约、合同、期票、当票、股票等凡是可以作为有价抵押证券出现于市场（不一定都出现于证券交易所）后，衍生证券便有了。吕不韦跟他父亲的一场讨论，说得最明白。

吕不韦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父曰：“十倍。”吕不韦曰：“珠玉之赢几倍？”父曰：“百倍。”吕不韦曰：“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父曰：“无数。”吕不韦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于是吕不韦把秦质子异人作为“期权”，花了大笔钱买通关节，使他继承了王位。异人之子政乃吕不韦所送孕姬所生，即秦始皇，吕不韦得官至极品，权钱皆丰。他做了一笔典型的“期权”投机买卖。

这类投机的事，中外历史上从来都有。花钱买官、返本求利的事，代代都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金钱可以买通一切，一切都可以成为衍生证券。有哪个高明的经济学家能够列出衍生证券的明细单？

文章说：“华尔街的这种交易……95%以上是在搞投机。”这话并不过分。这是资本主义的本性。

这种投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不可能完全避免。长城公司的诈骗是已经摆明了的，因钱权交易而犯罪的，也是摆明了的。总之，在市场经济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有机会得到国家政治、经济的机密，有机会控制国家经济的通路，随时有可能动用国家资金或“期权”，在一夜之间骗取大量的利润。

加强管理、监督，完善有关法规，都是必要的。但是作为国家公仆的人们，如果社会主义人生观不树立，自己思想上不守住关口，随时滑倒是很容易的。

有饭吃还要偷盗抢劫，有工作有生活保障还要贪污受贿，还要卖权营私。他们都不是法盲，而是明知故犯。立德是执法之母，“知耻近乎勇”，方有可能在金钱诱惑面前，勇敢地反腐倡廉。

1995 年 4 月 7 日

向王铁成致敬

1995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王铁成同志的谈话：“……钱不过用于流通的符号，有人把钱看作命，也有人把钱看作纸，既有境遇的不同，也有境界的不同。”“通过更深地了解周总理，又使我的灵魂得到净化，人格得到了升华。片酬中的稿费部分我没要，算是为民族为人民，也为历史尽一份光荣的义务。”

艺术是德与艺术的统一，没有屈原的志趣、品德和文才，不可能写出《离骚》；没有开拓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志趣、激情和文才，不可能有莎士比亚、狄更斯、易卜生、安徒生、肖邦、李斯特、贝多芬等辈的杰出创作。在艺术史上华而不实的作品，只披上斑斓的外衣，裹着腐朽的躯壳，招摇过市，自诩多才者，也是有的。但这些与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步步高升，是毫无关系的，它只是腐朽的沉渣的泛滥，是历史的绊脚石。

王铁成之可贵处，在于他多次扮演周总理，“越研究越觉得周总理的伟大”，“通过更深地了解周总理，又使我的灵魂得到净化，人格得到了升华”。不论任何品类的艺术，如果在创造时作者本人未受到感动，就不可能产生艺术的感染力。用许多人不爱听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作者没有认识典型的伟大并使自己的灵魂受到改造（即“净化”和“升华”），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英雄艺术形象。生气就拍桌子摔茶碗；男女情爱的激情来了便以“教你亲个够”，“拥抱、接吻、床上滚”；悲境

一来便放声哭嚎；豪情来时便哈哈大笑；朋友或哥儿们相聚便有宴会大嚼；苦闷填胸便狂饮不歇；首长关心总不外披衣盖被……公式的套语，干瘪的语言，造作的打闹，几乎可以不费力的编出一部“现代艺术创作大辞典”。这种现象是可悲的。但不能埋怨任何人，只能埋怨我们自己不在净化与升华灵魂方面下功夫。王铁成给我们树立了好榜样，跟着他的榜样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社会奉献终身。

我愿意向王铁成致意，祝愿出现众多的艺德兼备的艺术家。

应立法保护耕地

1995 年 3 月 2 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了中国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先生说的话：“今年我们将彻底调查中国的耕地情况，我们要惩处破坏耕地的人。”指出从 1900 年到 1994 年中国损失耕地约 1600 万公顷，这是耕地的“危机”。

科学技术投入，使中国农业取得了惊人的发展。12 亿人能够在人均占有的 1 亩耕地的条件下，取得了棉粮油及各种经济作物大增产，保证了生活的需要，这是史无前例的。但，耕地面积迅速地减少，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据统计，我们还有 8 千万人处于极端贫困之中。现在每年损失耕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1%，每年新增人口 1500 万，这个形势是很逼人的。而科技投入提高的产量，不可能填补耕地所损失的产量，一旦耕地减少到不能维持 12 亿人生存的危险地步，怎么办？

北京市已制定了《耕地保护法》，全国也应立法保护耕地。

保护耕地应与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统一起来，建设占地与修复耕地应统一起来。在治山、治水、治海中大量开发耕地，都是必要的，这应该以立法形式规范下来。

1995 年 4 月 21 日

歌舞厅应干些什么

《作家与争鸣》1995 年第二期中张魁星的《我看：萧条》一文，介绍了石家庄铁路俱乐部的歌舞厅坚持为广大职工群众服务的正确方向，使职工娱乐身心，陶冶情操、丰富了精神文明生活，那里的经验是：“越是扫黄打非，我们的经营越红火。”在那里不搞钱色交易了。

歌舞厅是传播健康文化生活，鼓舞健康向上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场所，不是“钱色交易所”或“腐化制造所”。石家庄铁路俱乐部的做法，是应该学习的。

1995 年 5 月 5 日

应当再思

1995年4月6日《人民日报》载王娜梅文《孩子的回答说明什么》介绍了小学四年级的师生问答：

老师问：“朱德同志为什么自己种菜？”

学生答：“为了绿化美化环境。”

老师问：“朱德同志为什么很少吃肉？”

学生答：“是为了减肥。”

大家看了这段文字，一定会笑，笑过之后，会有什么感想？

这孩子的答话，我认为并不可笑，不可气，更不该责备他们。因为他们的“短处”，是我们的“长处”给制造出来的。

从电视画面，到广告画面；从书刊，到娱乐场所；从豪华舞厅，到奢侈酒店，何处不讲神奇营养，神奇减肥，高档服装，增丽化妆品。卡拉OK处处有，奇侠美女多多来。不是没有给孩子们“比较熟悉的材料”，给了，而且很多；若以游戏机或高级糖果、饮料为题考试，我孙子肯定比我得分多。不是没有给孩子“内容生动”的东西，比如我看不懂的“变形金刚”之类，他们都比我熟悉。不是没有给孩子们“接触实际”的机会，是爱国主义的风气淡薄，爱国主义的影片实在难得看到，特别是在黄金时间。他们熟悉的“新知识”比老一辈多，可惜的是“孔融让梨”、“司马光击瓮”、“囊萤映雪”、“画粥而食”等早已从教科书里除掉了，“老三篇”的美德被不少改革开放者视为“过时的苦行僧行为”了。老师、家长管严了，不

行；放松了，不行；面对这群“小皇帝”，真是豆腐掉在灰堆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你说怎么办？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是有道理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如何把真珠收拢来，把鱼目扔出去，在窗子上安上窗纱，不让苍蝇蚊子飞进来，创造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有丰富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大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宁可享受活一朝，也不吃苦活百年”的思想，支配一些人不择手段攫取钱财，吃喝嫖赌，最后犯罪，甚至被枪毙，这已是习见不鲜的了。这种思想不驱除，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很难立起来的；一个良好的社会主义风气的大环境，也很难形成。

这样一个良好大环境的形成，是一整套的系统工程，中央正在大力地抓，相信会步步收效。正面教育与反面扫除要结合好，而且要把已经摆着的负面东西，逐件地认真清除。野草去，香花繁，这是并行不悖的。

指示、原则有了，关键在于“认真”，只要认真，没有办不好的。但，“认真”就要得罪部分人，才能救助多数人。

1995年5月12日

自有生长“庸品”的土壤

199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庸品，精品辨认论》，告诉我们庸品追求“流行色”，以感官刺激为媚俗之能事，以腐朽标“神奇”，导致观众审美素质的败坏。指出不少等而下之的影后，把调情当爱情，把肉麻当有趣，把色狼当“才子”。可悲的是居然有人立“后现代意趣”之名，为之吹捧。

这篇文是有深意的。

这篇文章引人深思：(1)“庸品”之伤风败德的影响已经到了何等程度？(2)制造“庸品”的作者有多大力量？(3)吹捧“庸品”的势力有多大？

1月27日晚，武汉广播电台说国内有科技工作者1千万人，有相面卜卦传播迷信者5百万人（神汉、巫婆、“神医”、“特种气功大师”等在外），接受迷信教育的人数当然更多。只此一项，可以看出制造“愚昧”的队伍是大得惊人的。

文中没有说影视“庸品”制作者有多少？出版物中的“庸品”制作者又有多少？为“庸品”吹喇叭抬轿子的有多少？从国外贩运“庸品”求利者有多少？这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明摆着的：弘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风俗、习惯的作品是很难得到出台机会的。我说的是“很难”，并不是没有。

屡禁不止的卖书号，就是满足那有书不能出版的作者需要的。有关皇帝、妓女、武侠，打情骂俏等的作品，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驱之不去，招之即来。

作者问：“这难道是改革进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么？”

我再加问一句：“这难道符合于江泽民同志一再指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精神么？如果不合于中央指示的主旋律，为什么又层出不穷？”

1995 年 5 月 19 日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

1995年1月29日，新华社北京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主办的双月刊《马克思主义研究》近日出版发行。

小平同志说：“我还要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这不仅是专对老干部，对老干部也同样适用，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习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事实，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因此，我希望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

文选》第三卷第 146 页)这段话是语重心长的。

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新的历史实际的继承与发展。历史不断发展，时异事异，必须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不是主观随性，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有的放矢，对现实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求出正确的解决问题的结论。沧桑时时变，事物运行的总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变。遵道而行，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不被主观主义、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所误。

学习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在此。

一种不好的习惯势力应祛除：报告由秘书代劳，以感想代严肃的分析，不注重抓取第一手材料，不在调查研究上下苦功夫；特别是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风气，多有即景修论的实用主义之风。这不能不是前进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衷心祝贺《马克思主义研究》双月刊的出版，我相信它将推动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排斥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兴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有的放矢，从感性到理性地追求事物内在规律之风，摆脱浮光掠影，言不及义的影响。

1995 年 5 月 24 日

爱护和平 警惕战争

1995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4月25日，首都人民集会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会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0岁学生朱一飞说：“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要和平！”

不但孩子们喊出这样的心声，全世界的成年人不也都是这样呼喊和祈祷的么？

可是，在阶级社会里，搞剥削的统治阶级（今天以垄断资产阶级为首）为了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或为扩展领土施行侵略总是要制造战争的。战争有两种：反抗压迫和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镇压人民，施行侵略的非正义战争。人民必须坚持正义战争，以遏制非正义战争，方能求得自由解放，永久和平。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应该记取的是：垄断资产阶级是当今制造战争的根源。在这个阶级存在时，他们总要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总要向国外侵略，夺取市场和资源，人民起来反抗，便形成战争。

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法西斯头目，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养起来的鹰犬。

战争的策源地并没有消灭；现在世界上40多个战场，仍然是挑起二次大战的那些垄断资产阶级制造的。永久的和平到来的日子还远得很。

空谈厌恶战争，无济于事；祈求和平，上帝也不会给予。

振奋起来，张大眼睛，警惕国内外敌人可能制造罪恶战争，随时给以打击，并消灭它，是必要的。

1995年6月2日

评业绩要严肃

1995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刊出《“凭实绩”不等于“凭数字”》一文，说得很对，在考核干部中应当十分注意，这方面的教训是屡见不鲜的。

“大跃进”年代，湖北出现过亩产小麦3215斤，广西出现过一天炼铁10万吨，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广西区委书记刘建勋都做了检讨。60年代我曾分管过农业，仅林业一项，就看见过多次假数字：海南屯昌县报告种了油茶1万亩，湖南道县林场报告以插条办法栽了杉树万亩，湖北官塘桥林场报告针阔混交林6千亩，其实完全没有那回事。山高地远，汽车到不了的地方，报的数字，不是添了水分，就是放的空炮。有一位大山区村会计说过实话：县里要他报告种植面积，他说已种好50%，县里在电话里不满意，说是别地方早已超过了70%，你们怎么搞的？会计很机灵，忙说“我再查一查”，一会便改口说：“是我看错了，把8看成5，是80%，不错。”计算人均收入，从来就有多种计算方法，有的地方为了表示收入增加，不但用“鸡生蛋，蛋生鸡”的复利算法，还常用了产品增值办法。

“凭实绩”的“实绩”，文中作了界定：“是为民造福的业绩”，要考虑把目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统一的群众利益，这是很对的。这种业绩只能在党性之德，忠民之德的统帅下方能创造出来。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情况下，如果离开党性之德，忠民之德，可以衍生出许多歪办法，创造出“可观”的业绩：

有人可以用“利益均沾”的办法，从国家银行用低利挖出大笔款转手以高利贷出，所得利益，除了私人捞一部分，也可以给机关团体增加些收入；以回扣推销伪劣产品，搞活企业；以行贿取得抢手商品的份额（据说中华牌纸烟，一大箱可获利万元），肥己又肥公。三角债增加的原因有二：一是银根收紧，二是故意拖延付款以自肥，连汇款单都不能及时付款，拖半个月或一个月就可以得一笔自肥的利息。许多人都知道××保健品含有激素，对人体有害。但厂方多出钱，便有人给他做广告，厂方多出回扣，医药部门便进他的货。

还有一种情况，“业绩”上不来，也不能一概地认为那里干部不好。吴堡县县委书记带领群众搞梯田，沿高内低，便于保水，还在山沟的小溪里建了小抽水站，他的确下了真抓实干的功夫。可是那里一年降水不过400毫米，遇到旱情，小溪干涸，他再努力也不可能使吴堡大增产。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年降水不过300毫米，谁在那里也无法增产，现在引进了黄河水，自然会增产。无水时的干部未必不好，有水增产时的干部，如果不与民同心同德，也未必好。

典型的力量是大的。在真不在多；在于自上而下地宣传并实践其典型的言行。

1995年6月4日

需要抓个“行”字

1995年5月2日《人民日报》载文《以人为镜》，论述甚好。

《以人为镜》一文要求大家像孔繁森同志那样“开拓进取，求真务实，找出差距，奋发前进”，要求大家“清灰除垢，拒腐防变，永葆共产党员的本色，永葆人民公仆的本色”。这都是在大力反腐倡廉的斗争中，应该大力提倡和推广的。

眼下应该大声呼唤的是个“行”字。孔繁森同志不但不用公费吃喝，反而吃雪啃冻馍，不但不买豪华汽车，反而用脚步踏上汽车不能到的地方，他不是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而是用鲜血灌在人民的身上。他的最大特点是：信、愿、行的统一。他信共产主义，信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愿意按党章要求自己、按公仆的规格要求自己；把这种信念与心愿一股脑儿地付诸行动，并坚持不懈，不待监督地自觉行动。这是古往今来圣哲所共有的立身之宝。

如果共产党员、干部抓着这个宝不放，中央的不许用公费宴请、旅行，反贪污腐化，反挥霍浪费等许多指示，一定可以落到实处。把每年1000多亿元宴会开支，500多亿元的买汽车费，把不可计量的建造高级住宅和办公楼的经费，把不可计量地用于送往迎来，××纪念、××大奖等摆花架子的支出，如能节省一半或三分之一，那么，希望工程、拖欠工资、拖欠医疗经费、科研、教育经费短缺等问题，不是都可以解决了？做到这一步，显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对国家事业，对

建设社会主义大业的“信、愿、行”坚定认识的问题。

张鸣岐、孔繁森等典型介绍的不少了，拥护的声音也不少了，可是大酒店、舞厅、卡拉OK的公款消费不见减，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以及机关团体的不必要开支不见减……这就不能不让人心忧了。

宣传好人好事本身不是目的，鼓励人们向好人那样去做才是目的。应该以孔繁森之尺，量一量我们跟他的距离。这样，新的精神文明才可能出现。

1995年6月16日

人，创造技术，指挥技术

1995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介绍了西北第七棉纺织厂的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经验，结论是八个大字：“潜力在人，成败在人。”认定：“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而且起决定性的因素”，“要最大限度地挖掘释放人的能量”是企业改革的头等工作。

华罗庚同志的“运筹学”是科学的，但对于“眼看油瓶子倒了也不管”的人是不起作用的。引进的新技术装备掌握在不关心社会主义利益，只顾个人利益的人手里，不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会大大缩短它的寿命。

如何调动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门大学问。把管理学看成为 $1 + 1 = 2$ 的低级数学公式，是无济于事的。历史上，我们曾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800万美式机械化部队；我们没有海军又没有强大空军支援，却在朝鲜战场上打败过美国的高度现代化的海陆空军。这个靠人的革命积极性制胜的经验，并未过时。

西北第七棉纺织厂的经验是极其重要，极其可贵的，应该学习，并好好品味。

1995年6月23日

“共妻”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商品交易

1995年5月26日《羊城晚报》载文《匪、妓横行文坛艺苑》，痛斥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任匪、妓横行，大有害于社会的正风。文短意长不可不思。

“匪”、“妓”不宜横行，但有人需要他们横行。有人骂共产党“共妻”，其实不对，真正“共妻”的场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不但红灯高高挂起来的地方“共妻”，就是大亨们花钱捧起来的“交际花”、“选美”、“明星”、“模特儿”、“招待员”也是跟不挂牌的“野鸡”一样，属于“共妻”之列。“共妻”是商品。有其不同等级的交换价值，可以买来自用，可以买作馈赠品。她们也和其他商品一样，要有人保护。当年上海滩上的杜月笙、黄金荣等辈不但为大亨们保护财产（商品），也带管物化了的“共妻”。不但四马路上的妓女要向他们纳税，所有的“星”、“花”、“美”之类也要向他们纳税。他们是不挂牌的政府，他们什么都管，他们是“匪”。“匪”也不是孤立的，他们也是物化了的商品，大亨们可以买他们当保镖或打手。自古以来，“妓”、“匪”都是联手的。今天，也不例外。

“匪”、“妓”是商品，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的存在。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锄掉这些负面的东西，如何锄掉支持这种交易的势力。既然有这种势力，就有“匪”、“妓”存在的条件，也就要衍生“匪”、“妓”畅行于文坛艺苑，有那么一大族愿意出钱，买到门口有人站岗，在室内抱着“特种商品”，欣赏那咪咪委婉的“关关雎鸠”艺术。那些艺术也

就有了可观的交换价值；大亨们吃肉，丐儿们喝点汤，也是很自然的了。

人民不赞成“匪”、“妓”，腐败风欢迎“匪”、“妓”，不赞成只管不赞成，“匪”、“妓”该存在还是存在。不信？那些高级旅馆里，不是总有人自愿陪睡？那些舞厅或娱乐城里不是都可以高价买到“包间”去演“妖精打架”？有些城市不是公开地演“拉郎配”？

风从何处来？要堵住风源。不然，扫黄、打假、除黑的文章，不过是“虎”头碑坊而已。污泥浊水翻滚的深渊里，是难以建成清洁的艺苑文坛的。

1995 年 7 月 7 日

这该咋办

1995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六连的启示》，深圳特区某部六连，十多年来，涌现出80多名技术能手，60多名优秀话务员、值班员……可喜可贺也哉！

可敬的六连，“没有参与走私、炒股、经商的；没有进发廊、舞厅及赌博场所的。”《六连的启示》接着说：“其他行业的基层单位，例如一个车间、一个村、一所学校等基层组织，若想使自己成为先进，同样地需要提高全体人员的素质。”这话很对。

似乎还应补充说几点：第一，高层机关也应如此做，正是因为不少高层机关没有这样做，才带坏了不少基层单位。第二，既然知道舞厅、发廊、赌场、股市、经商，有许多腐败行为，为何不着力整顿？第三，好车间、好村、好学校，坚守四项基本原则办事的，确实还有许多。由于到那些地方去不方便，重要的是去也无利可图，便常常湮没无闻；他们的兰慧之香不得散发，而皇帝、妓女、侠客、骗子、神奇广告却有机会抢占了报刊版面和电视的黄金时间。这该咋办？

唉！抽袋烟吧。

1995年7月14日

文小道理大

1995年7月9日《参考消息》刊出了海吉·久洛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认为东欧剧变在过去5年中，它给人们上的课比过去45年上的党课还要深刻得多。它痛斥了那些“要把我国转向资本主义”的精英们。

这篇小文章，用寥寥数语便解清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驳倒那批形左实右者宣布社会主义死刑的谬论。

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引动着许多人的忧思。人们当然欢迎革命的高潮，因为高潮带来社会的飞跃，会使许多人民得到解放和自由；低潮则显示着反动势力的猖狂。但从这篇小文章中应该认识：低潮是革命的深入，是高潮的前夜。

东欧及前苏联抛弃社会主义5年了，一批形左实右者所吹嘘的幸福肥皂泡，被现实的腐恶打得粉碎了，“它给人们上的课比过去45年上的党课还要深刻得多。”

人们在觉醒，新的历史教育着人，不能不觉醒。新的觉醒是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火药。反动势力肆无忌惮的横行霸道，总要尽快地点燃这日益增加的火药。

新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必然到来，而且手执更好的批判武器，以更高一级的共产主义运动形式，在地球上放出比太阳还亮的光芒。

不要忧伤，悲观；历史既然带来了新教材，就该好好学习，好好思考。有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路，会看清一切，走上

胜利之路的。

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它仍是一切愿意创造新历史的人们的批判武器，披荆斩棘的武器。

1995 年 8 月 4 日

“爱”，姓什么

黄克诚同志与唐棣华同志新婚之夜，黄克诚同志便约法三章：1. 夫妻必须服从党的利益；2. 我的工作岗位比你高，你不能因为男女平等，要求我迁就你；3. 我能看的文件，你不能随便看，也不能打听其内容。两人结婚数十年，此法始终信守如初。这该怎么解释，我说几句。

改革开放以来，我在明处得到的评语是：“太正统了”；背地的评语，当然比“左”、“保守”、“不知权变”等要厉害得多。

就拿“太正统了”的未可免的副义“太古板”来说，我要演说“爱”，总要惹人觉着不合适。所以，我演说“爱”，也就别有新意。

孔子说：“天何言乎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这都是指天地与圣人之“爱”，这是大道之“爱”，留给哲学家去研究。今天，书、刊、报纸、电视、广播、音像、艺术、广告领域里所见的“爱”，跟这个没有关系，谈这个，太不知趣，故弃之。

今世，穿宇宙，浴湖海，遍山川，几乎无时无处不洒“爱”，这个“爱”的含义是什么？“现代派”，“后现代派”，“印象派”的哲人可能说得“清”，又常常使人弄不懂；而大亨们不会作诗，有钱，钱本身来自商品，能买商品，能把本来不是商品的人也化为商品，并赋予多种美妙形式，达到他们的

“天天娶新妇，夜夜做新郎”的目的；香港选美，一次选了5位，出重金赞助的大亨，把她们用5个英文字母编了号，循序拥之入室。在国内一次出10万赞助选美的那位大亨，收获如何，不知道。

这样的例子不能概括全面，把“拥抱、接吻、床上滚”做为“爱”的至高至纯的表现形式，则是真的。你看，连林冲都与他的本来死了的妻子也抱在一起了（艺术家们的本领就是大）。

把窗纸戳开了看：爱河之流日见其涨，总不过是性爱的独占与渲染而已。

曾跟一位有钱的女性大亨谈论“人爱”与“兽欲”之差别在于人爱之基础在于共同理想情操与志趣。她马上补了一句：“性爱也少不得。”我说：“对，精神恋爱生不出孩子。”

不过，人终究是有思想的动物，在思想指导下行动，“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古今历史证明了的：人之爱是以精神为前提的。“斩经堂”是艺术家塑造的一例。

有人会问：“拥抱、接吻、床上滚，里头就没有精神？”有的，是人都有精神，与妓女睡觉的人，也有精神，也会说许多创造性的爱词。这里涉及到精神分类的问题。

上述那些宣传处所里有一句时行的共同语言：讲求“时代性”，“处21世纪的前夜，还要拉着人回到男女授受不亲或茹毛饮血的时代么？”是的，历史不能倒退。我们不但处在21世纪的前夜，而且处在大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中国时代。12亿人民的理想在于创造一个：消灭剥削、共同富裕，通向共产主义的社会。这种市场经济，继承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一切进步因素，同时，排斥其以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为指导的腐败源。这个腐败源把人及其人格商品化，也把人

类之爱不可避免地商品化。

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保住人类之“爱”的人性而不商品化，这是论爱者的时代任务。

新社会是从旧社会来的，对旧社会的精华有继承性；旧社会的糟粕也不可能在一次革命中洗刷干净。有人留恋赛金花、薛涛、李香君、李娃、董小宛等平康区的佳丽生涯，以及皇帝倚偎佳丽三千的生涯，是难免的。30年代，我的同学就有人躺在妓女床上去研究《诗经》，也有把研究赛金花（那时她还活着）改为专业课题。现在，演不完的皇帝与妓女，从中探讨爱学，也不新奇。

但要问一句：我们能引导新时代的人民树立这种爱的观点么？

黄克诚的“约法三章”，是结婚之第一天提出来的。要是把这个搬上电视画面，可能会使一些人目瞪口呆，“导演是怎么搞的，怎么还不拥抱？”他们会拥抱、接吻的，但这“约法三章”明确界定了：相爱不能违犯党的规定，恋爱目的是携手并进，为党的事业献身。

爱的自由，首先要接受党的约束——不“自由”；爱的崇高，不在于献身于私情，而在于共同向革命奉献。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谁也没有时间连篇累牍地写情书：真正革命爱的情书，也不是“画眉才子知多少，管领风流总不如”之类的，而是“两地书”型的。

新时代为社会主义大业的爱情不属于私有，是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不是恋爱至上，而是革命至上。只要革命需要，能聚首则聚首，要离开就得离开。

在革命队伍中也有爱情纠葛。处理这种纠葛不能用决斗或自杀的方式，还是要以有益于革命大业为原则。老同志孙乐一

被捕了，他的未婚妻等了他多年，确信他牺牲了，便与另外同志结成同心。正在他们举行婚礼之前，寻找她的孙乐一来了。朋友告诉了孙乐一，劝他不要去了。孙乐一很慷慨地说：“去，一定要去！不但去，还要给他们送一份好礼。我的爱人跟一个更好的同志结婚，我也应该高兴！”孙乐一已经去世了，这位女同志还在。这样的经历，我和另外的一些同志也有。生活的传奇比作家们笔下的传奇多得不可胜数。

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可不是无限大的事；应该重视，在于慎选对象，不要止于皮相的美，要表里一致的美。一个革命者怎么也看不出川岛芳子之类的美。志不同，道不合，总是结不出美满之花的。

也曾有富家小姐向我表示过“爱”，并许以金钱资助。她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她是要用金链子把我锁在她的房里当可供娱乐的“哈巴”。狗彘食人食，失掉了人的自由，干不得呀。

奉劝女士们注意：薛校书的生涯终是卑贱而痛苦的；奉劝男士们，与孔二小姐结姻缘，不当跟包是不行的。

恋爱也要有志，首先要志在保住人格、国格，进一步才是志在保住革命者之格。

古往今来，普天之下，“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镜头上的皇帝之爱，更是胡扯。“金屋藏娇”是汉武帝对陈阿娇的承诺，也是他抛弃了她；他年 70 又娶了钩弋夫人，不久，他要病死，死前下令杀了钩弋夫人，说是“子少母壮，危及社稷”。白居易的《长恨歌》，除了第一句说了真话，其余都是骗人的，比元稹的《连昌宫词》差远了。

1995 年 8 月 4 日

不要把自己变为商品

1995年7月1日《人民日报》载云德先生文《呼唤艺德》，说“艺术家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品格的高低，往往决定其作品艺术品位的高低”，他“呼唤艺术的良心和职业的道德。”

古往今来，真正的艺术没有不是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真正的艺术家没有不呕心沥血钻研事物，撞开现象的迷雾，抓住事物的本质（即真），从而塑造出善与美的形象的。艺术有商品价值，但首先不是商品。艺术工作者更不能把自己化为商品。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资本主义一代最辉煌的艺术创作，但那些在历史上永放光辉的艺术家：狄更斯、大仲马、小仲马、哥德、里斯特、贝多芬、肖邦、莎士比亚、达·芬奇、易卜生、安徒生等，都是用艺术力量为冲破封建时代迎接资本主义贡献了极大的力量，同时，对新社会诞生带来的阴暗面给予了揭露和鞭打。真正的艺术家首先是能够把握时代内在规律的哲学家，然后才是不以思辨方式表述事物本质，而以艺术语言和形象表述事物本质的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没有学术上的造诣和社会实践的磨练是不可能形成的。

如今，有些“群星”、“家”、“大师”和“评论家”，对中外文化的精华没有下过功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常视为垃圾。他们对于“荒诞派”、“现代派”、“印象派”、“意识流”有兴趣，这许多派的共同特点是：无限地发挥主观随意性，可以把艺术化为谁也看不清的云雾，也可以化为与低级庸俗趣味共鸣的简单形式：简单的公式（如，闷来喝酒，喜来狂

笑之类)，把爱情简单地等同于肉欲；以荒诞不经的奇形怪状表述人的个性，抄袭西洋艺术的皮毛。走这条路是简便的，不用操心费力；走这条路是有利可图的：“艺术家”可以收昂贵的稿费、出场费、广告费。“评论家”也可以分一杯羹。这已是人所共知的秘密。

艺德之需要呼唤，之所以有人丢掉人格和国格，并不是由于“人性恶”，而是由于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负面：把人商品化了。

商品的激流，黄金的浪潮，色情的泛滥，要求真正的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必须站稳脚跟，做中流砥柱。这是孔繁森告诉我们的。

随波逐流走下去，人或为鱼鳖；顶天立地站住脚，必须有迎接挫折，忍辱负重，甘尝清贫的志气。这是无私奉献的人的品格。

1995年8月11日

香功缘何曾经香起来

1994年12月23日《长江日报》载刘章西文《香功缘何不再香》指出“香功”之伪，人们识其伪而不信了。

省内外多家气功协会要我当“顾问”或“名誉会长”，都被我拒绝了，却得到了许多气功著作。我看过不少。

中国古籍中首先倡导长生之意的是老子、庄子，到了晋朝葛洪又增加了吐纳、符_邪、_旃治、炼丹、求仙之术，张华、郭朴更倡阴阳五行、卜筮之术，尔后愈演愈烈。实际上，求长生者，无人得长生；求仙者也无一人成仙，张华、郭朴不能卜己命，反遭杀戮。

市场经济大潮一来，掀起了人们的淘金热，“气功”也成了淘金耙子。发功可以使黑水变清水，在广州气功可以使北京灯灭，气功可以改变导弹飞行方向等无奇不有的说法都出现了。但我不信，因为我有亲身体验。

一位有特异功能的小姑娘，说是能用手心识字，叫我考验。我在暗处用纸写了一个易识的字，把字条放到她手心，急得她满头是汗，还是认不出。有一位有名的气功大师跟我坐在一个车厢里，说他的功法可以使大面积麦子增产百分之三十，我不敢说是与否；说来凑巧，刚好我翻到他的书上写着发功可以除掉黑痣，便指着脖子上的黑痣，请他发功，他拒绝了，说是“这个场所不行”。香功大师的书我也有，他的照片上罩有佛光，可见功力非凡，我也听过他的带功讲演，他的功对我和许多神经正常的人毫无作用。一位驰名全国的气功师（名字

不说了)在广州带功讲演,台下也有人手舞足蹈,瘫子的两腿立即能走,哑巴马上能说话,大师也宣称能治疗百病。苏烈同志不信,请他检查身体,大师带功检查,施展“投石问路”的伎俩,苏烈用“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战术,大师摸来摸去不得要领,最后摸着苏烈胸部的左侧说:“您的心脏需要注意。”苏烈不愿使他当场出丑,离开会场才道出真相:“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心脏长在右侧。”说实在话:这些大师们玩的伎俩,远不如民众乐园魔术师玩的“百步掌”(发功之后,在百步外把瓶子推倒),“眼皮提水桶”;西洋魔术师玩的“空中悬人”(一个人躺在床上,把床撤掉,人体平卧空中)。至于那些在台下“手舞足蹈”的人,不过是卖艺场上常见的“贴靴”者(给以适当酬劳,届时出来捧场)。

是不是气功一钱不值?也不是。气功,作为一种规则的深呼吸运动,使精神入静,促体内血液运行周遍,是一种有益于身体的运动。这是可以肯定的。发功之“功”也是有的。任何人双手伸出,指尖都有静电磁场,磁场之强弱,因人而异,所谓大师出手发功,使对方有所感觉,是静电磁场在起作用。至于说根据什么学说建起来的什么“楼”,其不同方位显示不同磁场,用以证明该学说之神奇,是大可不必信的。我相信黄鹤楼不同方位的磁场也不会相同。至于把周敦颐的“元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也……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之说,变个头衔曰:“元极”,故弄玄虚,也大可不必。

还有个“特异功能”问题,需要说明。科学发展到现在,真正认识人体构造,其各部位之功能,以及其间矛盾运动的复杂关系,还只是初启其门,离登堂入室还远得很。中医经络学所示的现象是客观存在,但中西医学还无人能给出科学的阐

述。朱涟把穴位说成是神经节，朝鲜把经络与核酸混同，已证明是错误的，用电波测试穴位的经络反应也还不能说明经络是怎么回事。钱学森把“气功”与“特异功能”名之曰“前科学”，用语甚当，却不能说明实际问题。“经络人”是实有的，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反应；能吃五毒的人确实有，久养毒蛇的人显示了特有的抗毒能力；人吃药多了有抗药性，植物也会产生抗药性，这是事实。为什么能产生抗药性？抗药性是怎样产生的？谁也答不出。

市场经济大潮涌出了拜金主义的浪山，淘金者抓到了大把黄金，奢侈之余，恨生命之苦短，生“长生”之邪念，向神仙行贿，烧香膜拜；向各种方术、堪舆、符咒、供神、气功、“灵丹妙药”，以至所谓“采炼”术等求救。

说“这是精神空虚，自我欺骗”，这是“丧失了正确人生价值观的表现”，这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腐败文化的黑流”，过分么？

做得很对

1995年7月25日《长江日报》刊张希先生文《随谈艺与德》，要求“演艺人员也须艺与德并重才是”。

中央歌舞团、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坚定措施，是护卫人民艺术尊严的措施，是培养人民艺术形象的措施，是提高人民艺术的措施。党和人民崇敬这种高贵的实践。

张口开价10万元，不满足个人的要求就罢演；胡乱唱几分钟就收费上万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样的“家”与“星”，把自己放在云霄之上，视人民如草芥，视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如鸿毛。这不但跟“二为”方针对不上号，连做人的基本条件，恐怕也不具备。

物爱其类，鱼相濡以沫，鹿相呼以食。人为万物之灵长，岂有伤其类自甘而不以为耻者？

金钱是交换手段，是无知之物。拜金主义者，极端个人主义者，被金钱打得头晕眼花，不知人路之所在，昏昏然与物类同列，所谓“红”，是正色么？所谓“家”，是人民之家么？所谓“星”，是灿烂之星么？白石乱玉，黄铜乱金，历史上常有，人不可不辨。

上述措施之可贵在此。

1995年5月1日

有正气才有正风

1995年7月28日《中国合作经济报》载舜文先生文《贴近生活与媚俗之风》，痛斥文学中涌动的“媚俗的浊流”，已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地步。

有人坚决反对“文以载道”之说，坚决反对“人民艺术”；认为艺术就是艺术，是灵感的驰骋，是“信天游”。于是“朦胧派”、“印象派”、“后现代派”等难以名状的理论，纷至沓来。其实这些派的理论不外两大类：“真正的生的本能就是性本能”、“爱的核心是性爱”，性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力量”（西洋哲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就成了以色情说“爱”，为“爱”而打斗，没有女人不成艺术，把男女英雄化为动物之类的作品的根据。这一类作品与第二类把艺术作为商品有联带关系。“生活”二字是抽象的，具体的生活有两种：一种是有益于人类进步的生活，脱离了动物界的生活，这是有人的思想道德的生活，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低条件；一种是以追求私利为准则的生活，愿意为低级趣味的需要装疯卖傻，给人家当猴子，给大亨吹喇叭，换取金钱，满足私欲的需要。把艺术作为商品的作者的前提是把自己先作为商品卖出去。

媚俗之风是甘当捧场的奴隶之风。时下之“定向文学”最是典型。

“××××液”，“×××电子产品”，“×××厂的经验”，以及“××星走红之路”等，无奇不有。这些作者也深入了生活，黄金浪里的生活；他们为文也有道：笔逐金钱说风毛。这

是从蔡邕那里学来的本事：汉代无稿费，有“笔润”：有人奉上丰富“笔润”，请蔡邕为其考妣麟儿写诔词碑文，蔡邕能为七岁死去的贵家子写出充满丰功伟业的诔词。

孔夫子说：“己欲立而立人”，但“立人”者必先自立。已被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锁死的人，还谈什么立人呢？

贴近正气生活并受到洗涤才能祛除媚俗之风。

1995年9月8日

勿以小善而不为

1995年8月17日《中国检查报》报道四川某市长因受贿被捕，该市长说“如果我不当市长就不会犯罪”。因为当了市长，“很多人巴结我，其实不是巴结我本人，而是巴结市长这把椅子。”椅子是权，巴结权就要行贿，有了权就可得贿。此话不错。

党中央之大兴反腐倡廉，粉碎“四人帮”后，实始于1983年的严打措施，迄今已有12个年头。党连续不断地发指示，抓教育，定法规，树模范，立正风，祛邪崇，不断严惩有害社会主义触犯刑律的罪犯；对犯错误的，不断地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精神给以教育和纪律制裁，社会风气在逐步向好处发展。这是可喜的，是保证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必需。

但，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中，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灭绝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是在正与邪两种思想尖锐斗争中形成的，每个人日日时时都在经受这种斗争的考验。真正高尚的人如孔繁森、雷锋这样的人，不但如山的黄金攻不倒，而且锱铢之利也攻不动。这是真正的顶天立地、坚不可摧的时代英雄。

中国的传统的人生哲学中有一条美德，曰“慎独”。孔繁森同志他们做到了：有人监督与无人监督，都能全心全意为人民，一丝不苟地约束自己。这是最过硬的品德。

刘备教训刘禅：“勿以小善而不为，勿以小恶为之。”对于我们还是有教益的。

1995年9月19日

请念旧诗一首

1995年6月9日《老年文汇报》刊出《踏遍青楼去何楼》一文，斥影屏中妓女频频出场，展示妓女与嫖客的风流韵味，认为实在要不得。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州。

假若把杨贵妃、武则天、乾隆、豪客、路客花的钱，用到塑造古往今来的中华民族英雄上去，那么，对于老中青人民都是极好的雨露。这样的事，想起来容易，办起来特难。

都说是贯彻中央指示的“主旋律”，奉行“二为”方针。事实如何？有一批艺术家确实这样做了。看，那批沿着长征路走，为长征路上的人民送上高尚艺术的艺术们，不是受到成千上万的人们欢迎么？山西艺术家创作的《孔繁森》，辽宁艺术家创作的《张鸣岐》，不也是受到大众的欢迎么？“七一晚会”上的光辉感人的表演，不是引得人们看了还想再看么？可惜的是未能连续地广为传播。于是人们只好在黄金时间里跟乾隆、雍正、豪客、妓女们打交道。

不知有多少人为此呼唤，就是转不过来。于是加剧了我家的内部矛盾：子辈孙辈坚持要看鬼哭狼嚎，“叫你亲个够”，凶险打斗。老一辈喜个轻松肃穆。这个矛盾无法解决。

“忧道不忧贫”，我虽非君子，也还时时被触动的。

1995年9月22日

请看令人痛苦（哭）的故事

1995年8月18日《中国合作经济报》载柳碧云先生文《倾斜的书市》，说了三个故事：第一个，A君写了320万字的作品，贷款1万元，印出5000本，自己负责包销2000本，幸蒙×经理帮助推销500本，×经理要求：请“找几张吃饭的发票来，好做招待费。”第二个，×县王老师自筹款印了书；有个张老板交情，包销了。有人告诉王老师：“你的书走进废品收购站。”第三个，朱副教授贷款1.5万元出了一本专著，弄了个资不抵债，债主哄门，老伴写了离婚书。

这里列出三个故事，头两个用了“某”字代言，有所讳也；第三个于“某”所之后具体地写出朱副教授为出书负债与妻闹出离婚的坎坷故事。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请大家品味吧。

1995年10月6日

要总结经验

1995年8月21日《人民日报》载李庄先生文《从一位老将军的困惑想到的》，说是北京一位老将军困惑，说道：“北京市出了王宝森这样败类，我想不通，组织上是怎样考查他的？”其实，不是只一个这样败类，贵州的第一夫人不是被枪毙了？没有良心，没有党性怎能反腐倡廉自律？

“北京市出了王宝森这样的败类，我想不明白。……”这是老将军说的。李庄同志作出了正确的分析，他希望唤起干部的“起码的党性，良心，为人道德”，他要我们警惕“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从前多用公家一把椅子，一件衣服；到大城市开会完了多留几天玩玩，组织上都批评，要当事人做出检讨。于今如果按这个标准自查，自纠，简直等于吹毛求疵。重要的还是把王宝森之类的案件来个彻底清理：找出他贪污数字，送人情数字，随意挥霍数字，假公济私数字，切实地给以政纪、党纪、法纪的处理；切实把庇护他的人，与他同流合污携手合作的人，逐个地清出来，给以适当处理；把那些以色换钱，以“送礼”行贿骗钱买权的人，清理出来，给以适当处理。更重要的是严肃总结经验：一个北京市委为什么能够养出这样的“痛”？“痛”之源何在？“痛”已扩散到什么程度？找出一个防腐养廉，杜绝和平演变危险的路子。

“履霜，坚冰至”，是教人居安思危；“除莠务绝”，是教人不要养痍遗患。二者结合起来，或是遏止当前腐败风严重滋蔓

所必要的。组织要严加监督，个人要服从组织，坚决贯彻党的三大作风。

1995 年 10 月 13 日

不要拉着历史倒退

1995年,《山西广播电视报》报道:毛泽东从未全面肯定曾国藩,指出1917年8月28日毛泽东致黎锦熙先生的信上是这样说的:“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这本来是对曾国藩的批判,却有人断章取义,只引“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为曾国藩树碑立传。

不但有人给曾国藩加以“伟人效应”的桂冠,还有人写了大块文章为他“正名”。这和为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辈“正名”,大概是一脉相通的。

曾国藩等辈的确是有名的,但其名并不正。正与歪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是历史给出的定论(不是盖棺给出的定论)。

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辈在五四运动的前期,都曾持旧民主主义观点,做过些有益于历史进步的事情,但当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兴起,排斥中国走资本主义之路时,胡适最先提出“把共产党消灭于萌芽状态”,周、林等人便跟着站在了反人民的立场上,以各种方式阻拦中国人民革命前进,终生未变。他们自愿地变成历史的绊脚石。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三元里的人民,最先举起“平英团”的旗帜,英勇地与英帝国主义展开了斗争,失败了;1851年,,洪秀全等在金田起义,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对洪秀全的起义队伍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于1864年把这支队伍打垮了,使中国继续蒙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曾国藩的一

生干了这一桩镇压人民，使中国继续受侵略，使人民继续受苦难的事业。他是阻挡历史前进的叛逆。这是他应得的“正名”，人民只能称他为“曾剃头”。

为什么会出现为这类人的正名热？说轻一点是对历史的无知，说实在点是要混淆人民与敌人的界限，拉着历史倒退。

1995 年 11 月 3 日

好个“因素往往在‘戏’外”

1995年9月9日《信息日报》载梁晓声先生文《刘晓庆的表演刚刚及格。》

梁晓声说：“刘晓庆虽说是名气很大的演员，但并非演技很高的女演员。名气高于演技……因素往往在‘戏’外。”这“戏”外，的确大有文章。

这话不但对刘晓庆适用，恐怕是若干名气很高，演技不高的演员，都有“戏”外因素。比如到灾区以“义演”名义捞钱的××明星，不就是“戏”外有戏么？

“戏”外因素之兴，不是偶然的。这是商品经济的负面产物。商品经济的负面触发着“人为财死”的思想，为利忘义的事便出现了不少。从事艺术的人们之中的部分人，首先把自身和灵魂变成了商品，为了推销便不能不做广告，做广告要出广告费，这笔费用以何种方式兑现？这就要看“戏”外因素的组合方式了。局外人只能揣测，难得具体指出。

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被吹捧的商品所获利润，必须与吹捧者分成（以回扣比例分成，红包种种多变方式处理之）。

合作双方，以获利为目的，“艺术”二字并不列在帐单之内。“艺术”的悲剧源于此。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吧

这里摘的是 1995 年 12 月 6 日《人民日报》第九版所刊卢继传同志写的《陈云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一文的第三段。

陈云同志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 99% 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政策。”

陈云同志看到党和国家的领导重担将落在新一代领导者的身上，并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保证这个用千千万万先烈流血牺牲争得的社会主义大国永葆青春。不是一般地强调要实事求是，而是要牢牢地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这就要好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事论事，凭直观感觉决策，会犯错误，会自相矛盾，会被现象牵着走，陷于事务主义，凭书上条文，或凭文字修饰决策、会陷于教条主义，只会宣读上级指示，不会结合自己处境的实际，研究贯彻上级指示，会陷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都是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真正的实事求是，是对主观世界的不断改造以适应客观世界的不断变化，使自己的实践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对革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

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 15 字的要求。这不但要下苦功夫了解情况，还要下苦功夫去思考、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为武器去思考，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抓到事物运动的本质。

这里需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改造了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卢继传同志的文章要我们永远记住陈云同志的忠告：“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要犯错误。”

如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空气太淡薄。一种人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一种人以追逐金钱、权位、享受为可信的哲学。面对着许多有害社会主义的思想，缺乏有力的批评。这应该引起忠于社会主义大业的人的十分注意，寻求解决办法。不是么？

1995 年 12 月 22 日

我为“上山下乡”叫声好

新华社大连 1995 年 12 月 17 日电,《大连万名中学生上山下乡》。我不禁地叫一声:“好!”

有位大学生曾在上山下乡中度过了几年生活,如今他阔了,当了“中款”。他对我说:“我也曾过了几年劳改生活,现在总算脱开了劫难。”

看来,在山上,地上,水上长年累月“修理地球”的人们,都是命里注定该下地狱的了。

所以,不少的颇有知识的理论家挥动如椽之笔,对五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一事,大张挞伐,很是心安理得。

人们天天吃地狱中“罪人”在地狱中抠出的粮食,却不嫌脏,吃得很习惯。

你说这怪不怪?

党一再提倡艰苦奋斗,要大家学习孔繁森精神。习惯于“大款”生活的人,对于“艰苦”二字自有其特殊的定义:“这鱼翅是不入等的,能吃么?”他们对各大酒店的名菜、名酒、名厨,能够背得烂熟,凡是不合乎这些规格的,他们便叫一声“苦”。他们所处的境界是另一重天,远远地离开了“人间地狱”。

大连万名中学生到乡下一个礼拜,便有了新的体会,这是非常可贵的。

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截然割断,认为知识分子是独占知识的人,认为工人农民都是愚昧的低级动物的人,要学到全心

全意为人民，决心对人民做出无私奉献，并愿与人民一道艰苦创业，是不可能的。

君不见，中央指示不许坐 3.0 的豪华汽车，这批汽车换下来了（有的是暂时封存），又买了一批 2.9 的外国汽车来坐。只此一举，不不够那个的了么？

1996 年 1 月 5 日

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变

何德功先生在《参考消息》上发表了《牢记历史教训，昭示和平信念》一文，论述了德国和日本两国当权派对于在二战中所犯罪恶所持的两种不同态度，要人民警惕帝国主义本性不变，大力护卫和平。

何德功这篇文章写出了两个法西斯侵略国的现领导人，对于在二战中所犯侵略罪行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是篇“醒世文”和“警世文”。

德国的现任总理科尔在以色列访问时下跪谢罪，德国的前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也下跪谢罪，德国的领导人把战败称为“解放日”，这显示了德国民族文化素质是高尚的，人类共有的良知未泯。

靖国神社里摆满了明治维新以来历次侵略中国（日俄战争实质也是侵略中国）和朝鲜而丧命者的牌位，二战后被处绞刑的东条英机等 7 名甲级战犯和一批沾满了血腥的侵略者的牌位。参拜靖国神社是对侵略者阴魂及侵略业绩的崇敬和肯定，是继承并发扬其侵略精神的意志。持有这种意志的人理所当然地否认日本帝国主义有过侵略，当然把黑说成白，，像田中正明等辈写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等类颠倒是非的著作。日本政坛中的军国主义徘徊不去，是必然的，但这并不代表日本人民的文化素质，只能标出一小撮军国主义野心家的重蹈侵略覆辙的野心狂。

我之所以称他们为要重蹈侵略覆辙的野心狂，是因为他们

连他们前辈已得出的痛苦教训都忘了。

曾于 1941 年 7 月前任侵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被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打了个晕头转向，被撤了职。他曾给日本参谋本部写过“华北治安”情况的报告，虽然极尽歪曲事实之能事，为自己开脱责任，但处于“无可奈何天”中，被迫说了一段实话：“对异民族的统治，特别是对民族文化高度发展之民族，归根到底是有一定限度的。如该民族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政权，任何以强大武力为背景的政权入手，都无法得到它所希望的结果。”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时，我们千万要记住：

（一）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变，因以垄断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帝国主义，总要为争夺市场而采取多种方式进行侵略，以扩大殖民地。

（二）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与若干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但两者参战的最终目的不同：人民要求战后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一部分人民实现了这个目的，大部分人民并未达到这个目的；以垄断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巩固资本主义体系，他们毫不掩饰地这样做了。

人民民主，人民主宰的和平，还要人民去争得。

（三）人民已经争得独立、民主的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仍然是帝国主义时时准备推翻的对象。不止要居安思危，发奋图强，而且要时刻准备着抵制和平演变和武装侵略。

1996 年 1 月 12 日

这条新闻很新鲜

新华社沈阳 1995 年 12 月 20 日电，《沈阳 8 名党员和干部接受异性全身按摩，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根据报道全文看，这 8 名党员和干部之所以受处分，是因“接受异性全身按摩”。

问题跟着就来了。

要是接受异性的“半身”按摩或“局部”按摩，受处分不？

《玉堂春》剧里说：王金龙第一次进宜春院吃了一杯香茶，花了三百两纹银就走了。既没搞“妖精打架”，也没有“拥抱接吻”。这种行径，在旧社会里名之曰“开盘子”或“打茶围”。今之“三陪”运作中的“坐怀”，“包厢”中的“鬼混”，以及其他形式的“×陪”，该不该处分？

又有一说，不许用“公款”宴请或进舞厅。那么，用“私款”宴请或进舞厅，搞桑拿，应是合理合法的了。

1996 年元月 19 日

论“考察”之前的考察

1995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对“考察”之再考察》，指出：三心二意的小猫钓鱼式的考察，猴子掰包谷式的考察，邯郸学步式的考察，“要不得，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无所收获。”

“考察”是工作之必须。考，是思考的意思，“学而不思则罔”，“心之官则思”；察，是辨析事物的意思，“考察”二字实际是据实析理的功夫。

然而，未去“考察”之前，必先作一次“考察”，明确到何处考察才得受益，去了要考察什么，从何处入手，到何处收束。连这些都不明确的“考察”，不是借考察之名遂其游逛之实，就是懵懵懂懂转一圈了事。

有一个例子，请大家思考：有一个代表团到香港考察了“廉政经验”。

我不相信这代表团的成员神经不健全。

1996年2月2日

人民艺术家，珍重

1996年1月17日《人民日报》载王朝闻同志文章《多则惑》，指出“为了新艺术的繁荣，多务实比巧立名堂重要。”

朝闻同志正评“多则惑”，是很有道理的，值得深加品味。于“妇女文学”、“广告文学”、“企业文学”等名目之外，确实还有许多别的“文学”，比如“纯文学”、“高雅文学”、“严肃文学”等。“儿童文学”的概念比较容易界定，其他许多名目，确实容易“引起……乱伦的误会。”

但，这些愈演愈多的名目的来源，我看既不是“误会”，也不是由于思想“惑”。

商品经济大潮涌来时，不但广告的内容和形式，斗艳争奇；凡是广告介绍的药，大体上都是医治百病的；随着娼妓的增加，许多药品都增加上了补肾、固精，壮阳的内容。凡是广告介绍的食品和饮料，几乎没有不包含最高营养和多种微量元素；凡是广告介绍的化妆品，几乎都具有返老还童的能力。总之，巧言令色，以假充真，不怕宰人。

文学的巧立名目，虽不是广告，却也在尽力使它起广告作用。文章是否能引得读者注意，首先是标题。资本主义的新闻学里有句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不论古今中外的文学史里，也查不到“纯文学”、“严肃文学”、“高雅文学”这样的门类。既然是文学，就是作者用心写出来的、而且作者本人肯定认为是“严肃的”、“纯正的”、“高雅的”。历史又为什么漂出那多“不纯正”、“不高雅”、“不严肃”的东

西。那不怨作者的主观愿望，而在于实践的检验。

在实践检验下的“纯正”、“高雅”、“严肃”，是具体的历史存在，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

邓通者流，过去有，今天也有。

没有害神经病的人，没有心里不清楚的；其所以忙着做出动物界的行径，创造动物界需要的作品，并给它加上美丽的标签，到底还是一个“钱”字把他们弄得神魂颠倒了。

装腔作势，改变不了滑稽戏的本质。

人民艺术家，珍重，珍重！

1996年2月9日

“艺术”不要毒害儿童

1996年1月10日《人民日报》第十版刊出两篇文章：一篇是《影视该给孩子什么样世界》，一曰不要让犯罪成为孩子模仿对象；二曰世界并非充满暴力；三曰太多性信息引起（人们）烦恼。另一篇是《听家长说屏幕》。这里，只摘后一篇。

两篇文章都要求影视不要无尽无休地向孩子们提供抢劫、谋杀、武打、淫秽的东西。

我们要的是什么“风俗”、“文明”、“人心世道”？是社会主义的“风俗”、“文明”、“人心世道”，其内涵是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其典型则是张思德、雷锋、孔繁森。这种精神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淫糜腐朽的享乐主义。这是应给予成年人与少年儿童的熏陶，这是培育21世纪社会主义的栋梁人才的必需。

贪污腐败必须反，黄色文化必须打，这是大家都承认的。21世纪属于谁，要求我们给出严肃负责的答案。艺术，绝不是脱离政治，追求享乐的；离开政治纯享乐的艺术，从来没有过。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例外。

1996年2月16日

看！林黛玉大打出手

1995年12月19日《长江日报》载陈鲁民先生文《林黛玉的“武功”》。说“新编梁祝”里，梁祝成了武林高手，“新编西厢记”里，张生成了八卦神功的掌门人，蜚蜚和红娘成了护法高手。看来“林黛玉不会武功不行了。”

《红楼再梦》好像是说贾宝玉的儿子贾小玉练了一身绝技：能够手弹群弹，击穿群鸽的眼睛。《红楼梦》之后，写有《红楼再梦》、《红楼续梦》、《红楼圆梦》、《红楼梦补》、《红楼梦影》、《外红楼梦》、《增补红楼梦》、《后红楼梦》、《绮楼重梦》、《红楼复梦》、《红楼幻梦》、《红楼补梦》、《再续红楼梦》、《三续红楼梦》、《红楼梦钥匙》等，还没有一本写林黛玉习武显威的著作。本着时尚的发展，潮头的流向，陈鲁民式的创作看来是需要的。

直到现在，动物界遵循“弱肉强食”的原则，每种动物都有“武功”，人，加强练武，看来是当务之急。

武打片的重要性，概源于此。

林黛玉出场，大显身手，不但会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很可能把武打艺术推上一个“新台阶”。

只是这种“艺术”继续上新台阶，人的精神面貌会丑到什么地步？

谁能对“热”病辨症施治

1995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载汪大海先生文《警惕“点歌热”中出现的问题》，指出“公款点歌”“点歌时泄露国家机密”“点歌变调”“内容不纯”等弊，应加规范管理。的确应加考虑。

点歌之所以热，恐怕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最重要的是有人愿意点，像《纤夫的爱》这类歌，最带刺激性的一句是“让你亲个够”。刺激可以从吸毒、嫖娼、酗酒、异性按摩、“三陪”等方式中去求得，也可以从点歌中求得。在旧社会点歌、点戏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摆阔气，一种人是花大钱捧角调情，以求达到某种目的。新社会点歌的人，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正当的人情礼仪消费”，有的难免不是带着陋习来的。君不见：在电视台，在歌舞厅，在卡拉OK场所，在“三陪”之中，不是都有点歌了么？公费点歌，私费点歌都有。

对已经摆出来的多种“热”病对症下药，清除此中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带来的损害，很有必要。

1996年3月1日

请看这则广告

1996年1月26日，《长江日报》登了一份广告，是向群众推荐电影巨片的，赫然写着：

爆炸！声东击西劫黄金

爆炸！千方百计巧追踪

’96 中影进口世界级大片之一

好莱坞惊险警匪巨片

纽约大劫案

1996年1月23日晚，中央电视台于播放新闻时说：今后引进外国录音、录像光盘，都要经中央审定。在此之前，中央也一再指出武打淫秽影片应在排除之列。这《纽约大劫案》在哪方面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它是中央主管部门审定的？

这个影片介绍抢劫的技术，一定很充分；那么其社会效益也一定很“充分”：教唆人们去抢动。

广告，应该注意：社会主义的广告：教人为善，励人向上，勇于奉献，引导人们学习社会主义的文化。

应以“黑潮”为鉴

1996年1月24日《参考消息》报道《腐败黑潮吞噬着一些国家高官》，列举了：意大利、俄罗斯、韩国等10个国家一批高官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触犯法律而丢官的事例。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资本家养政客，政客为资本家服务。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明白地揭示了这个。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三井的政友会，三菱的民政党，是日本人人皆知的事。用现代化手段由财团给政客输血，使之成为取利的工具，谁也不可能查清楚。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就含有制造贪污腐败的机能，而且可以渗透到社会各个细胞，使之癌变。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如何有效地抵制这个负面东西，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又是不可胜数的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打了败仗，所谓反腐倡廉，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四有”新人，接班建设社会主义大业，都会变成空话。

居然有人派工作组到香港去学习反腐倡廉的经验。这不应视为笑谈。这是连马克思主义A、B、C也不懂的表现。靠这种人去反腐倡廉，等于用豆腐去打铁。

不信么？请想想若干大案要案查不下去的原因。

1996年3月15日

自觉、自重、自尊、向上

新华社 1995 年 12 月 18 日电：《贫嘴将断送相声艺术》，批评一些相声演员油腔滑调，趣味低下，以耍“贫嘴”为能事，降低了相声艺术的品味和格调。

《史记》中有《滑稽列传》，因为滑稽者流，“辞虽倾回，意归义正”，并不是“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无常，戏谑无方”。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谐隐篇》中断言：“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管蒯。会议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这个传统，是相声工作者应该继承的。相声是讽刺艺术，是以小喻大，以近喻远，以浅喻深的艺术，不是“空戏滑稽”的调笑。出洋相，搞低级趣味，不是前辈马三立、侯宝林、常家父子留给我们的传统。

既然是在“二为”方针指导下的艺术，就应该是助人向上、促社会进步的艺术；就应该是对人民与社会主义负责的艺术。这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

艺术工作者应该自觉自重自尊向上，这是社会主义艺术工作者应有的品格。只有脚根站正了，站稳了，方向对准了，决心下定了，任何人都会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学习他们，了解他们，从而吸取营养，以认真负责态度创造高品格的作品。

1996 年 3 月 22 日

注解黄氏周期率

黄炎培先生对毛主席谈的社会历史周期率“其兴也勃然，其亡也忽然”，是大家都知道的。我赘上几句。

其实，这种警句，乃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枚行之久远的金针。

《韩诗外传》上说得比黄氏还明白：“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故无常安之乐。宜治之民，得贤则昌，不肖则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失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鄙语曰：‘不知为吏，视已成事。’‘前车覆而后车不戒。’”

《汉书》曰：“前车覆而后车不戒，是以后车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为之。故殷可以鉴于夏，而周为之。故殷可以鉴于夏，而周可以鉴于殷。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荀子·成相篇》曰：“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荀子·仲尼篇》曰：“位尊则必危，任重则必废，擅宠则必辱，可立而待也。”《战国策·赵策一》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

贾谊《新书·保傅篇》曰：“前车覆而后车戒。”《新书·至德篇》曰：“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旧唐书·魏征传》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杜牧《阿房宫赋》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

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韩诗外传》曰：“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群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矣。’‘乐兮乐兮，四牡骄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伊尹……举觞告桀曰：‘君王不听臣言，大命至矣，亡无日矣。’桀拍然而郤，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于是夏民大怨曰：“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于是夏亡。

古今中外，这种现象的重复出现，并非一两次；代代出圣人，导历史在苦难波涛中前进。不过，思想起来，令人迷惑。毛主席曾作过论说：“说人是万物之灵，其实有时比猪还笨。猪碰到南墙知道回头，人硬是有的碰到南墙上不回头。项羽就是一例。”

黄氏所提周期率，确可以用毛主席指示的“民主”去克服。毛主席写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实践社会主义民主的圭臬。但社会主义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是更高级的民主，这是一门伟大而丰富的学问，大家好好研究吧。

1996年3月29日

抓 纲 吧

1996年1月26日载吴子长文《出书难易辨》，说许多高品位的书订数往往只有几百册，实在令人尴尬，原因是人们一天想赚钱，就不想读书了；酒足饭饱之后，需要刺激，低级下流、暴力凶杀、诲淫诲盗的书刊，便成了追求的上品。文章要求“人们的阅读心理的成熟”。这个愿望是无可非议的。

我不想研究如何解决“出书难”的问题。中央在狠抓反腐倡廉，扫黄打非，打击伪劣假冒商品，整顿社会治安，整顿金融市场，反对虚报浮夸，提倡学习孔繁森、李国安，提倡增强党性，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总之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统一配套的社会。

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吴子长先生要求的“社会的成熟与人们读书心理的成熟”，也就实现了。高品位的书，出版也不难了。

全国执行中央指示是下了大力的，但社会风气不见大的好转，有些恶劣现象，还在滋蔓。

《易经》上有一句话：“彻悟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这句话的通俗解说是：“抓纲带目，纲举目张。”社会的健康发展，要靠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央的正确决策与党组织的保证贯彻执行。

现在常常遇到的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许多正确决策，并没有落到实处。

如果每个党员都具有孔繁森、李国安的品质，有什么办不

好，有什么歪风邪气还有存在余地？

狠抓整党，5700 万党员都按党章办事，必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陈尔程说出了中国人的志气

1996年3月19日《市场指南报》报道了东啤总经理陈尔程的话，全文引在这里，供大家品味：

日前，东啤集团总经理陈尔程在东西湖啤酒厂六届五次职代会上强调：东啤同外商合资是有条件的，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自己干，一定要走出一条发展民族啤酒工业的道路。

陈尔程对东啤与外商合资经营提出了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东啤无形资产至少作价2000万元；二是合资后一个月内交定金2000万元；三是签订合同后一年内资金全部到位；四是中外职工原则上同工同酬。

陈尔程认为，与外商合资经营，是改革开放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改革开放年代企业谋求发展的唯一方式。不管采取哪种经营方式，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者，必须把企业发展的“依托”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去年，陈尔程对各地一批中外合资啤酒企业进行了调查。他说，从国内合资的啤酒企业看，没有几家是真正成功的，在有的合资企业里，老外十来个人拿的钱比我们几千职工拿的工资还多，吃亏的是工人，企业赚的钱流进了洋人的荷包。“我们愿意为党、为人民‘打工’，而不愿意沦为洋人的廉价劳动力。”

东啤也有自己的教训。1993年，东啤曾与加拿大卢堡集团签订了合资经营合同。根据“合同”规定，卢堡集团占60%的股份，东啤集团占40%的股份，外商控股。后来，由

于对方不信守“合同”、资金不到位，致使合资经营“搁浅”。与卢堡集团合资没有成功，使企业一些工作受到了不利影响，有的重大决策至少滞后了一年时间。

我认为，与外资合营企业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依法签订合同，执行合同。吸引外资不是向外国大亨乞讨，是在平等互惠原则下办企业，我方为社会主义服务，你方在经营中取得合法的利润；要依法办好劳动保护与劳动保险，不得侵犯职工的权利与人格。

合营是两厢情愿的，一方不能压另一方，欺骗另一方，不履约，不守法，是不允许的。

陈尔程同志的态度，是中国人与外商打交道应该共有的态度。

1996年4月11日

台胞喊出了：正义的呼声！真理的呼声！ 威武的呼声！不愿做奴隶的呼声

1996年3月20日《参考消息》报道《台湾一团体抗议美“炮舰外交”》。他们抗议美国军舰出入台湾海峡，制造危机，喊出口号：“丑陋的美国人滚出去！”

人类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牺牲亿万条生命和无数的财产，终于慢慢地觉醒了：自求解放的战争必须打，打到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为止；为垄断财团争夺殖民统治的战争，是害人又害己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不能为之去牺牲。侵朝战争，侵越战争，侵古巴战争，企图绞死伊拉克的战争，都以美帝失败告终；派了18000名海军陆战队，带着先进的飞机、大炮、坦克、战车，以及其他精锐武器，踏上了索马里国土，企图消灭艾迪德及其武装，失败了，灰溜溜地滚走了。蒋介石逃到台湾，你们把第七舰队摆在台湾海峡，撑着一副教师爷的架子，杜勒斯在台湾大喊大叫，为蒋介石助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信邪，炮击金门，美国的军舰拖着尾巴躲开了。这都是世人看见过的“纸老虎”形象。美国应该翻开旧皇历看看，翻开今日的皇历看看，苏联解体，东欧演变，并没有给你摆出胜利的美宴，更没有谁把你封成统管世界的宪兵队长。中国人的事，中国人会办好，何劳你来插手？

炮舰外交的时代过去了，回去吧！莫错看了皇历。

1996年4月18日

如何拍历史剧

1996年3月1日《长江日报》载文《是还历史本来面目，还是美化封建投降主义》。批评了用百回《水浒传》底本，宣扬投降主义是不对的。张国光教授辞严义正。

我赞成张国光教授对拍《水浒传》电视连续剧底本的意见。

1996年3月1日，《长江日报周末版》刊出三个议题：《“梁山泊”再起波澜》、《演员没文化到底成不成？》、《相声病在何处？》这三题各有其趣，实际上有内在的关系。

张国光教授说：采用百回《水浒》做底本，“是对投降主义的美化。”很明显，张教授认为电视的审美是不能离开政治的。《相声病在何处》里，中英杰先生说：“进入议论政治生活的殿堂之上；于是相声使命感就变得沉重……给作者演员增添了思想压力，使他们力不从心地从事相声创作和演出。”相声之所以跌入低谷，是被政治压垮的。在《演员没有文化到底成不成？》一文里，伊夫先生说：“嫌大钱的商人决不能没有文化。表演这个行业亦如此。”看了三家的议论，大家怎么想？

当然会有人说“艺术不是宣传工具”，是取笑逗乐的事。艺术不是用理论方式宣传政治的，但没有任何艺术不是用形象语言宣传政治的。艺术形象本来就有“高尚情操”与“庸俗低级”之分；鲁迅先生说过“他妈的”口头语并不是劳动人民本质形象的代表。把在高粱地里搞女人和往酒缸里撒尿，作为劳动人民的粗犷形象，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劳动人民的喜怒哀

乐绝不同于庸人的情趣。

所谓艺术的时代性，是要艺术品与人民创造的历史阶段和进程吻合。对正面人物如此，对反面人物也不能任意丑化。比如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反动的人物之一，他把“娘西皮”挂在口上，蛮横粗野，但这不能代表他的本质。他是反动阶级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谋略家。不是没有脑子的瘪三。塑造蒋介石的艺术形象，也不能任意涂抹。艺术创造是艺术化的政治，艺术品都担负着历史的政治任务。

历史剧和历史小说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必需。这种创作是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再认识，要去除糟粕，继承其精华。

比如武则天，又有谁说她是继贞观之后为大唐兴家立业的杰出女王呢？杨贵妃是谁？白居易的“杨家有女初长成”骗了世人，唐史写了她是明皇儿子寿王的妃子，可是我们的作家，恐怕还很少有人知道：她是明皇最先宠爱过的武惠妃的儿媳。这些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所谓开元之治，是武则天给创造的基础呢？怎么会知道李隆基淫糜腐朽的恶作剧，招致了安史之乱呢？怎么会知道杨玉环既是封建统治下的牺牲者，又是随波逐流自甘堕落的种子？她比班婕妤差远了。

不懂历史，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谈弘扬民族文化，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看不行，因为你没辨别是非，区别现象与本质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光教授要求“还历史本来面目”，也就难免不失望了。很可能还不止失望一次。

不信么？武大郎已经持“滚地功”的特等武功走上荧屏了。

1996年4月26日

这是一个重要措施

1996年4月2日《湖北日报》报道戏剧界一位权威人士得知荆州市城区5家剧场，已有3家改作别用，大声疾呼：请将剧场还给人民。

中国戏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弘扬和发展。可实际情况是：剧团无处演戏（连北京的吉祥戏院也拆了），剧团演不起戏（场租及各种费用太大，谁演谁赔钱），剧场演戏也不赚钱，不如办舞场和卡拉OK实惠。

于是，一批还能演戏的老演员，一大批颇有造诣的中青年演员，长年休闲或操第二职业去了，有的去做广告，去演小品，有的去卖唱，去做舞伴或时装模特儿。

“急功近利”，指出了与弘扬民族戏剧背道而驰的行径产生的原因，用语并不完全适当。

“急功”，对于那些把剧场夺走了的人来说，不适用。他们没有功，对民族文化只有害。他们见钱眼开，不顾社会主义文化大业的建设。“利”，果然抓了一把；大害了精神文明建设。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群众在拭目以待。天桥的把式，群众看得多了。

1996年5月3日

记住：我们是中国人

1995年12月29日《中国食品报》报道：近年来，洋味的品名越来越多，好像忘掉了语言文字的应用也包含着民族主权的尊严和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文章说：“解放思想，首先要抛弃束缚自身的贾桂心态。”

有人说商品或商店用洋名效益高，赚钱。

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都是把政治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同时并进的；为了达到其政治上统治，经济上掠夺，总是要用大力强迫被侵略民族接受其文字和文化，尽力消灭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民族自尊心，消灭其民族性，这是近代世界史里随处可见的。

所以，店名、商标名、物品名等等不是孤立的名称问题，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年代，如何保持、弘扬并发展民族文化的大课题。

附带说一句：“中国”是对我国的正常称呼，“支那”（China）是外国人给我们的称呼；对这个名词的来源有各种说法，暂不谈；但在日本人的口里说“支那”时是带侮辱性的，日本朋友跟我们谈话，总是称我们是“中国人”，只有日本浪人或个别有意侮辱我们的人才叫我们为“支那人”。我赞成该用“中国”标识的地方，尽可能用“中国”二字，不要用“China”代替。

1996年5月10日

这篇文章实在好

1996年4月1日《长江日报》载文《上梁正下梁直》，其含义不说可以自明。

“上梁中梁正了直了，无声胜有声，自然对下梁起着教化的作用……同心同德地支撑起中华大厦。”

很对。也还要问一句：为什么做不到？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更不是装饰，是行动的指南。孔繁森、李国安、雷锋，这样持之以恒地做了。人民从心眼里称赞他们是人民的好儿子。

5500万党员都是自命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要停止于夸赞孔繁森、李国安；要以之为鉴，照一照自己，看看自己的良知还在不在，要以之为矢，射死爬在身上的毒虫。果如此，人民不会戳我们的脊梁骨，人民的积极性会大增，社会风气会大好，免得忙着“扫黄打非”，“反腐倡廉”，“打击伪劣假”……等等。

1996年5月17日

原则从来不长脚

1996年4月16日《贵阳晚报》载文《“以诗礼友家”及其他》，说是北京有位王海，买了假货索赔，某专家说王海这样做，“实际上是以暴易暴，以恶去恶，以假治假。”作者引《庄子外物篇》里师徒盗墓的故事为比喻，结论曰：应该“把狗打得不能再咬人以至落水之后再同它坐下来理论，谁教它是假呢！”

这位专家说得令人神爽：“法律有诚实信用，公平等基本原则……”去掉历史的时间、地点、条件，大概是对的。如果这些原则长了脚，走进了每人的心底，支配人们照这样去行动，肯定会天下太平，法院失业。

可惜“法不自立，类不独行”。法，不会长脚。

专家们天天在大声疾呼“加强法制教育，消除法盲”，可是偷盗、抢劫、杀人越货、制黄贩黄、贪污受贿、坑蒙拐骗、伪劣假冒、吸毒贩毒、化公为私……等行为，从王宝森到草民谁不知道是犯法？大案要案百分比上升，是因为法盲作祟么？

社会上并不止一个王海在打假，然而，有一千个王海能制住伪、劣、假么？”

1996年5月24日

文艺工作中的“破”与“立”

1996年4月1日《人民日报》载文《谈媚俗》，指出“媚俗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往‘性’上靠。”这不必解释，大家从文字上，画面上随时可以看到。文章要求提倡对这种媚俗“艺术”给与舆论监督。这是很对的。

近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四单位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座谈会上指出：“一些媚俗的、盲目捧场的，甚至广告化的文艺评论不时地干扰着广大读者的视线，大家强烈呼吁文艺评论要在民族精神、提高文艺品位，加强思想文化道德建设方面起带头作用。”

这两段话，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有着醒脑清神的作用。这两段话指出了“破”与“立”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不破背离“二为”方针的媚俗、低级、下流的作品，健康的引人向上的作品出不来。

媚俗、低级作品，是以媚俗、低级的评论为支柱的；这种评论的出现，有的是思想认识低下所致，有的是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更有的是为“红包”出卖良心。

作品的媚俗、低级与评论界的媚俗、低级是共生的。江总书记指示我们：要把科学的评论与打棍子区别开。科学的评论是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可分的。

这还是可以借鉴的

1996年5月7日《参考消息》报道：越南对西方抱有警惕，拆除了英语广告牌，打击卖淫和赌博等恶习的活动，人们对“和平演变”的戒心很深。

《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越南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报》经常指出伴随开放而出现的文化颓废现象，‘是没有枪声的侵略战争’。”“越南人民对‘和平演变’的戒心是根深蒂固的。”

中国人也清楚帝国主义不但用枪炮侵略过我们，也用尽了种种办法（如卖鸦片，摧残人民身体，用传教，办学，搞慈善事业，用庚子赔款豢养帝国主义的奴才。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毒化人民的灵魂……）削弱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以求实现其“西化”、“分化”的目的；最终消灭社会主义。这些伎俩，过去用过，现在也没有停止。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他们最善于“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法。秦桧、汪精卫是可耻的。有人把赛金花说成是可以歌颂的，上述者流当然也是可以树碑立传的。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懂得用反动文化去腐蚀人民，瓦解人民的斗争，以求“不战而胜”。“没有枪声的侵略战争”时刻在我们身边进行着。

1996年6月7日

且补充两点

1996年5月8日《人民日报》载文《增强职业道德，禁止“有偿新闻”》，指出：“不可忘记新闻媒体的政治属性、信息属性、文化属性，不可忘记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公正……一味追求金钱，搞‘有偿新闻’，不仅腐蚀新闻队伍，而且败坏党的新闻事业声誉，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旨哉，言乎！

有了这篇社论，不需要补充什么了。

但，我还要说两句：

第一，要树立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并以此为荣的思想，居陋巷，疏水屈肱，不改其乐，敢于蔑视金钱与邪恶。

第二，在行动上敢于坚持“勿以小善而不为，勿以小恶而为之”的原则，“有偿新闻”不攻自灭，“无冕王”也会存在了。

1996年6月14日

向郑州市学习

1996年5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郑州清除街头不良文化现象。郑州市组织了宣传、工商界十多个团体，全面清除市内有殖民文化色彩或国家明令禁用的店名，以及有伤风俗的牌匾、广告、招贴等，大有益于清除文化污染。

污染环境，精神垃圾起着重大的作用，它污染人的灵魂。

文化垃圾是多方面的，不止于广告招牌、企业名称。我们要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在烈士塑像旁，弄起卡拉 OK，似这等行径，算是什么文化？

郑州市行动了，大家都来学郑州吧，祝华夏文化辉煌，社会主义文化放光。

1996年6月21日

咱们都要读鲁迅的诗文

1996年4月16日《贵阳晚报》载余光荣先生《读鲁迅诗文》诗两首，有言“无情莫过严于己，炼得丹心照碧霄”，甚感人。

研究鲁迅或任何古今人，都是为了以之为鉴，收取经验以自励。研究英雄伟人，可以励志向上，涵养品德；研究秦桧、汪精卫、溥仪，可以识卑避邪，赴义不悔。不论研究什么，都不是为了寻章摘句，装饰门面；更不应为曾国藩、赛金花、周作人翻案或把鲁迅与林语堂等价出卖，搅起波涛，以收“丑陋的中国人”等类作者扬名之效。

这种卑劣的文坛登龙术，可博一笑，亦可收“白铁无辜铸佞人”之恶劣的永驻史册之效。冯道尽翻云覆雨之能事，历四朝十二帝做大官，还自欺欺人地说“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中不愧人”，给自己留下了反面考语。

人啊！最低限度要记住自己是人。

1996年6月28日

莫轻信保健品的广告

1996年5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当‘食补’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重视的时候，许多保健品生产厂家却误入了一个又一个误区，自咽苦果。”有的轻科学，重广告，有的重人名效应……

国家商检局决定整治保健品市场，是好事。何谓掺杂使假？中医讲的是地道药材，谁能保证现在用的是真正党参或太子参，还有箭杆北芪、雪天麻、黄精、宁夏枸杞，都是货真价实的么？我们的中药业早已无人以炮灸法去制药了。至于量的方面，更无法保证。以前中药配药都是用戥子称，于今谁这样做？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有——

第一，告诉大家，五谷杂粮，含多种元素，营养最强。

第二，生活有方，食物适量，有收有支，动静适当，静以宁神，动以出汗，宁神养能，出汗排污。

第三，仙方从来没有，葛洪并未长生。

第四，食物要卫生，国家要监督。

第五，除药物保健外，饮料就是饮料，食品就是食品，禁止冠以保健品名。

1996年7月5日

往何处提高自己

1996年7月5日《中华读书报》载李春林先生文《书评》，颇发人深醒。

李春林同志要求评书者要站在高处，莫站在山之中或山之脚，以免以梦境视书。是对的。

站得高，看得远，看得全面，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心愿所能做到的。富人容易把月亮比做银元，厨师容易把月亮比做冰盘，小孩容易把月亮比做饼干，不但是生活的习惯使然，更重要的是阶级的本性，常常支配人产生阶级偏见，因而所见便有高与低或雅洁与卑鄙之分。

王若水先生认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他是马克思主义捍卫者。许家屯在回忆录的第一页上便标榜自己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如果他们两位说得是对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当然不是共产党，“真正的共产党员”当然只有王若水、许家屯一群哥儿们了。

上边说的不是读书，是读人，而及其书。专说读书吧，对于《废都》、《杜月笙大传》、《丑陋的中国人》、《山坳上的中国》之类的书，绝不是有益于人民与社会主义的。

我赞成评书要提高自己的，要本着张思德、白求恩、雷锋、孔繁森、李国安等的人生观、审美观提高自己的，才能明辨是非，作出正确的书评。

1996年7月12日

仓鼠不一定怕毒尾蜚

1996年6月26日《人民日报》载王春立先生《金钱与蝎尾》，他把金钱比作蝎尾。

王春立说：“对金钱的非法占有欲，如同蝎子的毒尾，不仅能伤害别人，也会蜇死自己。”这话对天良未泯的人，会收到警诫的作用。对于“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之类的人，是不会起作用的：这种人高兴的是“今年县宰添朱绂，定是黎民血染红”：一个穷县，发不出工资，盖不起学校，却有钱在一年之内买 68 辆卧车。这些人根本不怕毒尾蜇死自己。

和尚为死人念经，摆的水陆道场上，画出十殿阎罗惩恶赏善的种种办法。嗜血成性，贪财如命的人有办法对付阎罗：他们可以用金山银山收买玉皇和如来佛为他们做保护神，不但“见人开仓亦不走”，而且老鼠也会咬人。“焦点访谈”出示的四川夹江县打假的被打，便是一例。

劝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罚恶，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两者不可缺一。

1996年7月19日

写点得罪人的感想

1996年6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刘文彩的名字在大邑县重新风光起来，地方产品争用他的“名气”，县里要筹办“文彩中学”，当地人说要“文彩重光”“有利提高地方知名度”。

用“文彩中学”、“文彩重光”盖过“收租院”，以“搞活地方经济”，“提高地方知名度”之类的事，果然不少了。

从汉朝迄于清代灭亡，两千年封建王朝，经历了近三百个皇帝（小皇帝在外），凡是统域较大的王朝，都对历史典籍做过整理，并为前代修史，其目的是：以增强封建文化体系，巩固自身统治。他们都懂得“正心、诚意、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修订以儒家思想为体系的二十五史及各种典籍。

我们出的“大辞典”是草率的：条目不如台湾出版的多，音义有不少沿用了错误观点，又没有字形（字形对于研究中国古老文化，是一件异常重要的手段）。

印了若干文化典籍，并没下编《四库全书》的功夫，只是原样照印，没像《四库全书》编者那样给每本书写一篇论证提要，作为读者的指南；其文简约，不对全书精读是写不出的。

至于许多“浅析”、“笺释”、“译文”、“择要”，不少是胡编乱扯的。

建国 47 年来，没有集中大批力量，严肃认真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下一番整顿力量，弘扬中华文化当然无力。沉渣泛起或泛滥，也就难免了。

大邑县领导倒黑为白，为刘文彩“整容”，固然不当，其最深的根系是怎样长成的？

1996 年 7 月 26 日

话说“跑官”热

1996年7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谨防“跑官”热升温》，批评了“跑官”者与为“跑官”“搭桥”之卑鄙无耻。其训可嘉。

“跑官”是资本主义思想支配下的行为。他做官的目的是以权换钱，换取红灯绿酒，金屋藏娇，淫靡腐朽的生活。

可不慎哉？可不惊心注目哉？

可怕的是对“跑官”热淡然处之，漠然置之。

1976年时，毛主席吃芒果，海南岛给中央送三箱五箱而已；于今，海南岛送出去多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诗人讽刺杨贵妃的；于今，广东一年送出多少荔枝来？这类事已经很平常了。张学良的门官一次可以接1000大洋把肖振瀛的求见信尽先送到张学良手里，使肖振瀛得到先机之利；于今，大小秘书、大小科长，也常有不见“实惠”不得过关的。“侯门深似海”、“阎王好见，小鬼难搪”的事，已经不是没有的了，这些列入什么案？谁去查案？难说。

“跑官”热，“跑官”也难，没有“知机之谓神”的本领，有时还搏不进门呢。

“跑官”热是害党害国的大事，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江总书记要大家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我们应认真划一划才是。

1996年8月2日

教授们的话值得重视

1996年5月8日《服务导报》报道北大、清华教授大多不看电影。据调查中文系20位年龄在40岁以上的教授，90%以上没看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阳光灿烂的日子》《红粉》等走红电影。他们不再走进电影院，因为一些电影文化思想方面太平庸、浅薄。教授们对有的编导不学文化、不读史籍，自鸣得意，很吃惊。他们要求电影编导们要学文化，要懂历史、文学和哲学。

教授们的这些意见很难在常见的文艺评论中找到；相反，那些编剧和导演都“走红”，这是什么原因？

那些编剧导演固然有他们应负的责任，更重要的可能还是那肯容许这些电影出台和出钱支持他们制造这些产品的人们。在“二为”方针指导下的艺术是对人民负责，促人民向上的艺术。容许平庸浅薄（实际上有许多是低级、庸俗、下流的）产品出台，是对人民不负责任；出钱支持制造这种产品，更是对人民不负责任——因为它毁灭了社会风气，也毁灭了本来有前途的演员。

1996年8月9日

是黑棉袄值钱还是西服值钱

1996年6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西省省委书记，披着由夫人缝制的黑棉袄急着要到工地上去与群众共同战斗。

省委书记穿黑棉袄跟大家一起劳动，这在五六十年代是常见的，于今少了。

毛主席一再说过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山西百姓认了这条道理：“如果没有胡富国同志和他‘一班人’身先士卒，艰苦奋斗，要想三年之内完成那样艰巨的工程是根本不可能的。”太旧高速公路提早一天通车，节省多少人民币，创收多少人民币？胡富国和他的“一班人”功不可没。

江总书记、朱携基副总理都说搞活国营企业要三个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要有个好班子。

黑棉袄的时代值，比超级市场上标价万元的西装，高得不知多少倍呀。

1996年8月16日

论“无批评时代”

1996年7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要求多一点自我批评，认为现在自我批评的声音确实微弱得可怜，而表扬与自我表扬却习见不鲜。

无批评和无自我批评也是腐败风的一种表现。明明肚里骂娘，脸上却装出亲昵动人，或者把“隐恶扬善”作为处世哲学。这，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伤害是很大的。

江总书记在“关于讲政治”一文中，提出了要有自我批评，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等7个基本问题的界限。划界限就要实现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怎能划清真善美与假丑恶的界限？怎能将讲政治落到实处？

韩非子说过“自见者明”，还说过“自胜者强”；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看到自己的错误，也不一定很难（比如，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人皆知其为错），下点自省功夫就行。可是，把自己错误向党公开，并决心改正，这种“自胜”的功夫，是非常不易的。

讲政治，就要下“自见者明”，“自胜者强”的功夫，就要敢于实践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1996年8月23日

坐轿与抬轿

1996年6月11日《三峡晚报》载文：《新娘坐轿源自宜昌》，说是乾隆游江南，到宜昌，路上被新娘花轿阻住，乾隆要新娘对对子，才许花轿前进。新娘对上了，花轿走了。

这篇短文说坐轿之荣，始于宜昌，为鄂省增光不小。

有人愿意坐轿，便有人愿意抬轿。坐轿的逍遥，抬轿的弄个脚力钱，各得其所。

“抬轿”成了官场、文场、商场登龙术后，事情就变得复杂多了。

在文场可用自骂自吹，或与友人合作，边骂边吹的方式，招徕观众以成名。

在商场上：雇人哄抬，或作文章，或制广告，或名人介绍，或录像写真，或专家化验，或专著弘扬，或重奖哄骗……这比前门外多家王麻子的招牌“如有假冒、男盗女娼”像是文明了些。

在官场上有雇人哄抬的，如制造“天子门生”，或“入室弟子”，“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其次，有借裙带关系，或“通家之好”互抬的。再次，也就是最通行的办法：“仕途易行金作马”；这个“金”字的含义很多：黄金、白金、红金、绿金、黑金、沫金等。红金者丽姝也，吕不韦献孕妾与子楚而生秦始皇，此红金与绿金之合用也；李园献妹予春申君窃其权，此红金之用也；以钱买杀手制死对方，此黑金之用也，杜月笙者流常干这种活；至于溜须拍马，顺口颂圣，沫金（唾沫）之

用也。抬轿的要求的脚钱是：反本求利，这是规矩。但抬轿的也有遭到“树倒猢狲散”之厄的，拍马不当遭马踢的，色衰而“爱”弛的，因换马而被弃的，所以抬轿的总结了四句兼热兼凉的结语：

抬头肩的欢天喜地，
抬二肩的不许放屁，
抬三肩的乌烟瘴气，
抬四肩的昏天黑地。

1996 年 8 月 30 日

值得赞扬的一铲

1996年7月10日《长江日报》报道：北京清理整顿按摩服务行业，铲除异性按摩。警方查出138名按摩小姐中的132名有淫乱活动。

北京警方和工商管理部门决定禁止和取缔按摩服务中的异性按摩活动，是造福社会的行为，应为之尽力鼓掌。

北京这样做了，其他城市该不该也来照样做？

我们应该知道：任何民族都不是靠出卖女性，发展色情行业而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绝不是娼妓创造的。

1996年9月6日

这篇社论太重要

1996年7月7日《长江日报》载文《领导干部要起表率作用》，其义不说自明。

只要照这篇社论去做，则官民团结，同心向上，共克难关，既能克服经济中的许多难题，技术上的难题，管理上的难题，也能扭转社会风气。

先可以从小处做起：比如住房，坐车，穿衣，安排儿女等事。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做了三件事：把换下来的豪华汽车都给了离退休干部，让自己的儿子当矿工，要家人缝了一件黑棉袄穿在身上走入工地与工人劳动。这样做，并不难，其影响力却很大。

容易办到的事，往往成为难办的事，就看你是随波逐流，还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与人生导向。

1996年9月13日

小偷激起的念头

1996年2月9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放了浙江省桐乡县一家工厂，被小偷盗走了几十万元的消息。审讯小偷，牵出了一串与贪污有关的人。这个小偷的运作，激发了我若干念头，写在这里，与诸贤达共品。

第一个念头，想到了维吾尔姑娘头上的小辫，一抓一把。这可能是中央一再指出的腐败现象在滋蔓的具体注解。

第二个念头，我们有纪检会、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审计机关等，可能断了油就不动，少了滑润油就不好动，里头添上渣滓就会被损坏。桐乡一案，给出不少经验。

第三个念头，像桐乡小偷给贪污分子曝光的事，并不是桐乡的“专利品”，已经出现过若干，这类经验早已有之，为何抓不住？这里头有小偷不解的原因，也有大家不解的原因。是不是要下大力攻关，才可能取得？

第四个念头，既然腐败现象滋蔓不止，有“滋”（要水），才能“蔓”（野草茂发），是谁给水？谁播种？人之初，性本善，不对；人之初，性本恶，也不对。人之初，是一张白纸，是什么因素把它涂坏了的？

第五个念头，到底有多少小钱柜。王宝森有多大的小钱柜供自己挥霍？国有资产被各种耗子挖走了多少？正在挖的耗子又有多少？个别与普遍是矛盾的统一，可以互相转化。我们的任务是不要使“个别”化为“普遍”，对么？

1996年7月20日

这不是一条新闻

1996年9月4日《武汉晚报》报道：新洲阳逻内燃机厂厂长兼书记陈华炳，副厂长陶宠章，供应科长李光明，供销科长邵凯发和司机王某，因嫖娼被公安局抓获，各罚一万元，事后，陈某等合谋开假发票，用公款报销了嫖娼罚款。

这应是两条新闻：（一）书记、厂长与下属人员合伙嫖娼；（二）正副厂长合谋制造假单据，把嫖娼罚款作为公款报销。

国营企业扭亏久战不下，国营企业资产流失屡禁不止，都说是管理不善，应转变机制，加强科学管理，如果是阳逻内燃机厂这样的领导班子，能建立科学的管理么？能指望他们扭亏增盈么？能指望他们保住国营资产不流失么？

完善的法律，有；科学管理经验，有。只是对那些以权谋私的人，能起作用么？那些手中有大权的人，动笔就批给姘妇十万百万，给子女及裙带关系以合法手续贷出千万，造豪华公馆，置办各种豪华用品……国家内债增加，希望工程进展缓慢，扶贫资金短缺，前所未有的大面积拖欠职工工资，拖欠医药费，难道跟这些蠹虫没有关系？

反腐倡廉，应该加大力度搞，看看钱权色的交易网，能不让人出冷汗么？

1996年9月27日

请看“西瓜变成葫芦”

1994年3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西瓜变成葫芦。

“西瓜变成葫芦”，看似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买到的本是葫芦子。可怪的是：为什么用葫芦子冒充西瓜子骗人？

这个答案也很简单：为了赚钱。”

伪劣假冒产品，不能说越打越多，可也难说越打越少。像“茅台”、“五粮液”这样高档酒，几乎没有办法分出真假了。

不是有这么一说么，“没有杀人的心，是不能赚钱的。”

这说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真实品德：为了赚钱，他们是不惜宰人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史。

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品德是什么？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

严打造假，严惩贩假，是消灭伪劣假冒商品的前提。

1996年10月4日

人人可以为尧舜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于廷写的《从武汉旧事谈精神文明建设》（1996年9月12日刊于《长江日报》第七版），我读了。报上说的那位打人的劳动局长不但撤了职，还开除了党籍，向群众公布了，在干部中进行了讨论。“三反”时，市委有一个干部用公款吃了碗热干面，也作了检讨。这类旧事不少。

于廷同志说得对：“人的思想端正了，精神状态变好了，在根本素质上提高了，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办。”在我国，很多国营企业亏损，原因不是一个，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领导班子的思想问题。前几天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公布了山西平陆县发电厂的情况：厂长一家人假公济私，吃喝玩乐，把一个好端端的发电厂弄成发不出工资的亏损企业。换上新的领导班子后，企业就扭亏为盈了。

不发工资，拖欠工资，置离退休职工于不顾的企业不少，可是许多厂长经理乘的是豪华汽车，吃的是豪华宴席，住的是上等住宅，穿的是阔气服装……消耗了大量国家资金，也打击了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领导者要别人为社会主义发扬无私奉献精神，首先自己要做表率，实践论者的可贵处不止于赞扬模范者的精神，重要的是实践模范者的精神。

宣传和号召向模范学习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拿出行动来，用行动说明：“我带头学”，“我带头学他们不以权谋私”，

那就请你从超标的豪华住宅、豪华的请宴以及种种特殊享受中退出来；“我带头学廉洁奉公”，那就请你用吴天祥的“我要你一分钱，我就不值一分钱”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如果不够尺寸，就认真地改。5700万共产党员如果有一半这样做了，给国家省出两三千亿资金，用来扶贫、建设希望工程、改善社会福利大概完全是可能的。

表扬和赞美孔繁森等英雄容易，但如果把你的家也弄成他们的家那样简朴（或简陋），则是很难很难的。人人可以为尧舜，但是过艰苦的生活，是不易的。如果连这点决心都下不了，我看咱们就别拉着那些真英雄，真模范给自己装点门面了，“不躬不亲，庶民不信”才是真理。

“严打”已经打了14个年头了，一般案件减少了，大案要案逐年增加。十几年前丢一辆自行车可以立案，现在，有谁立这个案？据说有位派出所所长说：“不闹出人命，三千两千的事，不会来。”这话是真的，还是谣传，未做出考证。可是笔者连丢了3辆自行车无人查处，则是真的。当然这位所长，他们追大案要案已经累得够呛，这点事再麻烦他们，于心不忍。

现在老百姓中流传很多顺口溜，这些顺口溜，不是经典文章。但包含着群众的批评。“天听自我民听”，据说古有采风之官，认为“虽小道”亦有可取之处。不是听不到这些，而是太轻视这些。孔繁森等同志既敢听顺耳的话，也敢听难听的话。他们能够兼听以励志励行。他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英雄，而是上承党的教导，下受群众的推动与支持，在坎坷中磨屎出来的。

这个磨屎就是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谁都知道高级享受舒服。但是共产党人不能丢开人民去追求自己的享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永远是共产党人

信守的格言。

这些年，谁能否认依法纳税与偷税漏税；依法经营与行贿收买；货真价实对人民负责与制造伪、劣、假欺骗人民等斗争不是普遍存在？支配这种斗争的是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极端个人主义唯利是图的思想，一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这两种思想在每个人身上、家庭、团体、单位每时每刻都在斗争。如果你被前一种思想支配，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红包”贿赂，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你能够坚持后一种思想，你就可以成为孔繁森式的英雄。

武汉的旧事，旧精神文明是武汉人创造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大发展，也带来了不少的负面的有害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现在的武汉人应该认真思考和正确对待的。我们只要按照孔繁森、李国安、吴天祥等英雄、模范那样去做，智慧就会来，办法也会有，可以稳操胜券。

1996年10月11日

高雅风情是可塑造的

1996年6月21日《参考消息》报道了《鼓浪屿的钢琴曲》，介绍了那个1.7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有1.8万名居民，拥有300架钢琴，琴声常不断，钢琴高手倍出。

现代化建设中带来的负面东西，便是环境污染。歌舞厅、娱乐场里狂暴，颓废的音律；武打、淫秽、媚俗、低级的录像，弄得人身无适处，神无静界。

鼓浪屿给我们创造了奇迹。

十几年前，我去过那里，一上岛，最刺眼的是叫卖海鲜的，他有30年代天桥卖估衣人的本领：叫得响，叫得成串，叫得无穷尽。他能够用吼声与手拉住你，只要你敢还价，准能卖给你——他要的价总在实价10倍之上。摆摊的随处都是，公园里垃圾成堆，日光岩上脏乱不堪。去年我又去了，正如这位作者所描写的：“巴赫和贝多芬的音乐在狭窄蜿蜒的回廊间飘荡……”

这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那里的负责人跟我说：“这是领导下了大决心才整治出来的。这个岛上不但不许有汽车和自行车，也不许乱拆乱盖，不许乱砍乱伐；这里不许搞卡拉OK和任何狂躁的音响；所有商店、摊点、景点、浴场都做了一番认真整顿，向群众作了反复不停的教育，很费了一番力气啦。”

1996年10月11日

这样办公好

1996年5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把接待上访的桌案搬到赞皇县土门乡接待来访群众。这是难得的。

汉东方朔公车上书5车，也就是给皇上送了5车大报告。今天我们机关里文告有多少？

70年代末，我在陕西做过调查，省直党政军民学的人马，每天可制造约7千件文告；80年代初，到了河北，又调查一次，省直每天可制造约8千件文告。不看吧，是官僚主义；看吧，更官僚主义。做官也实在难。

在武汉市委时，组织部报告说×工厂党建很好，根据是那里组织健全，按时过党的生活；宣传部报告那里宣教工作做得好，黑板报、墙报样样有，半个月上一次大课，学习空气热烈；工业部报告说那里一团糟，生产完不成计划，利润下滑。看了这些报告，等于白看，最终只好到工人那里去问个明白。

我被美好的造林报告至少骗过四次；湖南道县林场、湖北官塘桥林场、陕西白河县以及河北涞水×乡造林的报告都说育林广茂，郁郁葱葱。我去了，看了一眼，什么都明了：原来是空炮。

维高同志不可能长住土门乡，作为领导每年抽出三分之一时间去直接听一听人民的话，收效一定很大的。

1996年10月18日

是应该想一想了

1996年2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高级技术顾问郑孝燮先生的话：“美国、法国都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论经济水平和现代化程度都比我们高，论历史却未必比我们长，但在如何对待历史，如何保护历史文化方面所采取的极为慎重的态度值得我们借鉴。”这话应该好好品味。

“保护风景资源的财富”，这是厦门古炮台所在地胡里山下写着的一条大标语。

写出这条标语的人，绝不是匠心独裁，而是心有文化。

“文化”二字怎么解？

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人类社会由野蛮至文明，进化所得之成就，表现于科学、艺术、宗教、道德，风俗、法律、习惯、历史等之综合，叫作文化。然而，要求得一个完美的文化之定义是困难的。“人类文明的综合”，勉强可用罢。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正是这些支撑着各民族自强不息，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布鲁塞尔，比利时人专门引我们看了一个不到半米高的撒尿的小男孩像。介绍人说：“他看见着了火，急忙撒尿灭了火，免了一场灾难。”他们很看重这种精神。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内，河流交错、道路狭窄，建筑物没有超过三层的，他们爱惜这个古老、朴实的城市。美国的纽约，高楼耸立，与日本东京的银座一样，那是大亨们厮杀的场所，但华盛顿则是一个以白宫为主体，没有高楼，只有

绿化美的城市；在日本，不但京都、奈良保住了古老文明的景物，就连游人如云的岚山，也没有豪华饭店、舞厅，有的是傍着青山绿水的日式住房，那里招待客人的上等食物是“岚山豆腐”。在前南斯拉夫，接待客人的一处上等别墅，坐落在野林之中。看守别墅的是一位猎手，他把猎获的野兽头，制成标本，放在别墅边一个小陈列室里，供来客赏玩。

这都是人们常说的文化。

北京解放初，登上北海白塔，可以看到以前门、故宫为轴线的故宫、景山、地安门、三海，错落静穆。琉璃厂、东安市场堆积着古老文化的多种宝藏。一到北京，就可以闻见北京味。还有南京、杭州、苏州、西安等，一起构成别具特色的中国味。

这种“味”涵养了中国人，使我们成为世界上富有文明的民族。

1996年10月25日

为何争演潘金莲

1996年4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争演潘金莲的“戏外戏”格外红火。这是为什么？酒足饭饱之后，抱着小花猫，可以想一想。

西门庆是清河县城里人，县志上写着的。武大和武二是清河县人，武大郎的坟土改前还在。潘金莲是清河县黄金庄人，在黄金庄是不许演潘金莲戏的。

《金瓶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读《金瓶梅》，把“潘金莲大闹葡萄架”等糟粕丢开，看看王婆子搞“十光”的嘴脸，西门庆夺人之妻，霸人之产的心术等，就会承认：作者使出了中国文学独有的非凡之笔。

这本书的历史价值也是非凡的。它刻画了晚明之后，一个代表了前期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于一身的凶狠剥削与掠夺的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是这段历史的牺牲品。她们从被迫变为自甘堕落。她们不是中华民族的可为典范的优秀儿女。犯不着花那么多钱去制戏，犯不着花力气去创作，更犯不着去争着饰演这种堕落典型。这是“二为”方针下的文艺园中不能容纳的。

可悲的，不是潘金莲，因为她早已不在了，或者她根本没存在过。可悲的是：在社会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自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艺术工作者，竟“争演潘金莲的戏外戏”！

1996年11月1日

自己不要出卖自己

1996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有些干部，并未好好地落实十四届六中全会会议的精神，做了表面文章。这是值得注意的。

“知之唯艰，行之唯艰。”实践论讲求的是：言行一致。言行一致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

后五代有个冯道，历任四世十二帝的高官，享受了厚禄，哪个皇帝他都跪拜；为厚禄出卖了自己的灵肉。他知道自己与一个“宠物”一样，为了解脱内心的铅块，只好自欺欺人，他为自己立传，曰：“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中不愧人。”那些过着以权谋私、贪污盗窃、淫靡腐朽的生活，表面上又用“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华装包裹着的人，都有一本冯道的哲学。“笑骂由他去，好官我自为之。”

1996年11月8日

难得的好文章

199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载文《大奖的作用》，批评了大奖大赛，红火多而乱，“出钱办或赞助的企业，为的是提高知名度，至于比金子还贵的社会效益则退而为铁为石了。”

这篇文章批评了奖多而滥、而不值钱。而只有泡沫价值，无社会价值；更批评了“争奖者极其踊跃，以至不择手段，‘演出’了一场场闹剧甚至丑剧”。

多少年来，很少人敢这样说话了。作为人民群众，多么希望有人伸手扎一针或开一刀，把这不断扩散的癌细胞给剪除掉！

当然，迄今世上还没有除癌的万灵药，但防止蔓延并逐步根除还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

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是“二为”方针，是在“二为”方针指导下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此，社会主义的文艺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文艺一样，出发点就是带有鲜明政治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要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而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艺各为其特定政治服务。高尔基、鲁迅不都是世界文坛上的巨匠么？诺贝尔奖金从来没他们的份；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的作品，不也是震撼世界的，诺贝尔奖金也落不到他的头上；周恩来不是对世界和平贡献巨大的人物？和平奖金也与他无缘！道理很简单：因为衡量这些奖的标准，是以有利于资产阶级政治为准则的。

“奖”之所以滥，仍然是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作祟

的结果，仍然是不讲社会主义政治的结果。如果不信，请大家去仔细品一品给《丰乳肥臀》十万元大奖的味道。只要是神经健康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作品，把地主的“还乡团”说成“仁义之师”，把强奸、淫乱等罪恶都扣到八路军身上，把反动阶级咒人民革命的恶言秽语一鼓脑地倾泻出来……这怎么跟“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对得上？怎么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得上？这样的“奖”是对作者的良好培育，还是把他推向泥潭？这样的“奖”，将引出一群什么样的人？

中央一再指示我们要讲求社会效益，就是要我们尊重社会主义的政治效益；对社会主义有益的，艺术性强的作品，才是社会主义艺术的精品，应该奖；与此相悖的，不该奖。

难道不是这样的么？

1996 年 11 月 15 日

大家都来扪心自问

1996年11月19日《长江日报》载文《良心值几何》，批评了：拖欠职工工资的厂长，去买豪华汽车，盖别墅，以劣质种子骗农民，以工业酒精造假酒，以至于出钱买高考，女生做广告……列举了“良心狗屁不值的例子”。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良心就是党性。有良心，就忠于“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入党誓言。良心要求你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不动摇；在任何权位、名利、色情、金钱的诱惑下，站得稳。

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一批英雄倒下了；一批英雄走上了新的征程。因为革命的需要，有的人做了官，有的人到老还是个平民，却没有叫屈。这是真正的铁打的为革命、为人民的良心。

吴天祥同志说：“我要要你一分钱，我就不值一分钱。”这是一块极其灵验的试金石。只要你不愿自欺欺人，只要你甘心过低水平生活而以气节为重，你就可以做到这样。你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1996年12月6日

江总书记要我们学哲学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唯物辩证法，讲究思想方法，注意防止和克服认识上和工作中的片面性。”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这个指示是非常重要的。

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奋斗，每个共产党员都愿付出最大的牺牲，忍受最大的艰苦，顶住最大的挫折；但这并不等于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无数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和鲜血，经历了无数险阻与挫折，集体的智慧培育出并认识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真正出现了阶级、政党、领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起来的，找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路，使革命摆脱了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克服了困难，取得了革命胜利并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

广大人民的奋斗，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下，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发展了胜利的。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用《矛盾论》与《实践论》两篇光辉著作概括地表述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并不是教授学者在课堂上讲述的条文，而是指导实践的武器，他的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想、道德等著作，都是实践中的哲学或哲学指导下的实践。

从一个朴素的富有激情的革命成员，逐渐地变成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的革命工作者，是无数人亲身经历了的过程。

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前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这就需要认真地读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提高认识与驾驭事物的本领，肚里有理论，才能用理论联系实际，处理实际，做对了，可以给我门继续升高的始点，做错了，可以总结，提高认识，把错误化为正确的先导，在这样的奋斗过程中磨练自己，改造自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达到自觉的一致。这是真正的提高。只有这种提高，才能使理论与实践不是两张皮，才能把忠于远大理想的实践做为最高的人生价值，做为最大的乐事，从而鄙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任何艰难困苦中不动摇，毕生忠于党、人民和共产主义。

1996 年 12 月 13 日

这也是阶级斗争

1996年3月6日《长江日报》载文《南京路上摆供桌》，批评上海南京西路一家商场在即将开业时，摆了一张大供桌，陈列了三牲、水果、年糕等祭品，香烟缭绕，干部职工跪拜祈福。

这篇文章提出：“无神论与有神论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争论，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更迭，而自行消亡。”

不止无神论与有神论之争如此，整个意识形态中的矛盾斗争也是如此，一进入新社会，都一心“咸与维新”，是不可能的。

残余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要长期起作用。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典章、文物，完整地建设起来，绝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办到的。

这些年，不少人讨厌说“阶级斗争”，其实这是客观存在。君不见“大款”可用金钱、美女买通某些当权者站在民主政权的位子上为他们服务？

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是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复辟的重要手段。这种斗争是十分尖锐的，无孔不入的，要抵制迷信，更要大力全面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96年12月20日

只有苦学才能弘扬炎黄文化

1996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载文《莫冷落“根柢之学”》指出：既是中国人就要注意学习中国传统语文文字学，这不是无的放矢。

中国历代封建帝王都懂得：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大力“整理”图书典籍，去其不利于己的部分。儒家把“焚书坑儒”列为秦始皇的大罪状，其实是冤枉的。孔夫子把三千多篇诗经删掉了十分之九，才当了鲁相就把他的对头少正卯给杀了；孔夫子作《春秋》，到底把别国的史籍给毁掉了多少？没人知道。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又毁掉了书？没人知道。就说乾隆吧，他搞了《四库全书》，大体上有7万余卷，对于保存文化典籍是有益的，可他同时把他认为不利于他的书也毁了7万余卷。

这个账是算不清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统治阶级都要整理典籍，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使之为本阶级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服务。

建国四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但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到底还是不相称的。

学古文，学历史，学哲学，已是大学的冷门；学古文字学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了。我们的编辑可以随意地把“重足而立”改成“垂足而立”，把“不学诗，无以言”改成“不学书，无以言”，把“坤初六”改成“坤”。把项羽本纪的“学书不成，去，学剑”点成“学书不成去学剑”。把高祖本纪的“与父老约，法，三章耳”点成“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一部汉语大辞

典，竟然只有音、义，不要字形。鲁鱼亥豕之误，触目可见。

我们应该问一句：将来由谁批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后代使之不至于数典忘祖，该负什么责任？

“根抵之学”是民族文化的根柢，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不是空口号，而是一场刻苦的实践。不甘寂寞，不甘清贫，不肯为之献身，是办不到的。

1996 年 12 月 27 日

对苍蝇可以放枪么

1996年12月9日《长江日报》载文《庙穷方丈富琐议》，要求对离任厂长要进行审计……不能其庙穷，而让其其中的“富方丈”、“富和尚”一溜了之。这个建议当然重要而合理。

和尚、方丈住在庙里，伴青灯古佛，无权无势，必然洁白无为或无敢为。自古以来，凶僧恶道，又多有记载。何故？五代的名僧鸠摩罗什可以有10个美女伴睡，因为他有后赵君主石虎撑腰；北京雍和宫大喇嘛挑词驾讼，卖官鬻爵，权倾朝野，因为他有王公大臣为之撑腰。凡是贪污的人都是既爱财又舍财的。惟其爱财，故舍身试法；惟其舍财，故能买通上下左右关节，取得保护伞或保护神。这已是习见不鲜的了。

一位同志曾做过检察长。熟人跟他开玩笑刺他说：“你的本事不过是‘见了老虎就烧香，见了苍蝇就放枪’。”他莞尔一笑曰：“你们太抬举我了！对落在老虎屁股上的苍蝇，其实我也不放枪。”

哀莫大于心死。侵吞人民血汗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之心死了，便胆大妄为。得了好处的人，保护人民血汗的心死了，便放纵“四恶”，任其横行。

钱，不但能够买得鬼推磨，而且能够通神。善男信女把钱投给释迦牟尼、观音大士、五百罗汉、五道尊神、山神地祇，以买福和投资求佑。有贪污的，便有保护贪污的；搞大贪污的，总要买大保护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让我们根据六中全会决议，来一次正心运动吧。何谓正

心？儒家讲了两千年，党讲了七十余年，典籍如山，载之甚详，我就不必備嗦了。

取洋名与怪名的目的是一样的

1996年3月12日《北京日报》载文《洋名泛滥堪忧》，批评了许多中国人不懂，外国也莫名其妙的洋名，有伤社会主义文化。

鲁迅生时，文人有名“高尔础”者，显然是要与高尔基连宗扬名。前门外“王麻子剪刀”牌号引出了“老王麻子”、“老老王麻子”、“真老王麻子”等，是为了争夺顾客。旧社会也有取洋名的，如天津“琪士林”之类，但不像现在这样多。

今天是洋名、怪名成了海洋，这都是商品意识指引下的创造，一则以洋名怪名诱人，一则以立广告牌收钱，只要给钱写什么都行。

有人公然提倡香港文化。如果这种人不是神经病患者，总应该知道：香港文化是典型的殖民地文化（我无意抹煞那里有反抗殖民文化的爱国主义文化），而这些洋名怪名正是殖民文化表现，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不相容的。

自己照照镜子吧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载文《趣味辨》认为：有文化的、现代的文明人，都应努力在精神和心理上不断提升自己，使自己的趣味逐渐地高尚起来，逐渐地做一个纯粹的人。这话是对的。

共产党人的理想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精神素质和文化物质生活的环境。愿为远大理想而献身的人，以受“万里长征之苦”为乐，以登上敌人断头台昂首就义为荣，以与敌人搏斗而牺牲为高贵，以与人民同甘共苦、水乳交融为神圣；他们经受着比苦行僧还深重万倍的磨砺，但他们不是苦行僧，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升天堂，而是为了人类解放。“拒绝壮烈”，倡导动物式的物质追求，其瓦解革命志士仁人斗志之心，拉着人类倒退，却是肯付出最大力气的。从背道意义上看，他也是“壮烈”的。这种壮烈的人，在国内国外还少么。

这就是两种不同世界观导出的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趣味。

低级趣味引出了低级的历史观，生活追求，文学艺术，人际关系，这些低级的垃圾扰乱着社会、腐蚀着人民，破坏着历史发展的正路。

“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喜欢什么鸟。”这是人民中流行的一句歇后语，看吧：一抛万元的狂喝狂吃，不惜千金买成群三陪女郎之美艳，对“丰乳肥臀”之类的作品的奖誉……能不明辨是非么？

文章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经常地鉴别，审视自己的趣味……尽早尽快地脱离低级趣味。”

从“幼儿院士”想起的

《中国文化报》（年月记不清了）载文《戴高帽儿》，说是有些报纸喜欢给文艺界戴高帽儿，什么“大师”、“中外知名”……说这是“精神红包”。如参加北京某画院的美术作者都被称为“院士”，太廉价了，以此类推，幼儿园出来的，“也可称为院士”了。多美呀！

华君武同志之笔奖善罚恶，祛邪扶正，50余年矣。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上，他的笔画倒了三位教师爷，杜聿明、陈诚、卫立煌；画恼了挑帘接客、揖盗殃民的蒋介石；画壮了气可拿云的解放雄师。蒋介石认定了这支笔比飞机大炮厉害，悬赏数万元要买华君武的人头。应该赞扬蒋介石，他从反面写出了历史的实质：人民艺术家总是敌人的死对头，恰是人民的乖儿子。

我热爱君武同志的漫画。他有丰厚的艺术功底，不但笔走龙蛇，而且笔笔如山，倏忽而来，一触透地穿天，使敌人有死无生，使痼疾无法避入于膏肓，使正气蒸腾直上。他的笔道，不是挥毫泼墨，而是铁马金戈，战阵长啸。他的笔到之处，敌人胆寒，腐败落魄，媚俗掩袂，下流落荒。他与他的笔得到人民的赞扬，也得罪了社会垃圾。

在东北战斗的日子里，每天可以在《东北日报》上看见华君武的画，成为日日不可缺的食粮与饮料。

于今，很少见了。

“是不是老了？不肯多动笔了？”我问过他。

他摇头，苦涩地微笑，递给我两本厚厚的画集。这都是往日的积淀。它们在向我说着无声的语言。

今天，偶然有机会看到这位“幼儿院士”，翘着小辫，睁着大眼，完全甩掉了稚气，端庄地站出了“院士”的风采。我爱抚地笑了；当我认定这是个幼儿时，我的心凉了。

幼儿做出许多幼儿的行径，人人都经过这样的阶段，不学爬，怎能学跑？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本来会跑的人，偏要爬着走路，这就令人发笑了。这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

可是，实际生活中，尤其是商品大潮中，金钱巨浪把人搅浑了的时候，人头做足而走的“人”，却也不罕见。

花两百万或几百万的“赞助”，既取得兴教的美誉，又可以在名片上印出××最高学府的“教授”，××学院的“科学发明家”，××××会的金奖，还可以以金钱铺路，弄个××国××市的“荣誉公民”，至于博士、大师、明星、××家等，就不用说了。

最近，已有广告招揽定购 24 史，羊皮精装，书名纯金烫金，书页含金烫金，16 万元一套。据说此书有阅读价值（这是不消说的），更有观赏价值；“大款”们有兴，尽可以买一套，放在客厅的紫檀木书架上，自然气象风雅，满室增辉。

这不是“幼儿院士”族么？

胡绳同志敲响了警钟

1996年12月13日《长江日报》介绍，“胡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贪污腐败也是一种叛党，他说：“我们党始终坚决地不断地为克服自己内部的阴暗面、自己内部的错误而斗争，正如不断地同党外的敌人作斗争一样。它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就在于此。”

胡绳同志这段话指出了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党内免不了有阴暗面与错误，也免不了遇到敌人的破坏；二是党为了不断提高，必须不歇地与党内病态做斗争，与敌人的破坏作斗争。

这种经历，我们党是有的，经验也是丰富的，因为斗争不力经受过的挫折也是严重的，有几次是濒于毁灭性的挫折。

未取得革命胜利之前，犯“左”或右的错误的同志，其居心都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都是抱着为革命牺牲一切的精神的。在敌人的屠刀下，敌人不问你是“左”的或右的共产党员，只要是共产党员，他们就决心杀之。共产党取得政权，一些人当了官后，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与胜利前提着脑袋在与敌人斗争中犯错误，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是思想政治上的变质。后者是为革命走错了脚步。对于前者的改造，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已换上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灵魂，对于后者，经过批评自我批评，讲明道理，多数可以改正过来，因为他们的灵魂未变，只是一时的迷误。

共产党员掌权当官之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人民对

敌人专政，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国家，人民的国家有力量镇压任何敌人的反抗。变聪明了的敌人一手举着原子弹、一手给糖弹，问你是愿意吃原子弹还是愿意吃糖弹。他们用吹捧的伎俩把你捧得迷迷糊糊：把钱送到你的兜里，把色送到你的怀里，用“桑拿”浴手法把你弄得舒舒服服，乐不思蜀，使你用印把子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把你推到前台时做为一个人型，把你收到后台时当做木偶随便一扔。看看吧，那些被“星云法师”招走了的大人物，还有被帝国主义情报机关拉走了的民主自由分子，当他们把能出卖的东西都用完了时，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处躺着的，不是临于受烹的狗么？

对于那些叛徒、民族败类，不值得去骂。重要的是：某些个别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当官做老爷之后，如何才能不腐化？这个问题是关系着共产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毛主席在西柏坡还没有进城时就郑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从那一天起，毛泽东就用了许多办法想遏止这个不利情况的发展。

现在，腐败的发展，有的比过去更厉害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这不是因为改革开放造成的，随着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进来一些苍蝇，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历史的发展向我们提出的新问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把一群社会主义国家给变质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和旧

有的剥削思想，乘共产党人掌权后的薄弱处，无孔不入地散布享乐思想、拜金主义，促发以权谋私的意志，腐蚀共产主义思想，一不警惕就要上当，落入泥坑。

当前，敌对势力从内部、外部用尽一切办法腐蚀着共产党。反腐斗争成了严酷的生死决斗。

如果这一仗不打赢，经济上去了，也不是社会主义。当今的历史，已经毫不掩盖地把这种事实展示出来。

马克思主义者无所畏惧，不悲观，不掩耳盗铃。只要我们认真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复地做阶级分析，总可以得出好结果。可怕的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蒙着画皮的假马克思主义替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欺骗人民，推崇极端个人主义，鼓励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这些没有硝烟的攻击，比有硝烟的攻击，厉害得多。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的建设，远大理想灵魂的塑造，是致胜的保障。历史也是明明白白地昭示了的。共产党每次取得的胜利，没有一次不是在思想政治建设的前提下取得的。反腐倡廉的斗争，也不例外。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六中全会的决议的重要性，在此。

雷锋活在人民心中

1996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某公司为建加油站，要把雷锋像拆除。消息传开，不到半小时就聚集了上千市民，反对拆除雷锋像。”

这个行动，的确感人。

雷锋离开我们很久了。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一方面是腐败现象滋蔓，常常使人的心理失衡，有时以为雷锋也被“酒海”、“爱河”给漂走了。在那些用红红绿绿斑斓色彩包装起来的“酒海”、“爱河”里，的确淹死不少的“人”，还有“人”在陆续地往里头跳。他们的确麻木了，麻木到喝人民血汗也不心疼，麻木到分不清人与兽的区别。这当然可怕，又可悲。

但，站在“岸”上种田做工的人民，头脑总是清醒的。他们知道：雷锋是人民队伍里的成员，人民之所以成为人民，就要像雷锋那样想，那样做，那样生活着。雷锋爱人民，人民爱雷锋，因为雷锋的一生始终站在人民之中，为他们服务，与他们一起为新社会服务。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人民的头上，想也没有这样想过。

拆雷锋像，就是拆人民的骨肉，就是毁坏人民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事业——精神的与物质的。人民当然反对。

这个爱憎分明，旗帜鲜明的伟大行动，表示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已深深铸定人民的心。一小撮腐败蠹虫，要翻人民的天，必然受到人民的惩罚。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摧的；已经用共产主义理想武装起来的中华民族，能闯过任何险滩，把理想变为现实。

补充一段话

《工人日报》报道：“公款吃喝风悄悄转向”，用“迂回吃喝地点”、“避实就虚”、“瞒天过海付帐术”……等战法，照吃不误。

此文所列“公款吃喝风”的“向”，是早已有之的了。比如王宝森吃喝玩乐的地方，常常不在北京市内，而在怀柔别墅，既幽静，又避人耳目。至于把吃喝费划到其他项目中去，如会议费等，更不是个别的了。报上不是刊出过：有的人把嫖娼费都巧立名目用公款报销了吗？

当今有一种最流行、最不惹人注目的办法是：别人出钱我吃喝玩乐。这些人凭着手中的权，引来了愿意出钱供奉他们的“大款”们，吃喝玩乐一切开销，由“大款”们付款。这叫作“乘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这丝毫“无损”于公款，有什么可以非议呢？

其实，在肚里，人人都明白：这是市场经济中一种交易方式。“大款”供你吃喝玩乐，你必须“投桃报李”。于是“大款”们很方便地得到“关系贷款”，中了最有利的“基建投标”或“承包投标”。在验收偷工减料的竣工项目时，轻而易举地捧到“优良”二字。“大款”们下窝子，放钩子，钓大鱼，是很熟练的。

时间长了，交情厚了，“大款”们便愿意跟你搞合资：你把一亿元的固定资产，核为5000万元，“大款”们出5000万元。这一合资，“大款”们便拿到了一大把钱。他们还不满足：

他们不肯出一分钱，拿出一张空头资产单据，请你好友帮忙，以此为抵押，向中国的银行金库贷出 5000 万元，便合营了，便享受“三免两减”的优惠政策了。

就这么一来一往，你说够你吃多少次上等宴席，搞多少次异性按摩，住多少次高级的包房！

这叫不叫政治斗争？

在这个恶作剧中，甘心卖身卖国的，有谁人？

向阮直敬礼

1995年12月18日《长江日报》刊出阮直同志的文章《谁让斯文扫地了？》说道：一股下海的大潮，就让文人固守的“忧道”堡垒土崩瓦解了。

阮直同志，你居然敢把一些“斯文人”的麒麟皮剥开，露出他们的马脚来，放在太阳下风光一下，也称得起：胆子不小，功德无量。我得向你致敬。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并没有把“假斯文”的、用画皮包着的千万种真实相揭示出来。这不是吴敬梓之过。钟馗斩鬼的工作未做彻底，留下了大批“斯文鬼”，一个吴敬梓怎能画得完。

不过，斯文之所以扫地，除了斯文人的主观原因，也有其客观条件。处在这黄金浪潮“四海震荡风雷激”的境地，风行草偃的势头，的确可怕得很。人们把“中流砥柱”比做刚直不屈的品格，是因为在浩浩洪流、泥沙俱下的狂潮中，中流砥柱，能够屹立不改其刚直之节。在偌大的黄河中，也才只有一个中流砥柱。文人们都懂得：不花钱不但不能出书，就是勉强给你出一本，所得稿酬也不可能提高生活水平，何况许多时出书还要倒贴钱呢？于是斯文们悟出了在市场经济求生存必须有创造性：有的小学老师向学生代销饮料，有的中学老师提着冰棒筒上课堂，先卖冰棒后上课。有的作家发现为×厂写报告文学的稿酬最高，照抄《金瓶梅》的残渣稿酬最高，为曾国藩、周作人等辈作翻案文章稿酬最高；艺术家则发现做几秒钟的滑

稽广告或者广告的“艺术段子”，比什么艺术劳动价值都高；……于是不少斯文们便忙着“扫地”去了。

“柳下惠坐怀不乱”，这是中国人形容不迷于色的人的话。我的老师认为这话不科学。他说：“大姑娘都坐到怀里了，还怎么区分乱与不乱呢？”像雨后春笋似地冒出了这么多舞厅、夜总会、卡拉OK、酒店，伴之而来的“三陪女郎”族和享受“三陪”的族。“空即色，色亦空”，愿意嫖娼的人，还用发愁找不到目标么？

读书吧，育己助人

毛主席最爱读书。他的态度，先是“六经注我”，即各种书给我以多种多样的知识，满足求知的要求；然后是“我注六经”，书上给的知识有对的，也有错的；有邪的，也有正的，择优而从，释优而用，从正面学，也从反面学。他常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老师，蒋介石、杜勒斯也是老师。他常说：他喜欢杜勒斯、尼克松，因为他们直白说出反共和消灭社会主义的决心，给出理气清神的教材。

毛主席知道哲学是诸门科学的领头科学，他读了大量的中西哲学著作，结合实践，写出了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实践论》与《矛盾论》。他的一生中，时时都能看到强大敌人的弱点，向之出击；在任何挫折中都能找出转败为胜的因素。他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但不用主观随意性，他善于“因势利导”。他与他的同志们紧紧依靠人民，导演了史无前例的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凭借的不是先天赋予的天才，而是深刻掌握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读了古今中外许多社会科学的书，知道在自然科学方面，自己的知识短缺。解放后他攻读自然科学，对土壤学、物理学、化学都下过功夫，他最先对原子学家指出原子之后还有别的微粒子；他认定：物质的可分性是无限的，质子、中子的出现，证明了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预见性。

他常常劝大家读书，批评不读书、不看报的不良习惯。这不是老生常谈，这是促我们在必然王国中力争自由王国的地

位；我们不应是自在地工作者，应是自为的工作者。做一个自为工作者并不是容易的，想做就可以做到的。自为工作者在处理问题时，要把稳“中庸”之道，即苏轼说的“总万物之理而不过”，孔夫子说的“过犹不及”，凡事做得适合其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处理问题要兼顾宏观与微观、目前与长远、集体与个人的利益。事务主义者，就事论事，凭感想、热情、一时冲动办事，常常费力不讨好，纵然不怕牺牲，勇于献身，也不等于促进革命的胜利。至于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好行小惠，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者，更不必说了。

读书，是革命者生涯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忙于送往迎来，举杯请宴，不下力读书思考，想在茫茫事物大海中，做到博中取约，举纲张目，好整以暇，是办不到的。

怎样做到忙而不忙，乱而不乱？就是要读书，要善于用思想，学古人之长，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就可以像毛泽东那样：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的第一段，用了不到 300 个字，就把全局战局和斗争形势说得明明白白（这样的文章，绝不是秘书们能办到的）。

读书是生活、工作的组成部分，懂得这点，才可能懂得读书是一种高尚和美雅享受。读书，一个人对着书本，枯寂无声，旁观者以为枯燥，实际不然。读书人在与古今中外各种人谈话，交流思想，互相启迪，每个人说的都是心里的话；真话是真话，假话也是“真话”，品味着各种话，各种心灵，各种面孔，都给出说不尽的情趣与韵味。

一个时代的进步，一个新历史阶段的创造，需要有一大批肯读书、又肯实践的力士。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懒汉、庸人，绝不是历史的促进者。

论 善 恶

宋太宗写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勒石布告于郡县，以诫官吏，名曰诫石铭。用意是好的，但把事情说反了，应该是“上天易虐，下民难欺”。“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见于宰相刘罗锅电视剧主题歌），说对了。真正洞察一切的上帝是人民。一个人的历史价值有多大，只能在人民的秤上，才能称量清楚。自己吹，不算数；朋友帮着吹，也不算数；用生前的“万民伞”或身后的“功德碑”等外包装的办法，更不能算数。“在追悼会上没坏人，在批评会上没好人”，这话虽近挖苦，也确有一定正确之处。蔡邕为了取得丰厚的“润笔”，能给七岁而亡的孩子，写出绚烂夺目的功德。后五代历事四世十二帝，见了新皇帝就跪拜，只求做官不顾廉耻的冯道，在自传里竟称自己“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中不愧人”，无耻之尤，可见一斑。

自从进入财产私有、阶级划分的社会以后，人类逐渐形成了一个公认的公德，也就是共性的“秤”，那就是：为民造福者善，害民者恶。这是人类成为社会动物之后，为了互相依存发展所必需的。

人是有思想的，谁不知道偷盗、抢劫、贪污、欺骗、淫靡、腐朽等是恶？可是金钱、女色、权位、名利，时时都在诱惑着人，有的人就甘心情愿地堕落下去了，却又不甘心把自己变成“下品”，于是便采用自欺欺人的办法：给自己搞外包装。他们不懂得任何外包装只可以骗人于一时，不可能骗人于永

久；可以骗一部分人，不可能骗全体人民；凡是伪劣虚假的，总要暴露出来。贞节牌坊之多，并不能说明婊子之少。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那是最上乘人的品格，不是人人可以具有的；做为一个普通人的品格，兢兢业业，自食其力，不因贪欲走邪道，这是起码的人格。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好话说了千万，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已。

对贪污腐败分子应该“连根儿拔”

新华社转稿载越南在胡志明市的法庭上，宣判泰姆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范辉福等四人因贪污罪处以死刑时，听众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可谓“斩草除根”之快。

“斩草除根”，在我家乡则叫“连根儿拔”。

小时候，我跟父亲拔谷子或高粱苗，即书上说的“间苗”或“疏苗”，父亲嘱咐我：对瓜叶的（即网状叶脉的）把头打掉就行了，对顺叶的（即平行叶脉的），必须连根儿拔掉，不然，它会再生。

贪污腐化分子都是兼网状叶脉与平行叶脉的草，必须既打头，又拔根儿，才能不再萌生。

我们已经处理了很多贪污腐化分子，好像对于他们所织的“网”和伸展的“脉”，没有仔细剔除，不少余孽逍遥法外，也给刑满释放的贪污腐化分子，留下了再生之路。这是值得注意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没有“连根儿拔”。

越南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范辉福，贪污了数百万美元，又从非法交易中捞取大量好处。越南政府大张旗鼓，给以审处：共涉及范辉福等被告 20 名，其中包括政府官员、银行官员，范辉福的同事、亲戚和朋友；另有 63 人被传唤出庭作证。这一案是当众公开审判的。越南新闻媒体作了广泛报道，把被告捆在“人民罪人”的耻辱柱上。

这案还在继续审理，看来，越南政府对此案的罪犯是决心“连根儿拔”了。越南总理武文杰说：“对于贪污腐败的官员，

不论他们的职位有多高，都应该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

“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可能是“连根儿拔”必须的措施，也是“连根儿拔”的决心的展示。

是否如此，请大家考虑。

行贿亦有“道”

我对灶王爷很熟悉，小时候，我家里供着他们夫妇俩，每年腊月二十三日把他们夫妇送走，然后再买一张新的，把他们又供起来，两边用新红纸写出一副旧内容的新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横披是：“一家之主”。

祭灶的事，是每年要做的。摆三杯清茶，用两块糖瓜（麦芽糖）把他们夫妇的嘴一粘，用火把纸上的灶王爷夫妇焚化，他们就上天了。

有时，祭者求之过奢，或祭品不足，惹得神人发脾气也是有的，我们庄上有一位，祭灶焚神，边磕头边祷告说：“灶王爷保佑，我丢的准找着，别人丢的我拾着，你千万保佑……”烧神的火头，忽地把他的胡子眉毛给烧掉了。又有一位端着一盘猪头肉，供在神前，他边磕头边祷告，猪头肉的香味刺得他心神不安，家养的狗闻见味也走过来伸嘴；他一急把盘子端起，把旁边的清茶也扫倒了，没注意，长袍的下摆烧着了，一惊，把猪头肉和盘子一齐扔到地下，盘子碎了，猪头肉也被狗抢走了。看，神的确是有脾气的。

世人知道：拍马屁也得拍到点子上，拍不好要挨踢。贿神求福同样是一门学问。不懂得这门学问的人，也会倒霉的。

有一位想从×大钢铁公司买50吨钢材，钢材大俏，不见经理买不到。他给经理秘书通了几次话，得到的回答都是：“经理不空。”有人给他说：“你应该用20响加手榴弹！”（那年代市场经济还不如现在发达，一条烟、两瓶酒还能顶用。）他

拿着这份“祭品”闯进了经理办公室，见到了经理，说了两句寒暄话，便递上了“祭品”：“你辛苦！这点东西不成敬意，请您……”他一笑，经理瞪大了眼睛：“咱们都是国家干部，不兴这个，拿回去！”这位被碰了回来，又找朋友咨询：“人家不要，怎么办？”朋友笑了：“送礼也是学问，你当着办公室众人面送东西，经理能接么？”那位买钢材的得了窍，乘夜摸到经理家，果然一切顺畅。

我花了这多笔墨才写了“送礼学”的一个小小章节，要饱学这门学问，看一看《官场现形记》，是必要的。它会告诉你：送什么礼品，怎样送，应走的门路，如何把礼品送到刀刃上等等。如果你聪明，结合如今新的送礼经验，活学活用，一定会产生灵验效果。不过，我得说一句：当你把这一套用得得心应手，获得大富大贵，威灵显赫时，你也由人变成鬼了。

琼斯先生说实话

他的谈话是弗洛伊德的“两腿之间就是根”的性解放哲学的准确注释。应该说：比弗洛伊德说得更直白、坦率、深刻。他说：“性是生理需求，谈不上爱情，跟谁睡觉都能解决问题。”

中华大国有一位颇有名的“星”（我不提她名字），曾有人问她：“您何时结婚？”她回答得很风趣，也坦率：“问题不能这样提，男婚女嫁的说法并不合乎逻辑。比如喝酒，喝完了啤酒喝香槟，喝完这瓶喝那瓶，谁都知道这是正常的。那么，男的找女的，女的找男的，都是为了满足各人的需要，找了这一个，又找那个，有什么不合理？”

我认为这位“明星”的论断比琼斯还高，她把人推到比动物还落后的地位了。狮子、老虎、鸽子都有固定配偶，都互有承诺，都不搞近亲交配，都“懂得”（这个道理，动物学家还未弄明白）这是健康繁衍的需要。

人，是有理智的，有思想的。在这一点上，人本质上区别于动物，难道我们愿意再“返祖”回到猿猴的时代么？

琼斯先生有了钱，有了三处别墅，跟数不清也记不住的女人睡过觉，物欲、肉欲的享受也算够水平的了。可是，他在大树底下，被黑狗催促着走时，他吻了狗伴，迷惘地说：“瞧！这就是我的爱妻。”他领着黑狗走了。

这是一幅极妙的图画，活画出他的生活方式的空虚。谁要是不懂“空虚”的涵义，可从琼斯先生那里得到完满的回答。

莫教“厚黑”惑乱人心

我没读过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从李先生说的“不薄谓之厚，不白谓之黑，厚天下之厚脸皮，黑天下之黑心子”，及民国人士的评《厚黑学》语录“宗吾此书，真不啻聚千古大奸大诈于一堂，而一一议定其罪”上看，可知李先生之书是鞭挞大奸大诈族之书，是泾渭分明，奖善罚恶的。这样的书，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加上新时代的内涵，培育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把李先生原义的“厚黑”加以篡改，把它颠倒过来，誉之为真、善、美，从而把张思德、白求恩、雷锋一类人生观中的真、善、美混为一谈，那就不能不严肃地给以辨析了。

伪、劣、假商品横行，大家恨之入骨。仔细想一想：这些伪、劣、假商品之所以屡打不尽，是什么原因？正是被颠倒了“厚黑学”在—批“厚黑”族里起着精神支柱作用。为了追求钱与个人享受，什么卑鄙龌龊的事都干，什么寡廉鲜耻的丑态都做。他们为潘金莲鸣冤，为赛金花树碑，为周作人翻案，为刘文彩喝彩，为曾国藩表忠，为帝国主义侵略颂功，大力推崇种种腐蚀民族魂的各类作品……他们的理想是：制造一个“厚黑”王国，使“厚黑”的思想与行径合法化。

警惕、抵制、排除颠倒了“厚黑”学，必须下大力去做，不可掉以轻心。

制止暴力轰炸吧

1996 年 4 月 28 日，年轻人马丁在澳大利亚的阿瑟港用枪随意射击，杀死 35 人，伤 19 人，制造了一场惨案。

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说：“惨案提出了一个荧屏暴力对孩子的影响问题，对社会一些特定成员的影响问题，更广泛地说，提出了一个现代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否助长了我们社会暴力滋生问题。”

霍华德说的“现代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否助长了我们社会暴力滋长问题”指的是什么？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色情的追求，物欲、肉欲的膨胀，权位的争夺，道德的沦丧，总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毁灭的社会，不都在助长着抢劫、偷盗、强奸、贪污、行贿与凶杀？

1995 年，美国的调查：一个长到 12 岁的孩子，从电视中平均看到 800 次杀人镜头，10 万个暴力场面。澳大利亚的儿童在校期间，仅从电视上可以看到 1.5 万次杀人场面。在这样铺天盖地的影响之下，怎么让孩子不走上邪道。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多尔批评好莱坞公司对孩子进行着暴力轰炸，他说他们在制造“没有思想的暴力，没有爱情的性交”。连克林顿也呼吁限制暴力影视。

资本主义的代表都知道这种“暴力轰炸”之害，为什么我们戴着社会主义艺术家帽子的艺术工作者也为“挣钱”不惜残害我们的后代，在荧屏上、在书刊上、在绘画上、在表演艺术上，连篇累牍地制造“没有思想的暴力，没有爱情的性交”？

为什么党政机关不下最大决心，使出最大的威力，向这种斩杀社会主义后代的魔鬼，作坚决、彻底、不扫绝不罢休的斗争？

你说这该咋办

《楚天都市报》的韩雨、汉雄、砚文三位记者，勇敢地考察“发廊”的奥秘，看到了奇怪的场面，听到了特异的声音，知情人牛氏一席话，指出许多发廊都有异性按摩，不然，赚不了大钱。将锦帐撕落，水下百怪，尽现于眼底。

三位记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多杀“回马枪”，加大打击力度。

我认为，这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商品有伪劣假，“大打”之中，也有伪劣假。

某大火车站，设有一个派出所，被评为模范派出所。因为每当上级要求“大打”时，他便把偷儿们找来，开门见山地说：“上一回有5位坐了几个月，这回谁来？”几位偷儿应声而起：“我们来！”所长又说：“最近一个月里，不许乱伸手，懂么？”于是这个车站每次“大打”都“成绩斐然”，被评为模范。之后，扒窃事件依然不断。

记者还可以到车站去考察一下：售票厅门外便有人卖黑票。

稍微想一下，你准可以明白：四川夹江县造假货的势力能把打假局长给抓起来的道理了。

“发廊”奥秘并不是“发廊”独家产品，桑拿按摩、卡拉OK、包房、旅馆里开房间，三陪带四陪之类所包藏的奥秘，恐怕不亚于“发廊”。

为什么它们能存在？

记者先生，你们揭开一层帷幕，只看到百怪在舞；如果再揭开一层帷幕，便可以见到百怪的牵线人。这样做，是必需的，但，这是很危险的呀。

人民在拭目以待

梁田同志很希望《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落到实处，成为“权力约束的重要一步”，不要落个“软弱无力”。

人民把希望化为失望，已不是一次两次了，渐渐地就麻木起来，习惯于用“搞比不搞好”，来自我安慰。

党为了与人民同心同德采取了许多类似《规定》的措施。

这就提出了：落实《规定》之类，“为什么这样难”的问题。

共产党是讲实践论的。有名的唯心主义者王阳明学说中有一个论点，他认为：能把孝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而不见行动，不能算真的懂得孝道。

“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即穰侯）之东山，独无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亡期而亡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这段话出自《明人百家小说》，毛主席看过，批了“有理”二字。）可见做了官不倚势而富，而贵，而骄，而罪，不自觉地走向灭亡，是大不容易的。

你不能抗住用钱、色买权，就不可能坦荡磊落，写《规定》的报告，不虚文为饰，也就难了。

写自传容易，写真自传则大难。“事无不可对人言”，是对

“光明磊落”的考语。可是，一个人肯用刀子解剖自己，终于是需要最大勇气的。

没有对党、对人民的忠诚，谁能够揭开？

如实地向党写《规定》的报告，是以最纯正的党性为根基的。能坚实地站到党性立场上，才能掏出五脏六腑给党和人民看。

这是大不易的。然而，这是党能否与人民打成一片，求得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关键。

人民不能不翘首以待，拭目以待。

加强内力，方能扫荡污垢

《楚天都市报》记者揭开了“发廊”的内幕，又揭开了车站附近的暗娼活动，引出了肖洒先生的短论：《要用铁帚荡污垢》。可见肖先生胸中块垒沉重，但是，他手中没有铁帚。只好祝愿“《楚天都市报》顺应民意，为荡涤丑恶现象鼓与呼”了。

这真是可叹、可悲、无可奈何者也。

古人说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者。这种人不可一概而论。其中有“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者，这是被麻木之类；有的是知其为丑恶“无能为力”并视他人之干涉为“多此一举”者，这是无可奈何者；有手中有铁帚，却闭目塞听，装聋作哑者，这不是麻木，而是心中有数，从污水中捞鱼者。最后一种人，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支持着破坏社会文明的虫肆虐。

中央大力反腐倡廉，要求干部严以自律，尽忠于民。4月10日，《人民日报》第九版刊出“领导干部应守住四条防线”：耐得住艰苦，顶得住歪理，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如果真能做到这四点，则“篱牢不怕犬入”，则铁帚在握，出击有力，不怕污垢不除。

看来，除外弊，首先要加强内力。党必须在这方面下大功夫，下苦功夫。

你敢照一照么

在某市举办的一次党的建设研讨班上，一位老干部在会上强调了一个观点：“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是我们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的好教材，今天还要好好学。”这个观点，立刻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如今，提“老三篇”少了。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不但是共产党人思想道德的准则，也是中华民族古圣先贤所倡导并支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道德传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临财母苟得，临难母苟免”等精神，都属于这个范畴。

公与私，利己与利人，廉与贪，忠于理想与甘趋下流，是矛盾的统一。每个人自身都处于这种矛盾斗争运动之中，躲是躲不开的。吴天祥同志说：“我要要你一分钱，我就不值一分钱。”每个人要能做到这一步，做官一定公正廉明，工作一定勤恳不苟，对人民也会全心全意服务。不过，要做到这一步，其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必须抵住私欲的攻击，必须抵住“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干扰。你必须问问自己：敢用吴天祥那句话做镜子照一照自己的五脏六腑

么？

“老三篇”是能照彻肺腑的镜子；孔繁森、吴天祥、焦裕禄、雷锋是能照彻肺腑的镜子。这些镜子可以助人祛邪扶正，助人轻装上路，助人挺胸前进。

希望“贪者常戚戚”

1997年4月5日《湖北日报》载范国强之文，希望“贪者常戚戚”。范国强同志出于善良之心，希望贪者自责，主动向组织自首改过。

这样的贪者是有的，范文中举出的便是。

但不能说所有贪者都能“戚戚”而自责，而改过。

孔子说：“知耻近乎勇。”敢于自责的人，都是良知未泯的人，还有羞恶之心，才能鼓起勇气，自首改过。

但是，人并不都是这样的。

人类是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群体。其所以互相矛盾，是因私利与公益，私欲与公德相矛盾，其所以互相依存，是因为只有互相依存方能合力抵御灾害、创造日益美好的世界。人类的智慧表现在不断调解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便发展了人类文明。古往今来，人类的公德中都包含着限制私欲维护公益的内涵，都以贪污、受贿、行骗、淫秽为耻。可是，有人根本做不到，也不想去做。他们的哲学是：“狗走遍天下吃屎，虎走遍天下吃肉”，“人生得意须尽欢，美色如林金如山。”希望这种人“戚戚”自责，是徒劳的。能以贪污为耻，必须具备做人的起码条件。反腐倡廉，扫黄打非，这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斗胜则国存，斗败则国不存。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任重而道远。

所以，我说要促“贪者常戚戚”，首先要认真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使迷而不返的贪者知道什么是耻，鼓起良知之勇，自查自律自改，自求做人。

保护环境,治理环境

1997年4月27日《长江日报》报道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指出东湖的水质已超过三类水质的10倍,要求省市委“尽快扼制污染势头”。这个指示很重要。

我于1949年5月19日进武汉(白崇禧于5月16日撤走),那时,武汉还不到一百万人,从武昌到珞珈山,路上一片荒凉,还有土匪出没。于今,武汉已有700余万人,其中城市人口400余万人。城市大发展带来了不可轻视的环境问题。

现在,我们城乡环境污染严重,应该说是由于吸引外资时只注意一个方面,忽视了严重的后遗症;同时,在自我发展中,又不大注意发展现代化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及其他后遗症。虽然城市规划做了很多,似乎指导思想与措施并不很明确。

人们都看到了水、空气、灰尘、垃圾、老鼠、害虫、疾病、噪音、淫秽、毒品,伪劣假商品等等的污染,但对于拥挤、视野、文化等的污染,却没有引起大的注意。

美国夏威夷的旅馆特别贵,海滨游泳场也特贵,因为那里的空气特好,海水特清,绿荫繁茂,阳光也特好,实际上那里是在高价出卖阳光和空气。

我们的好多城市,住宅与工厂区交错;工业商业闹市区与风景区交错;风景区内的自然景点与商贸点交错,把污浊空气、噪音、拥挤气氛一鼓脑儿压到人们身上。

我去过杭州,那里把西湖治理好了:把西湖与钱塘江沟

通，每三个月换一次水，保持水的洁净；把闹市区全部建立在西湖之外，保持了“西子”的娴静风貌；除了“楼外楼”老饭店之外，没有添别的饭店；西湖除了旧十景之外，还添了龙井品茶、郭园小憩、净慈听禅、梁祝学馆等。

净化荧屏

1997年5月17日《武汉晚报》报道了一个小女孩看了“刚才的主角很性感”电视片，她把大衣一脱，腰一扭，对妈妈说：“这就是性感。”陈善家和他的审片组认为：到了该整顿我们“荧屏形象”的时候了。

在《书刊文摘导报》上，已不止一次地介绍过连克林顿、布热津斯基、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等资本主义代表人物都认为“渲染暴力、血腥的”电视等危害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难道自称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自称坚持“二为”方针的艺术家、大师、星们，连这点最低限度的良知也没有？

孔夫子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他贬斥这种现在西洋人所说的“没有爱情的性交”。现在，某些传媒好像把“性感”与“爱情”当作同义语了，似乎没有袒胸露背，亮大腿，就没有爱情的艺术。这些“艺术家们”是“返祖论”的追随者，可是他们谁也不去过猴子的生活。于是世界上便出现了吃面包，喝洋酒，两条腿走路的新型动物族。

有人说“爱”是充塞宇宙的，没有“爱”就没有生活，人类生活是以爱为主体的。且不说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只问一句：创造历史的动力是不是男女之性爱？如果人类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人们只忙着牝牡交媾就是了。但人之所以成为人，之所以有人类文明历史，千真万确的事实告诉了我们，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地走出来的，还要这样走开去，难道人民艺术家连这点历史知识也没

有。

有人统计，中国曾出现过 466 个皇帝（这个统计不知从何时算起，也不知是否把许多小皇帝统计在内），总之，中国的记名的与不记名的皇帝，是很多的。皇帝们吃得好，住得好，于今，许多“晚侃儿们”或“暗侃儿们”，在这方面比皇帝享受有过而无不及了，比之皇帝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来说，可能有点逊色。所以，羡慕皇帝的幽灵，常常穿魂入魄，皇帝与美人的戏文与戏说，如长江大河流淌不息了。从努尔哈赤算起，满清十二帝及其后妃们已经不知登台多少次了，还不知要忙到何时。

中央一再要求艺术家深入生活，而深入生活实在难。人民艺术家要深入的生活，是“上帝”（工·农·兵）的生活，不是有人说的“到处是生活”。但“到处是生活”论是很有影响的。坐在城里忙着赶场接收礼品或红包的生活；给广告精撰数十字，或画一幅画，或出演一下，轻而易举地拿几千元，（入了明星格的，则是万元以上）；由企业或企业家给出优厚招待，在雅室之中为之书碑立传，十万字拿几十万稿酬，是容易的；与星办合作社，也是利如涌泉的。这都是“生活”。

艺术家们，应时时摸一摸自己的良心了。

这些话，是微弱无力的。但愿它是“起于青萍之末”的轻风。

旧话新音

1997年5月15日《人民日报》载蔡若虹同志回忆毛主席回答一位同志的提问：“如果敌人把竹签子插我的指甲该怎么办？”时说：“你应想到人民……想到人民！”若虹同志想起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一再提起“要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不要背弃人民……”

这话，说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旧话，却赋予了新的韵味：“希望我们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永远不要背弃人民，只要有一天和人民断绝关系，我们的作品就会黯然无光，人民也就不需要我们了。”重在希望二字。

希望与失望是矛盾统一，在失望的时候，失望循着物极必反律前进，便给予了人们以希望。希望，是随失望而上升的；失望沉重时，人们急切地希望新的光华。新的光华常常是火星，却是希望之力量，人随之奋斗，化希望为现实。若虹同志之希望，正在于倚身于希望之星火，求其成为燎原之势，则社会主义的人民艺术大兴。

这是必然的。但这又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

看来，怕“竹签子插进指甲里”是不行的。

想到人民，愿为人民奉献一切的人，是无所畏惧的。“舍身求法”的人是创史的人，也是人类文明的脊梁。我学着《红灯记》里铁梅的唱词，谄上几句吧：

听罢若虹几句话，言语不多道理深。

失望之中长希望，皆因上帝是人民。

是谁“掉价”和受罪

1997年6月2日《楚天都市报》记者说：“巩俐”用数百万美元的饰物来标示一位中国评委（即巩俐）的身价，是否也太‘掉价’了呢？”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迄今，还被不少人尊崇。电视里与电视外的哥儿们不都是讲的“两肋插刀”的义气？至于“女为悦己者容”浸染的深度也并不浅。杨贵妃一“容”，便得到“姊妹弟兄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扬州曾是盐商大贾集居之地。他们千金买笑，那里便出现了“千家养女千家艳，什亩栽花胜种田”的局面。前不久，据说某大埠选出一位第一小姐，一位大亨便出1500万，把她“包”下来。

谁都知道：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共妻”的基地是“红灯区”。“红灯区”是把“美容”零整批发的。“美”、“星”等不能说都是红灯区族，但也很难划出个严格界限，香港大亨有人把“五美”用重金全包，分A、B、C、D、E轮流值夜的；也有出巨资赞助选美的，谁知道其中交易的奥秘呢？

这是腐朽的坏风气。

在新社会完全铲除了？大家可以去揣摩。

此风不止，“女容”之商品化，女予以金饰装点身价并以为之荣，不以为耻，怎能避免？不自重的“女容”者，掉价又受罪！

向家永教授致敬

1997年7月19日新华社东京电，报道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家永三郎先生拒绝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教科书中改为“武力进出”，日本政府要对他判罪，他为此进行了32年的斗争。

勇哉，家永教授！你是捍卫人间正义的斗士！

我请有良知的日本人民翻看一下1937年7月7日之后的日本大报纸《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这些报纸曾经刊登过“八·一三”上海抗战到12月南京陷落期间，野田岩与向井敏明的杀人竞赛，这些报纸不知多少次使用了“膺征”二字，描绘日军的侵略行动。日本投降后，在长春的日本特务机关，用福尔马林药水泡着的中国抗日将领杨靖宇与陈翰章的人头，被中国人拿到了。在南京大屠杀中，与日军苦斗的幸存者李秀英还活在南京。多田骏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于“讨伐”冀东时下过“杀光、烧光、抢光、对水井下毒”的命令（如果日本政府不肯提供这个档案材料，我可以提供）。

早些年，日本就有人主张把“家永教科书”中的“侵略”二字改为“进驻”或“进出”。我要问一句：别国的武装部队可以任意“进出”日本或任何主权国家么？如果这种“进出”落到日本身上，日本不认为这是“侵略”么？

家永教授的斗争，代表了日本人民的良知，也代表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人民的良知。

199 年 月 日

推广庆香港回归报道的好经验

在举国欢腾庆祝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国艺术家们创造了大批雅俗共赏，艺术价值高的作品。

在这一段时间里，广播电视台有一个值得珍贵并继续保持下去的好经验，人民要求保持下去的好作法，就是：敢用黄金时间向人民做黄金奉献。事实证明：这是应该做到的，可以做到的；占用了黄金时间，减少了货币收入，极大的增加了历史收入，增加了子孙万代的收入，还不值得么？

六中全会决议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庆祝香港回归的时候，全国创造了爱国主义教育高潮，使人民认识今日之甜，昔日之苦。今日之扬眉吐气，是一百余年华夏人民牺牲奋斗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才雪耻回生，才生长强大起来；国家逐渐富强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未灭，我们的任务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两手都要硬。怎么个硬法，庆香港回归这种群策群力，爱国主义之潮，漫天盖地，大长了精神力量，大长了建设力量。用好黄金时段应该从政治的角度来对待，推广庆香港回归时期所创造的好经验。

无止境的欲望导致犯罪

1997 年巴西《这就是》周刊 6 月 25 日一期文章，题为《生活优裕会导致犯罪吗？》

4 月 20 日，巴西首都巴西利亚 5 名有钱家庭的子女将睡在公共汽车站的一个印第安人活活烧死，舆论为了找出原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4 月 23 日，家庭富足的 15 岁的美国姑娘达夫尼·阿卜德拉和她同岁的男友瓦斯克斯在中央公园用刀杀死了一名 44 岁的不动产经纪人。

物质富裕而精神贫乏者有之，或物质贫乏而精神富裕者亦有之。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实了的。

物欲的极度贪婪与渴求使人蜕变为两条腿的动物。这也是有的，也是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了的。

不是生活优裕扭曲了人的性格并导致犯罪，而是以自私自利为主导的个人主义极度膨胀，发展到以极度损人利己为乐的疯狂程度，才造出社会中的失去人类最低良知的精神错乱现象：淫靡腐朽，杀人越货，尔虞我诈等。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一部分人变成这个样子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才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不可能在新政权建立时便一下子洗掉剥削阶级社会带来的腐朽思想、道德、风俗、习惯的影响和侵袭。这就是必须下大力气，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原因。

我们必须反对腐败，打退腐败，才可能健康地建设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否则，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也是历史证明了的。绝不可掉以轻心。

照镜子的方法

1997年7月20日《长江日报》报道美国人阿瑟·亨·史密斯写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中的话：“中国所缺少的不是智慧，也不是耐心，不是实际性，也不是乐观主义……他们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这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的论断是一致的。但都是唯心论的狂妄独断而已。不过，也可以反思一下。

照镜子要下两种功夫：第一，看镜面给出的像；第二，要思像中所含之质。

史密斯先生写的《中国人气质》这面镜子给出中国人的像是：“……他们缺乏的是人格与良心。”日本老牌特务川岛浪速用他的双目之镜，绘出了中国人之像是：“一盘散沙，谁也没法把他们粘在一起。”胡适先生的哲学给中国人绘出的像是：“贫、弱、愚、私、散。”柏杨先生在其所著《丑陋的中国人》中绘出的中国人像是：只有“酱缸文化”，像酱缸里的蛆虫，只会“窝里斗”。假若看了这些画像，不下第二反的思考功夫，只能得出这样结论：中华民族天生就是劣等民族，受“高等民族”的压迫和剥削，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日本法西斯和西洋殖民主义者，都说：这样好一大片膏腴之地，不应该是劣等民族的居住场所。百余年来，他们接连不断欲对这“劣等民族”赶尽杀绝。

如果我们承认史密斯先生的结论是对的，那么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生长壮大，屹立于世界之上，还有什么根据呢？

难怪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早变殖民地，早现代化了。”他们以为香港的繁荣，东三省的工业，是帝国主义搞起来的，他们不知道：不论在香港还是在东三省，那点现代化，何处不是中国人的成堆白骨与殷殷红血铸造起来的。

近代史的著作，不论是中国人写的或外国人写的，许多人把中国人说得愚昧落后，一钱不值，把传教士说成是向中国输入现代文化的先驱。英国李约瑟先生根据大量的资料，肯定了中华民族对世界科学技术的伟大贡献，推翻了“太阳历”是中国人从西洋学来的说法，他嘲笑了南怀仁 1687 年写的介绍中国天文学的书，他说：“耶苏金传教士这种妄以自己的天文知识优越而自负的做法，现在从历史事实的真相看来，简直是颠倒是非”（《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 497 页）。

中国人，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具有崇高人格和圣洁的良知的。我们有“知过必改”、“闻过则喜”的品德，我们有“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果行育德”，“率性遵道”的良知。我们世代代在“扬长避短”中行进；我们经历过无数挫折与失败，总结了经验教训，把错误与挫折变为人生胜利的先导。

我们要前进，就要学习，向中国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向全人类学习，向成功的经验学习，向失败的教训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从反面教员那里学得的东西，可能更生动、更具体、更醒神。蒋介石说：“不灭共党，死不瞑目。”杜勒斯说：“寄希望第三代第四代，取得和平演变的胜利。”尼克松说：要用和平演变之法，取得“不战而胜”……他们都是好老师，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丢掉对敌人的幻想，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奋勇前进。中国人的人格与良知在此，而不在史密斯先生的评估里。

没法查的无底洞

1997年7月29日,《楚天都市报》报道“夏利换神龙,除车款外,多交2000至8000元。”其出租车公司经理说:“打点费是个无底洞,21个证涉及到11个管理部,层层要钱。”

我家从河北来了几位客人,他们坐了一辆车。我问他们:“现在不花买路钱了吧?”他们笑了:“到处是伸手牌!而且是铁手,能不给么?”

我的侄子种了几亩承包地,他说一亩负担300多元;我问他:“都是什么钱?”他说:“谁知道是什么钱?反正来要就得给。”“不给行不?”“那不行!你知道啥时给你穿小鞋?”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经学家的解说很多,不必谈了,我用杜撰的通俗解法,认为可能说的是“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并不是真正的道。”反面的意思是:光说不练,天桥的把式,不能变为实际。中央一再指示,减免农民负担的红头文件已发了60多个,传达会议不知开了多少。为什么这多“关”仍打不开。

用木门或铁门设关口,此门好开;还有无形之门,那是心门,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公”的钥匙,是开不了的。

我们应该订规章制度,但最重要的还是狠抓打开心门的钥匙。

佛不在西方,佛在心中;念经不能成佛,洗心自然成佛。“政治思想工作只许加强,不许削弱!”“党风廉政建设只许加强,

不许削弱！”这都是对的，然而，不从我做起，不从具体工作做起，口头上的孝子，其双亲还是要饿死的。

大山、小山，摆在面前，谁都看得见，愿上帝帮助我们，团结起来，跟着愚公搬腐败之山。

加强广告管理

1997年8月13日《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市的广告“十分凌乱”，广告公司有100多家，没一部地方广告管理法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广告应该如实地介绍商品，其位置也应当适当有序，应当色调和谐；在一个城市的规划中应把广告设置列入，并应立法。

现在城市的压力很多：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噪音污染，广告污染，交通污染，垃圾污染，吸毒污染，建筑物杂乱无章，绿化地减损，市场上伪劣假商品，黄色书刊、音像，淫秽场所暗藏，个别菜市场上的蛮横（卖肉不卖半斤，买一斤给二斤；卖葱必须卖四元一捆……）等，中央和省市都在整顿，必然日见其好。还应当冷静地考虑：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清源才好正本。不然，很可能事倍功半，或此伏彼起。

这篇文章实在好

199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载文《欲×之罪，何患无词》，批判了旧社会老吏判案浪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或“查无实据，事出有因”，颠倒黑白；也批判了失窃3万元的失主，报案之后，被罚6万元，理由是有碍安全评比。

这篇文章实在好！好在哪里？

好在它告诉我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事不是自存的，是取决于执法的人的。7月2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广西马山县委书记带头花300余万元修豪华办公楼，买外国汽车，受到纪委检查，因为他不顾县民的贫困自谋奢侈享受。这当然是应该检查处理的。中国有句俗话：“小巫见大巫”。马山县委书记的奢侈，花了300多万，比起花亿万元盖办公楼或其他享受的，恐怕也就是小巫与大巫之比而已。小巫应受检查；那么，大巫该如何处理？

还有，“去了不应该去的地方”也应进一解。大人辖区竟容许有“不应该去的地方”，而且自己知道，竟敢去，这与“明知故犯”是否有别？大人被拘留之后，以“没有做不应该做的事”解脱，说得通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样事实面前，最高明的律师能解得明么？这些事例中的犯法者与执法者到底谁是法盲？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哪位科学家能发明一架使法律能自动落实的机械，那将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我坚信，这种机械是不会出现的，也不会容许它出现的。其原因，不说可以自明。

政绩不是股本

1997年7月30日《人民日报》载文《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求“出政绩要把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出发点”。这话很对。

政绩不是投资，不是入股，千万不能与“分红”（即称量政绩好升官）联系起来。

只要把“为人民服务”与升官联系起来，必然带来日日苦闷：“当科长已经五年了，没有功劳有苦劳，怎么还不给我升一级？”“××的政绩并不比我强，都升上去了，我哪点比他差？”……这种思绪膨胀起来，必然努力做“显绩”，不愿做“潜绩”；为了把“显绩”尽可能高地显露出来，便任意舞动不会说话的数字，比如“一个50万人的县，一下子创出30亿产值”，一下子就可以扬名，为之垒个升官的台阶，至于“发不出工资和医疗费”就不管了。也有创“潜绩”化“显绩”的，比如扛着个大学文凭，到大山里住几年，请哥儿们来一篇“扎根深山，苦战×年，旧貌换新颜”的报道，剪下来送上高门，大人一高兴，不一定去亲自踏看，便决定表扬，也是有的。

为自己制造“显绩”或“潜绩”的办法很多，只要你把“政绩”与“升官”联在一起想，什么妙招都会创造出来的。

不经过人民严格检验并得到人民认可的“政绩”之不可靠和危险性，是值得注意的。

心硬手才硬

毛主席处理过犯了罪的老红军黄克功，也处理过犯了罪的老红军肖家璧，解放后处理过刘青山和张子善。刘青山、张子善是老党员，贪污了几千元，又乱搞女人，黄敬同志曾请求适当宽大处理，给他们留一条命，毛主席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说：“杀了他二人，可以挽救几千干部！”

毛主席的话硬、手硬，并不是残酷无情，而是他维护党的纯洁性的心硬，他以身作则的行硬，才产生了他的手硬。可见在是非面前的软或硬，其力量首先不源于手，而是源于心的纯正。爱党、爱民、爱社会主义的纯正之心，是维护社会主义法治之根本。

请想一想

1997年8月2日《楚天都市报》报道了武昌某娱乐城的舞女歌女穿着三点式泳装，极尽挑逗风情，男歌手足踏脚踢，极尽疯狂邪态，兴致高潮一来，男女拥抱乱蹦乱跳……

这算什么娱乐，情趣？这算什么文化？

小时候，看和尚做水陆道场上的画，十殿阎罗王对于“奸、盗、淫、邪”的惩办是严厉的。后来，看地方戏《胡迪骂阎》才知道：因为胡迪秀才看到岳飞冤死风波亭，骂起了阎王昏聩无道。我才晓得阎王爷并非遇事公道的。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反差性的强烈记忆：阎王殿前有一副对联：

上联：善报，恶报，迟报，早报，终须有报。

下联：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谓无知。

横披：正要拿你。

《楚天都市报》记者们报道过所谓“发廊”的内幕，武昌车站附近的拉郎“公司”，今天又报道了某娱乐城的“特写娱乐”，不禁吃惊：难道这真是天不知，地不知，子不知，我不知？知而不打，又是为何？

难道这种狂歌乱舞竟不能“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我们怎么能容许连资本主义社会都鄙弃的文化垃圾肆意妄为？它给社会主义精神世界造成多大的损害？！

坚决保护民族工业

《华商日报》报道：中国将按国际惯例采取措施保护民族工业。这本是应该的。可是有人说：生产全球化，保护民族工业，就是“国家主义”。这位论者可能是没有国籍的人。

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要买走荣家在上海的几个申新纱厂，曾激起过全国人民的反对浪潮。茅盾写的《子夜》，也是反映了吴家那点民族工业的艰苦苦斗。

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及其技术是可以的，引进控股外资就应好好考虑。按国际惯例控股占51%，外国人就取得了对企业的人权、财权、管理权的全权，实质上就是把这种合资企业由外国人全权处理，首先以为外资盈利为目的。中国有十大啤酒厂，只剩下青岛啤酒厂等一两家，其余都成了外资控股啤酒厂；美国百威啤酒集团控制的啤酒厂，打出“百威”的旗号，降价倾销，明言要打垮中国啤酒。保定胶卷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起的工厂，它供应了中国军用胶卷，它的胶卷质量并不比柯达低，柯达胶卷集团极力想用控股投资把这家工厂抓过去。

难道我们不应该想一想：外国资本家是怎样处心积虑要抓走民族工业，搞垮民族工业的。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独立的科学技术的生产体系，如果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在国际市场上是不可能有竞争能力的，或者说重一点，是不可能摆脱泡沫经济状态的。

美、英、德、日、法、意各国都有自己的汽车技术生产体系，都在国际汽车竞销中占有一定份额。韩国汽车质量不如日

本、德国，但在世界汽车市场的产销量占第五位，也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科学技术生产体系。

从国防上看，更是如此。

英、法、美、俄的国防产品各有自己独立的科学技术生产体系，就连战后的日本与德国的全部国防装备，也都是完整的独立的科学技术生产体系。谁都知道：到了战时，依靠买别人的武器是不可能强大可靠的国防的。

为了经济上保持并不断发展我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为了保持并不断发展我们国防力量，必须保有并不断发展民族工业的各门类的独立科学技术生产体系。这是平时与战时的共同需要。

我们必须以史为鉴，以别国的现实为鉴。

警惕“团结”的变质

1997年8月21日《长江日报》载文《变质的团结》，说是安徽省的“明光窝”的43名党政干部全都因贪污受到重处；坐在牢里的原市长叹曰：“这都是因为我们太团结了，如果有点矛盾，也不至于一个班子全给端掉。”他像是从另一个角度总结了经验。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从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律。孔子说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仍是说的这种关系，只不过孔子的意思是：君子能与多数人团结，小人光会划小圈子。划大圈子，与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就要以人民之心为心，惟人民之利益是从，为人民不惜奉献一切。

但是社会上也从来就有为小圈子谋私利而结合在一起的。荆州市的大诈骗案，就是银行内部的人与骗子勾结进行诈骗，谋取私利。

警惕“腐而不败”

1997年《瞭望》上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些地方和单位，个别巨贪者虽罪恶累累，却能稳坐钓鱼船，有的甚至青云直上，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腐而不败”。

《腐而不败》说明“腐者”与“护腐者”的相互为用又彼此受益的关系。对此应出重拳处理，才不负于人民的期望。

《也是打白条》一画，点明了“腐而不败”的根本原因。

俗语说“雷声大，雨点小”，指的是轻描淡写的把某事处理一下，实际是做个样子骗弄群众。

欲语又说“干打雷，不下雨”，指的是口号喊得响而不以行动兑现。这骗人勾当，更甚于前一种。

事情颇像一篓螃蟹，你扯着我，我扯着他，甲之罪出自甲而植根于乙，反观乙，亦然。

俗语说“斩草要除根”。草根蔓延甚广，根系太多，常常与“嘉禾”之根搅在一起，处理难免不遇到“投鼠忌器”之难。

人常说“法大于权”，看到的又常有“权大于法”的事例。人们不免困惑起来，连执法机关有时也要叹气。包拯的“先打官司后上朝”的例子，只在舞台上，那是人民的希望，艺术家的创作，正史里并没有这样的包拯。

看来，还是荀子说得对：“法不能自立，类不能独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关键在于党，把党建设好，党员能模范地守法，执法，可致天下太平。

怎样使“都市边缘人”安心

1997年10月17日《楚天都市报》载文《我要离开这座城市》，说的是一位久居此城的人的遭遇，使他心灰意冷，决心离此而去。

用有文化的人，要把文化低的人挤走；用农村来的廉价劳动力，要把原在城市工作的人挤走；用自己的亲朋好友，要把生人挤走；用年轻的人，要把年岁大些的人挤走……手握法人代表权的人，这样做并不违法，可是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被挤下去的人怎么办？再创新业固然可以，有那多的新业向他们招手么？一个是，农村有大约几千万廉价劳动力，陆续向城市迁移，城市流动人口大增（广东沿海城市，外地打工者都超过了城市在册人口）。这个冲击波不但造成秩序混乱，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有害工农联盟。

这就不能不引出一个“怎么办”？

《楚天都市报》辟专栏讨论“边缘人”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智慧，看来是很有意义的举措。

都应讲“师德”

1997年10月4日《楚天都市报》报道上海戏剧学院17位教师提出“敬业爱生，教书育人”的倡议，这是很重要的倡议。

办学校，为的是培养“四有”人才；要学生以“四有”为人生之本，老师首先应以“四有”为本。

“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两说都不对。人之初，性如白纸，画黄则黄，画黑则黑。人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受教育，老师是一个重要方面。老师肩负着养德育才的责任。

老师的模范作用应表现在：为学勤敏，为道端行。学校就会有尊师爱徒、教学相长之风，其学也日进，其乐也融融。

然而这是很难做到的。

学校经费不足迫使老师去创收，除授课之外，又经商，商以逐利为本，学生便学着一切向钱看，学着下海了。微薄的薪水，与奢侈的世风相矛盾，开门七件事也常使老师焦心，有人耐不住，便兼营他业，以补生活之艰难；于是为师者耐不住“寂寞”与“清贫”，不肯做学问，荒于授课，这种情况也不鲜见。

树立“师德”，不容苟且。在权、钱、色面前，要你抉择：或做中流砥柱，或做顺水飘蓬；前者可以保住人格和人生价值，后者只能做权、钱、色的奴隶。

这，只有有“舍身求法”志气，有“磨而不磷”骨气的人，才能做到。

抓好党建是社会主义企业的重中之重

1997年8月13日《湖北日报》报道沙隆达集团公司的经验：无论企业改什么制，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沙隆达集团公司狠抓党建搞好国营企业的经验。

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国有企业，也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两种企业都是公有制。资本主义国家的铁路，以及某些赢利不多又为国家必须直接掌握的企业，都是国有的，但其股票或债券却掌握在私人手里，国家要从财政收入中拨款付息，满足私人资本得利。资本主义的垄断财团，要从他们的资本构成的组合来说，几乎都是集体所有，因为每个财团的股票和债券都是股东们的资本构成的，使他们的产业体系是由直属产业、合同协作产业，以及其他松散形式结合在一起的产业构成的。比如丰田汽车是三井系统的直属产业，东芝则是与三井在合同约束下的协作产业。各大财团迄今还是运用托拉斯、辛的卡、卡特尔等几种形式组合在一起的，真正的最高产业指挥机关则是各大财团支配的银行。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化的现代化的大生产，不论从技术到一切操作，都是职工所做，人民完全有可能依靠自己创造美好幸福的世界。条件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人民当家作主，就可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混为一谈。

社会主义的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其真正的产权主人是人民。我们的董事长、经理、厂长和政府的官员一样，都是人民的公仆。在法律条文上你是产业的法人代表，但你是社会主义的法人代表，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法人代表。资本主义的法人代表是产权的主人，他有权使企业尽一切可能去剥削职工，剥削消费者，尽可能多地牟取超额利润。

社会主义的法人代表，是人民的产权代表，人民赋予他领导好企业的重任，他的任务是：第一，遵循“以人为本”的哲学，与人民完全站在平等地位，关心人，关心社会主义大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最根本最不易学，又必须学的科学管理。焦裕禄、孔繁森、李国安等为我们在这门科学留下了丰富的宝藏。第二，搞好生产，获取了大的利润，是为了扩大再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第三，以上讲的道理，许多人在口头上都能说得出口，道得明，但行动起来落个空。这需从个人学习改造中去努力，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党组织的作用”。

连圣人在内，谁都有七情六欲。党提倡“大公无私”，就是因为人皆“有私”，连孔夫子都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战士，真正按党章办事，既要个人的努力，又要党的坚强领导。只要党组织按党章要求每个党员，党风正，社会风也会自正。我们要学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党建设好。

沙隆达集团公司抓好党建的经验，其重要性在此。

“死驴”是可以复活的

1997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不可让“死驴”复活》，批评高利贷在社会中死灰复燃，正是刘文彩的“驴打滚”的死驴复活，必须制止，以免人民受害。

“驴打滚”是放高利贷进行残酷剥削的形容词，驴打滚与猪、羊、狗或马不一样，一翻就是180度，人们便把这个形象用来比喻放高利贷了。

刘文彩死了又“复活”，正如文中所说“死驴竟然在某地复活了。”它以办“上交统筹款”、“集资办企业”的形式复活了。其实借尸还魂的形式还多着呢，编辑起来可以成为一厚本“死驴复活大辞典”。试增补数例：

办信用社，可以少量资本注册，以低利吸收大量储蓄金，以高利贷出；可以本社资金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另立新公司，新公司又以抵押名义向银行贷款再立新公司，公司因此生生不已，到最末一家宣布破产时，一大批贷款就成了国家银行的死账，只是填满了私人腰包。

与国家银行的某些人内外勾结，以假章为担保，骗取国家贷款。

得知×股票明日上涨，或调股票明日上市，上市价很高，挪用公款今日购入，明日抛出，晚上把公款复原，自己发横财。

在期货市场上，一女数嫁，得多笔预付款，再一跑了事。
与造伪劣假货者合作渔利。

索高价，做假广告。

为得大回扣，为公家大购伪劣假商品。

卖官鬻爵，卖户口，卖税款单，卖“名牌”……

以办校为名，行渔利之实。

以高回扣招徕公车修理。

低估国有资产出卖，从中牟取暴利；高估外商设备，捞取好处。

不送礼，不请客，不给盖图章，把公章做为商品出卖。

用国家规定价格，把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商品，卖给关系户，共同分利。

投标招标，弄虚做假，使关系户得标，从中捞利。

总之，在钱、权、色的交易中，花样之多，虽诸葛复生，鬼谷再世，亦不能穷其技。

庄子说：“盗亦有道”；其道无穷。果然不差。

反贪要长打不懈，正心更要大力施行。心中无国，心中无民，享受至上而不畏死，法亦无用。立德，立法之本；建党，立社会主义之德之本。

曹雪芹答翰端先生书

翰端先生雅鉴：

欣得嘉简，发聩震聩，感高明之洞察，叹鄙薄之昏蒙；何逢高雅之如林，竟失珠玉于交臂；敬聆明示，敢不若乾乾！遂极远镜之仰观，尽微镜之近取，乃得万里桥边薛涛之流艳风华，西子湖畔小妹之同心情结，更听王婆十光之学，也索西门房中之术。惭颜之余，深愧落后于时代，不知开拓而解放。午夜反侧，欲改十年手成之卷；感发灵台，绝扫腐朽积淀之败。于是洋洋洒洒，满纸蜀锦竞艳，实琳琅之满目，惊北斗之星。已矣，惬矣，怡情如水，郁郁丰隆，致止而空，空而入静；不知空之为相，相之为空也。无声之处，忽来沉雷，百窍悚乱，文页翻飞。咿！护法来临也。降魔杵高压，豪客喋血，淫鬼粉身；一刹时，天昏地暗，鬼哭狼嚎。正惊魂未定，忽韦陀金身挺立，万道金光，玉宇澄清，万民合十，齐颂神功。其颂曰：今日欢呼韦陀圣，只缘妖魔又重来。韦陀奋起降魔杵，玉宇澄清万里埃。

警醒之余，智慧有增，知红楼可改为大厦，武功未许肆为暴力，爱情岂容宣泄。翰端先生之雅教，正宜以人间雅意发广于文彩。庶几其可乎？

敬颂

时祺

亡人曹雪芹

1997年9月10日

编一部《导演大辞典》，如何

我很想编一部《导演大辞典》，我相信这桩生意可以赚钱。

池北偶的诗和丁聪的画，言简意长。从《少林小子》在国内首创武打片之后，武打的创新便层出不穷，如今的武打已是综合拳脚、神剑、枪炮和神术为一体了，比《七侠五义》等等旧武侠小说，比《火烧红莲寺》高多了。中华儿女是善于创新的。

掌握了这二十六行要诀和“按尺讨价”的考语之精神，如果你还不能写出几十集的剧本或不能当几十集剧本的导演，只能怨自己太笨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不是在讲“艺术为人民服务”，要“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的统一”么？只给一个“趣味性”，而且是“低级趣味性”，那就太对不起人民用血汗铸出的“包银”了吧？

“良心”已不值钱，人格、国格也掉了行市，作为一个中国人，讲点中国文化传统的优良品德，总是应该的吧！这不但有益于观众，而首先是有益于自己：不至于使自身掉到泥坑里去。不是么？

“三策”归一策

199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载文《戒贪三策》，从《醒世恒言》的薛录事梦中化鱼，见香饵知其为钩，禁不住香味的诱惑，还是吞了钩。评点者曰：“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悲夫！于是作者献出三策：一请学清朝汤斌的“抄文退屏”；二曰学清朝冯志沂的“闭目不见”；三曰学唐某县令的“洗心换眼”。

这三“策”是好的，其用意是十分善良的，不在党的领导与群众的监督下，又是很难有收效的。

七情六欲，连圣人都有。孔夫子都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又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并不是他“不为物感”，而是养成了“不为物累”的功夫。这种功夫是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集中体现，它从修养得来，但不是从“避世静修”中得来，而是从善与恶、美与丑、贪与廉，高尚与庸俗矛盾交融的现实生活中磨砺出来的。在这种磨砺中能站得稳，“**屎而不磷**”、“**缁而不染**”，是以正确思想为支柱的。“我亦爱吾生，我亦爱真理，所欲甚于生，舍生而取义。”无数先烈们忠贞不渝，就是这样做了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以共产主义信念为支柱的。

以共产主义为信念的战士是能够辨别何为贪，何为廉，何为荣，何为耻的。

保护包公是必要的

1997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载文《官法如炉刍议》，认为法如炉而火不旺，那炉也是无济于事的。

在京东蹦蹦戏里，戏词是：“官法如炉，人心似铁”；清官自报家门时每句加了三个字：“人心似铁真似铁，官法如炉却胜炉，”可见当清官的人就得敢烧旺火，不烧到摄氏1200度，铁是不会化溶的。

烧到这个温度的条件是：煤气足，鼓风好。所以，清官要有正气，《铡美案》里的包公，不是手托纱帽，刹住陈士美靠硬后台的威风，大喊“先打官司后上朝”么？有了这股正气，才能成为洛阳的“强项令”。

于今冒牌气功很多，道家的真气功是上、中、下丹田为炉的，以身内真气为料，以真气在身内的聚炼为金丹的；得金丹者可以“得道飞仙”。以辨“义”、“利”为本的孟子所倡“养吾浩然之气”，与孔子说的“杀身成仁”结合起来，却真地涵养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文天祥就义时在衣带上写着：“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以步董狐之路为荣。这种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荣传统，被共产党继承并发扬起来，便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对社会主义无私奉献”的精神。

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对炉扇火，未有不通红者。

但是，这种护炉扇火的人，也要有人保护他，不然，邪恶势力会背后插刀的，党要大力保护他们，不然，包公难得再世。

一篇醒世文

1997年12月19日《湖北日报》载文《东方不败术》说的
是有本事的人，曾“自成一家”，随他群众说什么，都能搪塞；
“不学有术”，对上对下都能应付；“善于说词”，任何题目，都
能侃他几小时。

这的确是一篇好文章，不深入生活写不出来。

我希望不要把它当作“道经”来看，要当做镜子来照。

可以照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样文章，应付差
事”的现实性与危害性。

可以照出：“会议未开，先作结论”、“走马观花，大作文
章”的廉价而物不美，当领导也容易。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曾说：“作书并不难。”他举起了手中
的粉笔：“比如这个，就可以写一本书：粉笔的原料，粉笔的
制法，粉笔的用途，粉笔对文化的贡献……十几个纲目一列，
然后一写，不就是一本书？”他又一扯身上的灰布长袍说：“不
写粉笔，写长袍，一样大有文章！”

我的这位老师，于此道颇有研究，可惜他没有当“首长”，
也没有机会进入写作班子。

正心重于正嘴

1998年1月6日《人民日报》载文《又见歪嘴和尚》，批评了乱投股份制、搞假股份制，说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

其实嘴歪了只是一种病态，歪了嘴的人不一定不念真经。关键还是在于是否“尊重群众意愿”，是否着眼于“使企业有活力”，“让群众得实惠”。最终还是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全心全意为国家，实事求是地走步子”为指导思想。

不但对股份制不能刮风，对“抓大放小”也不能刮风。不认真研究多种企业单位合组后，是否有益于相互支援，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加大竞争力，简单地加在一起，不是“拉郎配”，就是为了赶风头，“创成绩”，造升官之阶梯。在“放小”时，随便破产、出卖、租赁，不计国家利益之得失，也是不可取的。

关于这些问题，《人民日报》于一月五日发表了《目前企业集团发展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讲了许多情况和道理，给我们提了个醒，值得认真研读。

造福万代的壮举

《重庆日报》报道：从 1998 年到 2010 年全国要投资 700 多亿，要在三峡库区、四川西部、云南金沙江流域、黄河中游、青海黄河源头，以及宁夏、内蒙古和陕西，建设六大生态林。这的确是一大壮举。

人类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世界。随着文明的发展，增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同时也增加了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力量。现代化大生产的力量，每年破坏 1700 万公顷森林，水荒威胁着全世界；大批动植物失去了生存条件，阻滞了工业农业的发展，人类失掉了一个景物美观、空气清新、生息舒适的环境。

我国兴建六大生态林，是当今世界上的一大壮举，这 227 万公顷的森林，将为长江、黄河、珠江创造良好的水源，使这些水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交通、能源、灌溉、繁荣工农业和人文的作用；它将造福万代。

1998 年 2 月 6 日

与张教授持一个观点

1998年1月6日《楚天都市报》报道湖北大学张国光教授主张以鼓吹革命为导向，不以宣扬投降为导向，拍摄《水浒传》。

我是同意张国光教授的看法。但这种看法是否合乎时宜，就值得研究了。

我看120回《水浒》，看到蓼儿洼宋江毒死李逵时，又气又恨，连施耐庵我都骂了。当然这不是施耐庵的罪过，而是古往今来喜欢为汉奸、卖国贼、反人民的败类翻案之辈的毒招。

中央要我们“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江泽民同志号召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高潮。这是进入21世纪的至关重要的措施之一。

但是，“拒绝壮烈”、“告别革命”等从防空洞里冒出来的冷风，还在刮。有的“艺术家”直白地说搞艺术“就是为了生存”。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为了享受，为了吃好、穿好、住好、车子好、老婆好……”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的混混儿，丰盛的武打，一床一床的性解放，充斥于电视屏幕，赶不走，斩不断，令人无可奈何。

《水浒》的命运如何，才看个开头，不敢说。但是，把晁盖的“聚义厅”变成了“忠义堂”也可能注定了事情的结局。

有人说：艺术不是宣传，与政治无关。我请问：哪一位作者的作品不希望发表出去，不希望得到人们的赞赏？这个要求，就是想征服别人认同自己的观点——也就是你的政治呀！

你不反对“壮烈”，为什么要“拒绝壮烈”？你站在“超然”的花楼上，自然是反对那“不超然”的，你的“超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不超然”的现实了。

已经形成的迄今不悔的观点，总希望张国光和我的看法不落到被人放在“顽固”的位置上。

我也要去看望毛主席

1998年1月7日《湖北日报》报道：1998年1月6日毛主席纪念馆重新开馆的一天，不到8点，就有2000余人在寒风中站队等候瞻仰遗容。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老的有70岁、80岁，小的有十多岁，捧出堆不完的鲜花，发出不停的泣，有的老人说：“永远忘不了您的恩情。”

我保存着“四人帮”肆虐时，由新华通讯社编，由《人民日报》社出版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画册，共存图片50张。林彪叛逃后的第二天，专案工作组把印有林彪的六张抽走了，下余44张，都是毛主席照片，多半在别的书刊或报纸上刊出过，“五四”运动中在长沙主编《湘江评论》时的毛泽东，可能是许多人没有见过的。他年轻、沉凝、静谧、双目含光内蕴，一似包揽宇宙于咫尺之中。一身竹布长衫，清淡潇洒。另一张是1942年3月在延安作报告的照片，背后是黄土窑洞的干枯苍劲的泥土层，前边站着扳着手指说话的是身穿补钉棉衣的毛泽东。1942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用“三光政策”企图绞灭中国人民反抗的时刻；正是蒋介石用武装围困、经济封锁、特务捣乱的手段，企图“困死、饿死、剿死”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时刻。党中央面对这个现实，一方面号召全党全军“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一方面发动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参加了这个实践。毛泽东裤子上的两块大补钉，不是故意制造的装饰。连同他在解放后困难时期不吃肉，给我刻在心上的印记最

深。

我多次见过他，直到 1966 年 7 月 16 日，他最后一次横渡长江，我还陪伴了他。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看了他。

毛主席纪念堂建起后，我曾去看过他，进门，先看见他静静地坐着，再前进，看见他安详地仰卧着。他静如秋水，清似寒泉，气蕴长虹，神若稚子。尼赫鲁对他说原子弹厉害的不得了，毛泽东说：“顶多也不过把地球炸个大窟窿！”他尊重客观规律，知机善断；他迎着历史狂飚，猝然临之而不惊。有人说他“胸中自有百万兵”，其实他是手握大道，溉今裕后，虽万世不息。

江泽民同志号召大家掀起学习理论的高潮。这个高潮是历史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毛主席纪念堂修复后，开门一小时就有 5000 人排队，这不是数字的形象。这是人民向理论进军的誓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胜！21 世纪的光辉要由中国人民创造。

毛主席！您想人民之想，人民想您之所想，此想永不绝，历万古而绵长。您，安息吧！

不能丢弃的武器

1997年10月26日《长江日报》载文《批评自我批评，何以失效》，批评了不该把这个优良传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在大量文告中，很少提起党的“三大作风”了。这应不是撰稿人的“疏忽”。

“批评，自我批评”是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党内、人民内部民主的实质，也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保障。

放弃或抵制“批评、自我批评”的人，归根到底是以维护私利为内涵的，推拖的办法是：“情况良好”，“没有时间”，即认为没有搞“批评、自我批评”的必要。

他断章取义。用小平同志说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为挡箭牌，抵制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允许别人提出批评，只许他们胡言乱语。小平同志这句话丝毫没有不要“批评、自我批评”或把“批评、自我批评”做为“争论”看待的意思。他的话是从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说起的，“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很明显，“不争论”是小平同志在推行三中全会决议过程中采取的正确方法，容许觉悟有先后，因势利导，不搞强迫。但‘不争论’绝不等于不要批评、自我批评。

我们党从来不主张做无原则的争论。但在原则问题上必须争论的，小平同志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多次明确指示了的。1989年“六·四”事件中，“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的‘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页）“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9页）“把展开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7页）“有些人在搞煽动，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8页）

可以肯定：小平同志是主张对错误的东西进行批评的，对原则问题要争出个是与非的，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才有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丢弃批评、自我批评，或曲解它，正是不学习与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结果。可不慎哉！

创造“声闻于天”的条件

199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载文《打的赴会》，说的是一路上听了“的士”司机的谈话和建议，内容丰富中肯，满有意思。

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都是“政治家”，这话差不离。我也在北京“打的”过，司机跟我边行边聊，国内国外、无所不谈，内容丰富，饶有风趣，最重要的是有许多事是闻所未闻的。

这位与范敬宜先生同行的司机谈的也很好。

古有采风之说，虽街谈巷议，其有补于为政者，皆所采集。

听取民众之声，要给民众“声闻于天”的条件。调查研究是重要的，但使民众之声能随时流入官府深宅，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与人民之间，垒起无形之墙是不少的：人民代表大会在开会，人民不能接近会场，便是一例。类似这种情况，是不言可知的。

法，是要立的，应以保民和便民为本，而便民又是保民的不可少的条件。人民的声音阻于高墙之外，是与全心为人民不可调和的。

我愿咱们大家都考虑这位司机的话外之音。

“垃圾”要天天扫

1996年9月5日《中华老年报》报道：《“文化垃圾”当清理》，指出北京、成都、杭州、厦门等地的“文化垃圾”如“春宫”、“二房”、“大地主”、“帝国”、“黑手党”等招牌字样，旅游点上有卖日本军帽的……违背了“讲政治”的原则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 求。

看了《“文化垃圾”当清理》这篇报道，咱们大家都应当冷静地思考：什么叫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应当怎样去弘扬？扫黄是必要的，立中国人民的民族德性，可能是更重要的。

是人，都要有人性，有个正确思想指导自己做人，使自己区别于一般动物，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我们是中国人，有着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丰富的优秀品德，支撑着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继承这些，做一个真正中国人。近代史中，涌现了一批高举马列主义旗帜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勇士，他们绘出中华文明史上更高一层的光辉，我们应当跟着他们的脚步，接力举起马列主义旗帜，做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人，在已有基础上，创造更光辉的中华文化。

拾垃圾以“自肥”，是错误的；散发垃圾是危害祖宗，殃及子孙的罪行，可不慎哉！

读《“小偷尿裤”与“贪官惊魂”》有感

“小偷尿裤”的事是有的，但“大偷”不尿裤。三十年代，北京有名的惯偷燕子李三，据说能飞檐走壁，穿窗入室，说他有“缩骨术”，戴手铐、脚镣，也能把它脱掉。他被抓进了北京公安局的牢房，北京市内仍连续出现大失盗事件，都说是燕子李三脱去手铐脚镣，飞出牢房干的。后来，一大官失盗，力逼公安局长向燕子李三查问，不一日，便把盗走的赃物找回来了。大官怒气不休，亲自提审燕子李三。要他当场表演“缩骨术”。李三哪能脱掉手铐脚镣呢。为了少吃苦头，李三说了实话：“我是跟局里合作的。他们给我解刑具，放我去偷，偷来东西，大家分肥。”

李三，大可不必尿裤。

“贪官”其实也不一定都“惊魂”，我指的是“大贪官”。“大贪官”都守着一本经。经文第一页写的是“树大招风”；一念这四个字，就会知道：贪污多了要出麻烦的。经文的第二页上写着“本固枝荣”。

大贪官都懂得“捞一百散五十”的诀窍。

“官，不打送礼的”，是习惯的说法，并不完全对。不懂送礼诀窍的傻瓜，当着众人之面送“红包”或宝石、金饰之类，常常被顶了回来。会送礼的，常走闺门之路、子孙之路，或其他隐而不显的路子，自然上边有伞，下边有根，四旁有网，何必“惊魂”？

大贪污犯是难以抓起来的。在特殊情况下，也有抓起来

的，但多是以判官请宴，阎王避席的方式处理：有的判了死罪，一个“坦白较好，有悔过心”的借口，便“死缓”了；有的判了“无期徒刑”，一个“保外就医”也就一了百了。判官之软笔，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怕“大贪”的叫阵：“我有罪，我要求公开审判，要求当众讲出我犯罪的始末情由……”

“大贪”不但不惊魂，而且敢于发出无耻的威胁。

一个人不以卖身、败俗为耻，什么法对他也无用。

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首先是以社会公德为支柱的；在此基础上立法，才会得到大众的自觉奉行，对少数败类才有强制之效。

1998年3月8日

古已有之的“新鲜事”

1998年3月9日《湖北日报》载文《抢官太太小议》。说是湖南等多处有随着县长、局长、行长……到任之后，抢着把“太太”以及其七大姑、八大姨等调来工作，指出此中之奥妙：“抢者之意不在太太本身，而在她们身后的。”其意甚明。

古已有之的“新鲜事”

吕不韦要把寄居在赵国的公子楚（秦始皇的父亲）买个太子位。买通了华阳夫人为后台，使子楚得承秦家皇位。吕不韦送给子楚的已怀孕的赵姬生了秦始皇，便夺了秦朝的大统。这是古代一桩“抢官太太、贩卖人口”的案件。至于抢“衙内”、“小姐”、“小星”与大官关系密切的交际花、秘书、侍卫官、司机等，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披露得不少了。

“抢官太太”的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旧作再版而已。

不少犯傻的经济学家，以为世界上有与政治割裂的经济学，苦苦钻研一生，也只能是个书呆子。

用钱买一个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的信息；用钱买通一个国营企业的厂长或经理，把国家资产低估后买过来，或用不可靠的保证贷得大批资金……都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于是，这门“抢官太太”的哲学，便烧昏了的人们的头脑。

“政无亲情”的话，可以有两种解法：一种为政者亲刚正廉明，忠于社会主义大业的人。如此，国家必然兴旺。一种是

亲个人之亲信，亲七大姑、八大姨、哥儿们、姐儿们，这样的亲法，其结果可想而知。

心无挂碍天地宽

199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载文《相声和小品缘何衰落》，指出由于“思想内容深度不够”，“幽默技巧强度不够”，“表演技巧高度不够”。

文章说的三个“度”不错，说实在话，我常常感到看现在的小品和相声，还不如看广告来劲。你看为步步高VCD出场的那位刀客，不是十足的少林气派？你看为娃哈哈AD钙奶出场的哄哄孩子群；你看为仰韶酒做广告的那位先生，吞音吐字颇具音乐性，动作表情适度，比起那些狂喊乱叫出洋相的相声，能说不如么？

相声为什么从侯宝林、郭启儒、马三立、郭天宝、刘宝瑞、常保堃等辈的艺术高峰上下滑或衰落？

文章说的三个“度”，是衰落之果，不是衰落之因。

王安石写过一篇短文《伤仲永》。王安石感伤的是：仲永不努力与失教。艺术学校训练出许多好苗子。苗子是生长壮大大开花结实的本源。自己不努力向上，又得不到适当的浇灌，好苗子也不得不夭折，与草木同朽，与污泥浊水相伴。这样的事，我们见到的不少了。

一旦“能捞钱、捞钱多、就是好”成为人生哲学时，艺术不成为金钱的奴隶，不产生怪胎，也就不可能了。

以这样哲学为指导，“艺术”的走向，当然要适应庸俗低级趣味的需要，走这条路是不费力气的。而走“二为”方针指导之路，是要付出一生艰苦努力的。我说是一生，不是半生，

半生就是夭折。梅兰芳先生一生做出了这样的努力。为了《洛神》一剧中的“杂沓湘灵”的“沓”字，他反复地向别人请教；为了《霸王别姬》的剑舞，他也向多人请教；不但许氏兄弟是他终生的助手与师友，他还向湘剧、秦腔、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的朋友求教；为了练眼珠滚动的表情，他把看鸽子飞翔当作必修课。他对剧情的每个细节，总是反复琢磨，以艺演情，不是以技哗众。侯宝林先生虽然是捡煤核的孩子出身，没有文化根底，但他毕竟自学了文化，收集了很多“笑话”书籍，结交了许多对表演艺术史及表演艺术有研究的朋友。他的创作，也是集体反复锤炼出来的作品。他的表演艺术是全能的：咬字清晰，发音高下宽窄强弱适度，动作巧妙而不古怪，夸张有力而不过分。一个段子说下来，节奏分明，感染力强，表演起来游刃有余。没有一生的琢磨，不可能这样炉火纯青。

艺术家，从金链子哲学里解脱出来。心无挂碍天地宽。

1998年4月3日

保住清白好奉献

1998年3月11日《中华老年报》报道反腐倡廉协会筹委会座谈反腐倡廉。

反腐倡廉协会筹委会认为“反腐倡廉已到了非抓不可，不抓就要亡党亡国的地步，”这是用重锤敲响了警钟。

座谈会提出可以从三方面做起，第一就是从自身做起，这是非常重要的。

老同志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住自身清白。这是自助助人的根本条件。但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官不期富而富自至，因为官有权可卖，便有人出钱买权。当官在位，把滚进门里的元宝踢出多不容易。好些人为此卖掉了一身清白，落个可耻的下场，当官在位的应惕砺自律，这是不言自明的。

无职无权的老同志的门前，是否也有滚来元宝的机会？有的！老同志的“德高望重”招牌也是可以卖钱的，有人愿意出钱买这块牌子，作为撞骗营利的本钱。有的老同志就是这样出卖了一身清白，出卖了数十年流血牺牲得来的荣誉，滚到了污泥潭里与蛆虫为伍。

如果连老同志都成了腐败者流，中青年还有什么希望？这个“老”字，有着黄金样的光彩，有着万钧重的责任啊！

老同志能抵御腐败风的袭击，并立于不败之地，就是重大的贡献。

1998年4月19日

法国香水的奥秘

1997年8月6日《湖北日报》报道随州市培植银杏树已成规模，年创收8000万元，正向着每人有10棵银杏树的目标发展。

湖北从东到西的北部地带，都适合银杏的生长，银杏可以成为致富的重要资源。

搞农、工、贸的统一产业化，要狠抓农产品的加工与推销。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产值中，产品原料值不过20%左右，产品加工值在80%左右。我们加工农产品值迄今还不过16%左右。这是农民收入低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农产品加工，多数是低级加工。

为什么不能产出高级加工的农产品？因为我们没有高级机械设备，有葡萄也生产不出法国香槟或“路易十三”那样的高级葡萄加工品。

发达国家已有可供学习的经验：农民向加工厂出售原料，有长期的保护价，到时把原料按价（比保护价高时，按高价出售给加工厂）卖给加工厂，加工厂不得拒收；加工之后，所得利润返还农民（按出原料品多少比例分配）30%—40%。农户与加工厂形成一个合同关系。

法国的香水，独霸世界市场，其原料花出自全国花农，经过几次深加工，才产出优质香水。银杏的加工业，也应该像这样组织，使农民致大富。

1998年8月14日

立德治内伤

鄢烈山先生这篇文章，又是一篇为呼吁重视教育与老师的警示文。他悲叹教师的实际地位的下降，并未因《教育法》、《教师法》的公布而改善，当教师并未成为知识分子就业的热门，人们羡慕的是“老板”称号。这种情况不加以改变，所谓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文化素质，都会落空。

这篇文章于立法之外，提出了需要改变社会风气，才能落实“法”与“号召”的意见。所引某法律专家的看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当今社会现有秩序尚不具有潜移默化的教化力量，或社会本身的秩序形成的是与正式法律相悖的另一种教化、养成的是另一种习性……即使运用了更大的国家强制力，法律也仍然会受到抵制，无法真正进入社会，而往往是停在字句上。”

其实，这并不是创新的见解，中国有名的法家商鞅，立法的原则是：“导之以德，齐之以法。”管子的原则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道德是社会意识的综合体现，又是维系特定社会存在的支柱，伤风败德的社会，是不能存在的。荀子说：“法不能自主，类不能独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最为确切。

1998年10月2日

圆梦（缀《聊斋》）

年纪 40 多岁，拥有名牌大学文凭，已有 20 余年工作阅历，虽未受大奖，也未出大过，还坐在副科长位子上，实在成了一大压力。

眼看许多同事们，有的当了处长，有的爬上了厅局级，这位副科长实在心气不顺。脑子里不分日夜地转悠着一个念头：“我哪点不如他们？”

他饮食乏味，神情倦怠，抬不起头，眼皮发涩。

“你这是犯了么病啊？”

妻子问他，他只是摇头。

“不说你也知道，说了你也解决不了！”

一天夜半，副科长蓦地从床上跃起，猛拍还在睡的妻子一巴掌。

“嘿！醒醒！”

“发什么神经病啊？”

“我连做了 3 个梦！”

“做 10 个有什么用？还不是竹篮打水！睡觉！”

“你妈啥时来？我想请她给圆圆梦，问个吉凶。你妈不是在这方面学问大么？”

“她，不会圆梦，只会破梦！”

妻子的嗓音特大，为的堵往副科长的罗嗦劲。

这嗓音惊醒了住在隔壁好管闲事的妻妹。她披着衣服闯了进来。

“要圆梦，我也会，说不定比妈还强呢！”

“那你就说给她听听。”妻子发了令。

副科长对妻妹说了第一个梦。

“我梦见下大雨，身上穿着雨衣，手里还打着一把伞。你看这是么兆头？”

妻妹不假思索地道：

“多此一举！说第二个！”

“我梦见墙头上长出一棵树。”

“根底太浅！说第三个！”

“我梦见……”副科长有点扭怩，带点羞涩：“我梦见睡在你的床底下！”

“痴心妄想！哼……”

妻妹扭头走了。

天也亮了。副科长带着一身晦气向门外走，想找点新鲜空气吸吸。正好与岳母撞了个满怀。

“这么早出去干什么？”

“想请你老给圆梦。”

“好办！你说。”

副科长说了第一个梦，岳母响亮地回答：“好！双保险！”

副科长又说了第二个梦。岳母伸出个大拇指：“高出人上好！”

副科长赶忙说了第三个梦。岳母拍掌大笑：“抓住机遇，该上就上！”

副科长赶忙给岳母端茶。

1998年10月16日

捍卫科学的勇士

1998年9月11日，司马南先生在《长江日报》上再向“大师”们叫板，悬赏百万元“奖特异功能”。

司马南先生已出过书，用事实揭开了许多“大师”们的装神弄鬼的谜底。也有人反驳他，但拿不出实证来。那些说“气功”能治癌，发功可以使小麦增产的“大师”们，拿不出一件经过科学检验的成果。至于“特异功能”，也一样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实际。炒家们都以“前科学”为牌，掩护其虚伪欺诈。

“前科学”的事物是大量的客观存在。在人们眼里，好像科学已经发达到了不得了的程度，其实，任何科学界定也经不住问三个“为什么”的考验。水是什么构成的？答曰：由氢二氧一化合而成。氢二氧一化合成水，为什么不成为石头或其他？连爱因斯坦恐怕也答不出来。三个“为什么”外的问题，都是有待无限代以后的人去解决的“前科学”。“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是客观规律。事物的发展无止境，科学家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也无止境，这是追逐“前科学”的永恒任务。

发功可以去痣，发功可以取瓶中之药，发功后眼皮可以挑起两桶水，发功能控制导弹飞行，在广州发功可以使北京电灯熄灭，这类骗术，只能把人类追求真理的努力引向迷途。

司马南先生的努力，是中华民族传之久远的“我亦爱吾生，我亦爱真理，所欲甚于生，舍生而取义”的宝贵精神。

司马南先生之以“悬赏”百万与“自焚”向大师“叫板”，

不过是出于激情而已，实践起来，还是应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家共同向真理低头，不须个人之间的低头。

拍板叫阵谁敢来

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报道：詹姆斯·兰迪魔术大师悬赏100万美元挑战通灵人。与司马南先生一样不信邪说。

通灵大师们，兰迪先生的奖金比司马南先生的奖金高了八倍呀！快来拿吧！

兰迪的叫板，和司马南先生得到的结果一样：没有见到一个可信的通灵人。

人类在变革客观事物的过程中经常处于三种状态中：（一）有些事物的运动规律已被认识，对这种事物，人类取得了支配的自由，如现在人类正在运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知识，（二）有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确实存在的事物，人类凭经验取得了一定支配的自由，终于没有找到存在的规律。如中国医学上的“经络”、“穴位”、五脏六腑相克相生的关系。这类事物很多，人类在逐个地研究探索着。（三）面对着宇宙中存在的“黑洞”，人类想求其存在的原因及运动规律，还在探索之中。追求是进步的表现，是建设性的。但追求的努力产生两种不同的道路：一种用实践、实验去反复求取，最终取得科学真理。一种把追求化为幻想，演化为神话；一旦把神话做为现实的存在，并借之求福祛祸，便是迷信。

“大师”们可以信口胡说，为了骗财致富；媒体却不应该推波助澜，特别是有的教授、专家也跟着“顺非而泽”就大不应该了，太玷污知识界的美号了。

短文廓清天下事

1998年9月2日《长江日报》载文《四海渐秋色，一室难为春》，评论世界金融危机，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流感型’金融病毒已经形成。”这话是对的。

这次危机到来之后，外国专家提议加强经营“透明度”药方。意思即把国内各资本集团与各国资本集团的生产与金融的投资与运作公开出来，以免生产与投资的盲目性，避免危机。这个药方是好的，但是行不通的。一个资本家把经营的秘密完全公开，等于授首于人，甘受宰割。这个简单道理，谁都明白。当市场活跃时，需要资金多，又要得紧，短期高利贷款，便迅速扩大，股票市场也大活跃。商品生产急剧地膨胀起来，过剩的商品，酿成市场疲软，短期贷款有变成死账的危险，资本家便催收贷款，打乱市场经济，于是股票跌价。出现金融危机。生产过剩的程度越大，危机的持续时间越长，对社会生产的破坏越大。到各资本家焦头烂额，面对荒凉景象喘息时，捷足先登的人，又在被破坏的市场上投资，再次制造新的“繁荣”，于是，又酿成下一次危机，在这热衷于短期贷款夺取暴利的角逐中，每个资本家都有其精密计划，这是不能告人的，泄密等于自杀。现在世界上这类贷款有6亿美元左右，是谁家出的，世界银行和IAF谁也闹不清。只有山一证券公司、大仓证券公司倒闭时，才可能暴露部分真相。

有些专家主张降低利率解决危机。降低投资利率，使生产厂家得到低利资金，在运作中获取较多利润，用以刺激生产活

跃市场，给资本主义鼓气。但在危机之中，各国都将被迫采取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既刺激国内生产，又换取外汇，在此情况下，仍然形成商品降价倾销，使泡沫经济更难为继。这个情况已日益扩展成为现实。大家都知道降低利率是一剂暂时强心针，注射下去带来的后果更是可怕的。

1998 年 10 月 23 日

整顿城市的语言文化

1998年9月25日《人民日报》载文《一字一句总关人》，认为“不法广告”乱用语言文字对社会语言是一种污染，应该引起注意。

语言文化是一个民族文明之高雅与否的重要标识。

民族语言是以民族本身文化为主体并不断吸取外来影响的产物。民族语言都夹有外来语，其纯洁性指的是以母体为主，外来语只能是辅助部分。

汉语，也吸收有外来语，但不像日语吸收的那样多。日语吸收的外来语，多是就外来语的语音移来，读起来不方便，理解更不方便。汉语中的外来语“般若波罗密多”之类也是一样。

近20年来，汉语中移来的外来语越来越多，有意译的，有音译的，有的直接用外文字母刊出，有的把本来汉语有的词汇故意用外语代替。我是一个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读报刊文字也时时不能过关了。至于新创的词汇，有些更是令人作难了。如“麻木”、“肯德基”之类，不是自家人你能说得清是什么意思？至于污秽语言那就习见不鲜了。

这些不是进步的创新，而是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亵渎与败坏。不仅对广告语言，而且对整个汉语的规范化要下大力整顿。

广告搞好了，是美化环境；乱立乱画，奇形怪状……就是污染环境。比如公共汽车，应该是清爽整洁的，为了赚钱，车

身上涂得杂乱无章，不干不净，实在有伤精神文明。道路桥梁两旁广告牌如林，竞奇怪状，把个谐调静雅环境，弄得不堪入目。这些要大力整顿。

目 录

序	(1)
这不是印度独家的特产	(1)
为民族品格“招魂”	(2)
“文坛登龙术”休矣	(3)
磨砖不能成镜 念经岂能成佛	(4)
要立法，也要立德	(7)
呼唤“兴国调查”之风	(9)
关键在认真	(10)
保卫国有资产	(12)
坚决打击卖淫嫖娼	(13)
莫骗人	(14)
对时尚的起码要求	(15)
惊心应思改进	(16)
落实难也	(17)
自爱、爱人，自尊、尊人	(18)
道德与面子	(21)
反问一句即得答案	(23)
照新沂市的榜样去办	(25)
富了怎样生活	(26)
北京真地动手干了	(27)
富裕不等于文明	(28)
文坛登龙术也	(29)
要有社会主义精神	(30)

贿赂与馈赠“有别”也难别	(31)
要日日刹“八风”	(33)
要正评人民艺术家	(34)
堵堵漏洞，救救教师	(35)
高尔夫，缓建些吧	(36)
雷锋来吧	(37)
要读好书	(38)
赞李玉安同志	(40)
可以摸得清，把得住	(42)
妇女要自求解放	(43)
天下太平	(44)
还应该深一步想	(45)
也算祛疑解惑斥谣	(47)
一个善良的劝诫	(49)
咱们喊个“跟我上”吧	(51)
请戈培尔退位	(53)
我的困惑	(54)
遏止“文化沙漠”的扩展	(56)
奖，应是严肃工程	(59)
不是“这个”，是“这多”	(61)
人民要人民的艺术	(63)
给打假加些内容	(64)
振兴读书风	(66)
要堵漏洞	(67)
一副对联的滋味	(68)
向哪里放枪好些	(70)
可怜天下父母心	(72)

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平均利润再分配问题	(7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	(77)
这是骂人么	(78)
这个“醒”提得好	(80)
萝卜当不得人参	(81)
共唱国际歌	(83)
铁杆硬汉子	(85)
谁在制造贫穷	(86)
应该搞一个农田建设与开发的科学工程	(88)
扼制为愚昧创造包装的力量	(90)
要加强中国史的教学	(91)
衍生证券害人多	(93)
向王铁成致敬	(95)
应立法保护耕地	(97)
歌舞厅应干些什么	(98)
应当再思	(99)
自有生长“庸品”的土壤	(101)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	(103)
爱护和平 警惕战争	(105)
评业绩要严肃	(106)
需要抓个“行”字	(108)
人，创造技术，指挥技术	(110)
“共妻”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商品交易	(111)
这该咋办	(113)
文小道理大	(114)
“爱”，姓什么	(116)
不要把自己变为商品	(120)

香功缘何曾经香起来	(122)
做得很对	(125)
有正气才有正风	(126)
勿以小善而不为	(128)
请念旧诗一首	(129)
请看令人痛苦（哭）的故事	(130)
要总结经验	(131)
不要拉着历史倒退	(133)
好个“因素往往在‘戏’外”	(135)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吧	(136)
我为“上山下乡”叫声好	(138)
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变	(140)
这条新闻很新鲜	(142)
论“考察”之前的考察	(143)
人民艺术家，珍重	(144)
“艺术”不要毒害儿童	(146)
看！林黛玉大打出手	(147)
谁能对“热”病辨症施治	(148)
请看这则广告	(149)
应以“黑潮”为鉴	(150)
自觉、自重、自尊、向上	(151)
注解黄氏周期率	(152)
抓纲吧	(154)
陈尔程说出了中国人的志气	(156)
台胞喊出了：正义的呼声！真理的呼声！威武的 呼声！不愿做奴隶的呼声	(158)
如何拍历史剧	(159)

这是一个重要措施	(161)
记住：我们是中国人	(162)
这篇文章实在好	(163)
原则从来不长脚	(164)
文艺工作中的“破”与“立”	(165)
这还是可以借鉴的	(166)
且补充两点	(167)
向郑州市学习	(168)
咱们都要读鲁迅的诗文	(169)
莫轻信保健品的广告	(170)
往何处提高自己	(171)
仓鼠不一定怕毒尾蜚	(172)
写点得罪人的感想	(173)
话说“跑官”热	(175)
教授们的话值得重视	(176)
是黑棉袄值钱还是西服值钱	(177)
论“无批评时代”	(178)
坐轿与抬轿	(179)
值得赞扬的一铲	(181)
这篇社论太重要	(182)
小偷激起的念头	(183)
这不是一条新闻	(184)
请看“西瓜变成葫芦”	(185)
人人可以为尧舜	(186)
高雅风情是可塑造的	(189)
这样办公好	(190)
是应该想一想了	(191)

为何争演潘金莲	(193)
自己不要出卖自己	(194)
难得的好文章	(195)
大家都来扪心自问	(197)
江总书记要我们学哲学	(198)
这也是阶级斗争	(200)
只有苦学才能弘扬炎黄文化	(201)
对苍蝇可以放枪么	(203)
取洋名与怪名的目的是一样的	(205)
自己照照镜子吧	(206)
从“幼儿院士”想起的	(208)
胡绳同志敲响了警钟	(210)
雷锋活在人民心中	(213)
补充一段话	(215)
向阮直敬礼	(217)
读书吧，育己助人	(219)
论善恶	(221)
对贪污腐败分子应该“连根儿拔”	(223)
行贿亦有“道”	(225)
琼斯先生说实话	(227)
莫教“厚黑”惑乱人心	(228)
制止暴力轰炸吧	(229)
你说这该咋办	(231)
人民在拭目以待	(233)
加强内力，方能扫荡污垢	(235)
你敢照一照么	(236)
希望“贪者常戚戚”	(238)

保护环境，治理环境	(239)
净化荧屏	(241)
旧话新音	(243)
是谁“掉价”和受罪	(244)
向家永教授致敬	(245)
推广庆香港回归报道的好经验	(246)
无止境的欲望导致犯罪	(247)
照镜子的方法	(249)
没法查的无底洞	(251)
加强广告管理	(253)
这篇文章实在好	(254)
政绩不是股本	(255)
心硬手才硬	(256)
请想一想	(257)
坚决保护民族工业	(258)
警惕“团结”的变质	(260)
警惕“腐而不败”	(261)
怎样使“都市边缘人”安心	(262)
都应讲“师德”	(263)
抓好党建是社会主义企业的重中之重	(264)
“死驴”是可以复活的	(266)
曹雪芹答翰端先生书	(268)
编一部《导演大辞典》，如何	(269)
“三策”归一策	(270)
保护包公是必要的	(271)
一篇醒世文	(272)
正心重于正嘴	(273)

造福万代的壮举	(274)
与张教授持一个观点	(275)
我也要去看望毛主席	(277)
不能丢弃的武器	(279)
创造“声闻于天”的条件	(281)
“垃圾”要天天扫	(282)
读《“小偷尿裤”与“贪官惊魂”》有感	(283)
古已有之的“新鲜事”	(285)
心无挂碍天地宽	(287)
保住清白好奉献	(289)
法国香水的奥秘	(290)
立德治内伤	(291)
圆梦（缀《聊斋》）	(292)
捍卫科学的勇士	(294)
拍板叫阵谁敢来	(296)
短文廓清天下事	(297)
整顿城市的语言文化	(299)